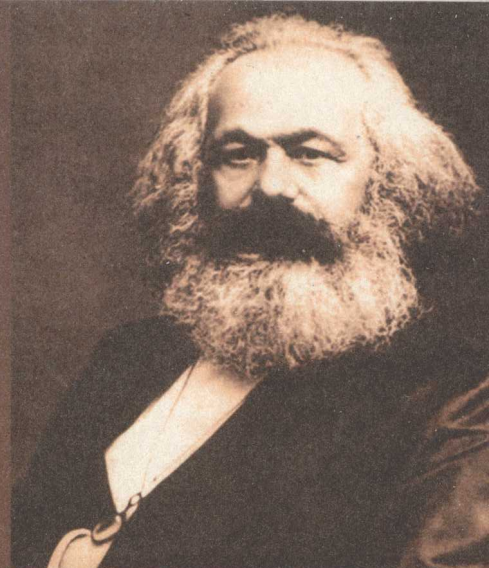


Introduction to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加] 马克·拉沃 (Marc Lavoie) 著
王鹏 译

8.1

山东大学出版社



Introduction to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责任编辑：姜明

封面设计：张莉

ISBN 978-7-5607-3936-6



9 787560 739366 >

定价：22.00元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加]拉沃(Marc Lavoie) 著

王鹏/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 (加) 拉沃(Lavoie, M.) 著;
王鹏译.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11

书名原文: L'économie postkeynésienne

ISBN 978-7-5607-3936-6

I. 后…

II. ①拉… ②王…

III. 后凯恩斯经济学

IV. F091.34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4989 号

©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Paris, France, 2004.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铁路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6.625 印张 165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译者序

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是在 2006 年,那是在加拿大读经济学博士的第一年。当时,我在忙于备战博士生综合考试之余,也在为博士课题的选择彷徨。

一直以来,主流宏观经济思想被自由主义理论(新古典主义)垄断。我所修习的硕士和博士的课程充斥着索洛模型、拉姆齐模型、费雪方程、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等等新古典主义理论。教授们讲得兴致盎然,学生们学得如饮甘醇,似乎大家都认为自己真正掌握了宏观经济之道。与此同时,一个长久以来盘旋在我心中的疑虑却越发清晰,即如果真理之门已经打开,为何经济危机的梦魇却始终挥之不去呢?

自由主义学者总是试图用复杂的经济周期模型将经济危机的存在合理化,可这并没有达到消除经济危机并保持经济和就业稳定增长的真正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流宏观经济学近几十年的发展似乎都在做无用功。此外,为了解释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为了弥补模型中缺陷,新古典主义学者不断地补充假设并将数学计算愈加复杂化,但这一切还是无法遏制经济危机的汹涌之势。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本书正是要尝试给我们一个答案。自古以来，经济、政治和文化密不可分。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政治和文化立场上的经济分析必然会产生谬误。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始终标榜自由主义作为普世价值观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他们强调个人主义，抨击政府干预，鼓吹恶性竞争，而这种所谓的“精英主义”论断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和经济社会的不稳定。让我们看看这本书要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放任自由，资本主义最终会在丧失竞争力和巨大浪费中走向灭亡。如果没有政府干预，资本主义会产生不稳定和经济周期，它既不会带来劳动力充分就业，也不会实现充足的总需求。

同时，对于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这本书是这样阐述的：

家庭、企业和银行更倾向于在经济繁荣时期或者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时采取更为冒险的行为或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他主张）银行应当降低风险溢价和贷款标准，并接受更高的债务负担……稳定性孕育了不稳定性。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和高增长率会最终导致更加脆弱的金融环境。更多的投机行为也会随着金融市场脆弱性的增加而出现。实际上，企业和银行利用债务作为杠杆彼此竞争，普通家庭会随之效仿，从而拉高了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最终，央行介入并加强信贷约束条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提高基准利率。因为此时市场已经具有较高的债务负担，利率的升高加快侵蚀本已脆弱的金融系统。企业和个人很难支付其债务利息。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一定会通过紧缩风险溢价和

贷款标准改变行为方式。除非政府随时准备通过大规模赤字开支来支撑总需求并挽救经济,否则这些紧缩行为都会转化为股票市场的崩溃。

虽然这本书最早完成于2003年,但这段叙述却淋漓尽致地预言了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的全过程。本书强调社会总需求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也就必然考虑到社会普遍消费者的利益。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诸国及时改变方针,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总需求的法案来应对危机。当然中国政府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也基于此。毫无疑问,对于目前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回暖,这些政策功不可没。

也正因为如此,我选择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作为我博士的研究方向。作为我的博士生导师和本书作者,Marc Lavoie教授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方面发人深省的论断以及他严谨的学风也深深吸引了我。他在诸多优秀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过数十本学术著作,并成为北美地区后凯恩斯主义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此外,他的智慧和知识并不仅限于此:作为一名优秀的击剑运动员,他曾经数次获得加拿大国内锦标赛冠军并代表加拿大参加了1976年蒙特利尔和1984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他在运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同样成绩斐然;最重要的是,除了学术方面的指导,他的温和、耐心、责任心和正义感等优秀品质都是我为人处世的榜样,这一切都使我在与他的交往中受益匪浅。

王 鹏

2009年6月10日写于渥太华家中

引 论

有一次在法国做一个简短访问的时候，我第一次有了这样一个主意：写一本关于后凯恩斯主义综合理论的书。在巴黎，我去了几家位于拉丁区(Latin Quarter)并临近巴黎大学(Sorbonne)的书店。令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它们都拥有一些批判“别无选择”理论^①的经济学书籍。很多作者对政府、央行以及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大型国际组织采用的经济政策表示不满。

这些组织的拥护者推行紧缩政策，其中包括解除管制和私有化，目的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保持汇率水平、提高生产力增长速度并创造就业机会。虽然这些经济目标并不存在任何争议，但他们追求这些目标的方式却令人生疑。他们的方法起源

^① 在英文里，这被称作 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即“别无选择”之意。该理论指出，主流经济学及其自由市场理念是唯一能够理解并解决经济问题的理论。

于自由市场的理念,比如所谓的“华盛顿共识”^①,而且,这些方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观点。然而,这些在四十年前就被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58)^②嘲弄过的观点至今仍然备受争议。自由市场的簇拥者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央行可以独自提高利率(就像欧洲中央银行所做的)、削弱工会力量、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限薪、减少提供公共服务和税率,以及私有化大型公共事业单位和解除市场监管。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③宣布的那样,他们还提出改善预算平衡或拟定消除财政赤字。这些政策的目标非常简单:尽一切可能增加市场的灵活度才能最终造福社会。

“华盛顿共识”的没落已经被记载在很多反对者的文献里。然而,我时常发现有些针对该共识的批判并不是那么有说服力。虽然这些批判的观点都很好地指出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缺陷,但它们都不足以形成一种新的完整体系来作出完美的论述。比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2002, 2003)明确地抵制很多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非常流行的自由市场政策。

① (译者注)“华盛顿共识”是 1989 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等组织于华盛顿所制定的一套针对拉丁美洲国家和东欧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理论。该共识充分表现了新自由主义理念,包括了一系列诸如利率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私有化等自由经济政策。然而该共识的失败已被诸多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证明。

② (译者注)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2006),加拿大裔美籍经济学家,著名的凯恩斯主义学者,曾供职于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四届美国政府。荣获两次总统自由勋章。他强调对于产能富足的社会,自由市场理念不再适用,如何促进消费和追加公共物品投资才是发展经济的关键。

③ (译者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于 1991 年签署于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宣告了欧共体的建立,并限制各成员国在公共物品上的投资。

他承认这些政策是建立在过于简单的新古典理论^①的基础上，并通过改良的新古典主义模型有力地证明了这些政策的不足。

一套截然不同的理论

我并不认为对现在的主流思想提出拐弯抹角的批评是一个好主意。许多针对自由经济政策的批判都是从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型极其脆弱的理论基础开始的。究其方法，不外乎是向模型中添加一些更真实的假设。但是，这种方法只会使得模型更加复杂和难以捉摸。

本书将采用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我的目的非常明确：不同于目前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本书提出了另一种全新的理论。这种理论反驳并否定自由市场理论。这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就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

那些广泛应用于大学本科一年级经济学课程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很少讨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思想。学生们也许会在学习经济史或者经济增长波动理论的时候偶尔留意过它。这主要归功于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尼古拉·卡多尔(Nicolas Kaldor)和鲁吉·帕西内蒂(Luigi Pasinetti)提出的剑桥学派增长和分配模型。这些模型涵盖了诸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或学生或许在讨论 20 世纪 60 年代

^① (译者注)“新古典主义学派”是本书一个非常重要名词，也是本书主要的批判对象。该学派是目前主流经济学的代表学派，主张自由市场能够自动解决失业、经济衰退等问题，而政府干预不会起到任何效果。

著名的“资本争议”^①(capital controversies)时也接触过后凯恩斯主义理论。通常来讲,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斯拉法主义经济学(Sraffian Economics)[也称之为“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Neo-Ricardian Economics)]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的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局限于批判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及其理论架构(例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理论。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取得了较大发展。目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拥有一个庞大的研究团队,研究方向涉及到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表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仅推翻了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而且在理论、实证和政策前沿领域补充完善了自身理论。一些学术杂志,诸如《剑桥经济学期刊》(*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年创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1978年创刊)、《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年创刊),涵盖了大量权威性的、富有价值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还有一些其他的期刊,例如《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and Political Economics*)也经常刊登一些后凯恩斯主义的文章。

还有一些组织,像英国的“后凯恩斯研究小组”和法国的“凯恩斯研究协会”都致力于后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并经常组织或赞助一些学术会议。此外,还有一些学校(像新城市大学、密苏里

① (译者注)“资本争议”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针对资本产品的实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展开的一场辩论。辩论双方分别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等人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等人。

大学堪萨斯城分校、艾姆赫斯特学院、犹他大学)的经济系也会开设一些后凯恩斯主义或者其他非主流经济学课程用于研究生教育。定期举办的后凯恩斯主义学术夏令营也吸引了众多学生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一起与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们见面。

针对“别无选择”(TINA)的更正

“别无选择”指的是主流经济学及其自由市场理念被认为是唯一能够理解并解决经济问题的理论,绝无他法。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对于“别无选择”这个说法一个很有效的更正。它为抨击主流思想及其紧缩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替代意义的可行性政策。

在以下的章节中,我们会着眼于揭穿一些在新古典主义理论应用中所编织出的虚构的神话(参见 Keen, 2001)。我们会在本书中论证下面一些与主流经济学相左的观点:需求的上升不一定会导致价格的上升;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或者说实际工资的提高并不会导致失业;实际工资的提高并不会导致企业利润的下降;储蓄率的降低既不会影响投资也不会阻碍整个经济的发展;可变价格体系不会将经济带回到均衡水平;财政赤字既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也不会使利率上升。

主流经济理论的很多假设导致这个社会不得处于紧缩政策的环境里。因此,经济学被很多人贴上了“压抑的科学”的标签。与此同时,为了实现经济的繁荣,无限制性竞争受到追捧。相反,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则传达了一条迥然不同的信息(在我看来是一条更加积极和令人兴奋的信息),合作(而不是对抗)将会带来更佳的结果。稀缺性假设实际上只是一个建立在智力游戏基础上的幻想,我们可以将其搁置一旁(Ventelou, 2001)。

对“后我向思考经济学”^①的赞同

在2000年,来自法国不同大学的一些学生站出来反对他们被灌输的经济学知识,从而掀起了一场运动并迅速蔓延到了其他国家(Fullbrook,2003)。这项运动激发了《后我向思考经济评论》(参见 <http://www.paecon.net/>)的创刊。目前有超过150个国家的8000多位读者订购此刊。

学生不仅抨击了教条主义的教学形式,也抨击了那些与现实世界无关的经济模型。这些模型似乎只存在于幻想的世界。所以,他们将这种教学形容为“自闭的”。他们要求课程中涵盖更多关于新古典主义局限和缺陷的思考。同时,为了使得学术思想能够更加紧密地联系现实社会,他们还要求知识多元化,这些知识当然也包括非主流学术思想。

我将本书献给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后继者们,以纪念他们在思想和学术的抗争中所作出的努力。

^① (译者注)“后我向思考经济学”英文为 Post-autistic economics,或被译作“后自闭经济学”。

第一章 后凯恩斯主义 非主流经济学

1.1 哪些人属于后凯斯主义学派的学者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是诸多非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一支。众多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非主流学者之中,有马克思主义者、斯拉法主义者(也被称作“新李嘉图主义者”)、新结构主义者(主要指在经济发展领域)、制度主义者、法国调节学派学者、人文或社会经济学家、行动主义者、熊彼特主义者(也被称作“进化主义者”)、女权主义经济学家等等。

非主流经济学往往受到两种对立作用的影响。第一,非主流学派会陷入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之中,以经济学尤甚。每一种非主流思想都致力于通过强调某个特定问题而实现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尽管非主流学者间互为竞争关系,但他们在研究某些特定的经济领域时也互为补充。

第二,相反的,不同的非主流经济学派正在逐渐走向统一。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是处于飘零中的弱势群体。目前许多持有不

同思想的非主流学者正在试图彼此沟通并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已经在北美地区的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和新激进主义学者(马克思主义学者)身上成为事实,他们共同致力于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研究。此外,一个被称作国际多元化合作协会的组织(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承纳了所有非主流思想以及它们的机构和期刊。就此而言,这些不同的思想交织在一起使得人们很难去界定。

就像名称所提到的,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们最初受到剑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英国人凯恩斯(J. M. Keynes)的启发。很多人认为他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①一书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然而,对这本书的解释也引起众多纷争。例如,后凯恩斯主义学者的一些解释就与“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②经济学家[例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作出的解释不同。这些解释也不同于像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艾伦·布兰登(Alan Blinder)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这样的“新凯恩斯主义”^③经济学家的观点(见图1.1)。

① (译者注)以下简称为《通论》。

② (译者注)“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Neoclassical synthesis Keynesians)这个概念在二战后由萨缪尔森提出,他将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约翰·希克斯(Johan Hicks)的IS-LM模型是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

③ (译者注)相对于传统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s)只在价格刚性假设条件下进行经济分析,并着重分析价格刚性的原因,譬如菜单成本、效率工资、协调失灵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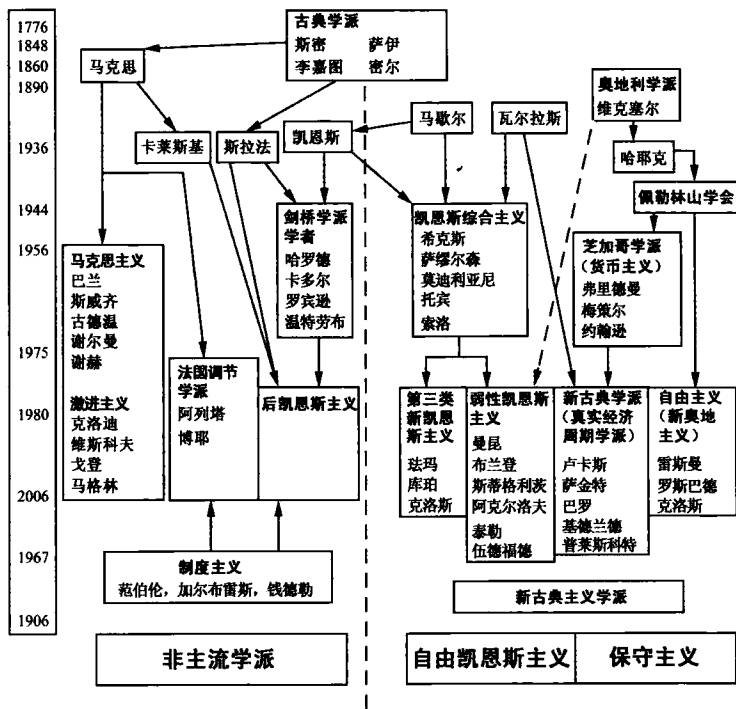


图 1.1 宏观经济学思想学派

当代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并不会将自己局限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上。他们还从跟《通论》这本书同时代的其他剑桥经济学家像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琼·罗宾逊的著作中得到启迪。这些经济学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建了剑桥学派。在这些人中,还包括尼古拉·卡多尔、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皮埃罗·斯拉法等著名经济学家。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与法国调节学派(Boyer, 1990)的许多观点,都与制度主义的学术观点类似,尤其与范伯伦(Veblen)和加尔布雷思

的观点紧密相连。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继承了创建于1936年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小组的工作。但是,就像凯恩斯一样,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基本只关注宏观经济学问题。

❖ 专题 1.1: 英国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家

剑桥学派

哈罗德、卡莱斯基、斯拉法、罗宾逊、柯汉(Khan)、卡多尔、帕西内蒂,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是剑桥学派的成员。虽然前两位经济学家从来没在剑桥大学工作过,但他们供职于牛津大学。

剑桥学派的思想曾经在世界上非常有影响力,尤其是在大英帝国没落和美国大学后来居上之前,这些非主流经济学家都曾享有很高的声誉。如今在剑桥大学,只有一些学院和佳奇管理学院仍然保留着非主流经济学的学术学位(应用经济系最近关闭)。经济系已经完全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占据。这导致很多博士研究生像法国学生一样签署请愿书希望学习更加多元化的经济学知识(Fullbrook, 2003, p. 36)

学派创始人简介

罗伊·哈罗德作为首位凯恩斯的传记作者而享有盛名。就像后来成为琼·罗宾逊合作者的理查德·柯汉一样,哈罗德在凯恩斯写《通论》时对每一章节都作出评述。哈罗德成名于他在经济动态理论方面创造性的研究。从1939年开始,他最先提出了技术进步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后来也被很多其他的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像罗宾逊、卡多尔、卡莱斯基等人所用。哈罗德在牛津大学参与了企业行为研究,并最终否定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微观经济理论。

琼·罗宾逊成名于她在1933年面世的对不完全竞争的研究著作。这本书起先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盛赞,但不久之后

她就完全否定了这本书的观点。她是一名多产的作家,她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资本积累》(*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这部经典名著的价值几乎可以跟《通论》平起平坐。虽然这部著作很多地方都晦涩难懂,但是这本书涉及了生产技术的选择问题、货币问题、分配问题以及充分就业下的固定经济增长率问题。罗宾逊和斯拉法都是“两个剑桥之争”^①的发起人。这次争论旨在质疑新古典主义学派在资本和分配方面的理论(Cohen and Harcourt, 2003)。

尼古拉·卡多尔同样也是剑桥学派理论革命的核心人物。匈牙利裔的卡多尔1927年来到英国。他不断地发展完善自己的理论并在很多经济领域例如市场投机、多重均衡和经济良性循环方面作出创造性贡献。他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质疑货币和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即使他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学术思想系统化,当代很多学者仍然能从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得到启发。

米哈尔·卡莱斯基,波兰经济学家,1936~1946年期间居住于英国。在那里他与罗宾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他才是真正的“有效需求理论”之父。与凯恩斯不同的是,卡莱斯基的宏观经济理论并不是建立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②微观理论的基础上。此外,卡莱斯基还是

① (译者注)“两个剑桥之争”(Cambridge controversies)也就是我们在引论中介绍过的“资本争议”,因为辩论双方主要来自英国剑桥市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以及美国麻省剑桥市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故得名。

② (译者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凯恩斯的启蒙导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他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首次将供求利率、边际效用理论和生产成本理论形成一个逻辑整体。作为历史上最显赫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思想至今仍统治着大学经济学教科书。

一位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周期理论上。很多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计量经济学研究都受到他的影响。

皮埃罗·斯拉法生于意大利并在1927年来到英国。斯拉法成名于他早期对马歇尔经济学、尤其是在完全竞争环境下供给理论的批判。在经历了一段并不顺利的授课生涯后，他开始着手编纂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全部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他试图解决一些李嘉图提出并悬而未决的问题，比较著名的有商品生产循环的条件下如何确定相对价格的价值界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斯拉法学派也被称作新李嘉图学派)。他的学术成就在《通过商品生产商品》(*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1960)这部著作问世后达到顶峰。它也使得斯拉法成为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先驱。许多意大利经济学家在斯拉法的指导下加入剑桥学派，比较著名的有皮兰格罗·加列格纳尼(Pierangelo Garegnani, 1990)和鲁吉·帕西内蒂(1981, 1993)。他们分别致力于资本理论和失衡部门增长理论。也正是这些经济学家的影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曾经一度被称作“安格鲁—意大利学派”，而帕西内蒂自己则将其称之为“凯恩斯经济学剑桥学派”。

在阿雷斯特和索耶(Arestis and Sawyer, 2002)编写的人物传记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其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信息。金(King, 2002)在他的著作中详细追溯了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历程，并在1995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中详尽介绍了相关参考书目。

除了霍特和普莱斯曼(Holt and Pressman, 2001)的著作和其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字典(参见King, 2003; Arestis and Sawyer, 1994)之外，还有许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教材，比如(按照难度排序)雷诺德(Reynolds, 1987)，阿雷斯特(Arestis, 1992)，

拉法(Lavoie, 1992a),埃西纳(Eichner, 1987),帕利(Palley, 1996)^①,以及一部关于后凯恩斯货币主义经济学的综述(Arestis and Sawyer, 2006)。

1.2 非主流经济学的特征

在我们开始描述非主流经济学特点之前,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是什么导致了非主流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不同。可是,如何定义新古典主义理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确切地说,到底是什么将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博弈论以及“新古典综合”凯恩斯理论结合起来的呢?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经常把约束最大化原理^②(principle of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作为自己的主题。这个原理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他们的理论中心。虽然近几年新古典主义内生增长模型不再以报酬递减原则(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return)^③作为假设条件,但是这个原则仍然是微观经济学教育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

我们需要用一种更全面的方法去比较新古典主义学派和非主流学派。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大约30年前,著名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容胡佛(Axel Leijonhufvud, 1976)提出了“预先假设

① (译者注)为了使读者检索方便,在下面的章节中,对于一些提及较少的经济学家,译者将直接使用经济学家的英文名称,而不是中文名称。

② (译者注)“约束最大化原理”指的是在预算平衡或资源稀缺等约束条件下通过对利润、成本或效用等函数求极值的方式得出产量、消费量等最优解。

③ (译者注)“报酬递减原则”,也称“边际报酬递减原则”,指出在企业生产中,当资源投入(例如资本或劳动力)达到一定饱和程度后,增加单位资源投入,产量的增加呈下降趋势。

理论”。这些预先假设是一个学派学术思想的根本,是不能被公式化或者模型化的。它们比一般的假设和理论出现得更早。很多方法论学者认为预先假设是形成一个理论实体的所有最本质信念的集合。在下面的部分,我们将尝试识别出这些预先假设。

我们用四种方法将新古典主义思想跟非主流思想(其中包括了后凯恩斯主义思想)区分开(见表 1.1),同时我们在其中将加入一些政治元素。在新古典主义理论的预先假设中,我们发现工具有主义认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理性无界论(实质理性)以及基于稀缺商品的交换经济论。

表 1.1 新古典主义和非主流思想学术研究的预先假设

预先假设	范 例	
	非主流思想	新古典主义思想
认识论	现实主义	工具主义
存在论	有机主义	个体主义
理性论	过程理性	实质理性
分析重点	生产,增长	交换,稀缺性
政治核心	政府干预	自由市场

然而,非主流经济学强调现实主义、有机主义(整体论)、过程理性、生产经济。人们往往不会用一种方式去概括这些差别,但是,很多方法论学者和非主流学者却得到了与之相似的结论(Lavoie,1992b;Setterfield,2003)。我们迟些会谈到政治方面的预先假设。

现实主义和工具主义 (Realism vs instrumentalism)

工具主义一直以来居于新古典主义方法论的统治地位。对于工具主义者来说,一个假设成立需要两个条件:首先,它的预测相对来说可以接受。另外,利用它可以计算出均衡点的位置。他们不关心假设是否符合现实,所有理论只是用于分析的工具,与它们到底能够解释多少真正的经济现象无关。这种方法论一直以来受到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青睐。

与此相反,大多数非主流学者认为现实主义这个假设与经济学紧密相关。经济学的目的在于解释相关现象并揭示经济在现实世界中的运行规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只能从现实世界和典型事实入手,而不是从一个虚无幻想的假设出发。诚然,所有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抽象于现实世界,这意味着它们在某些方面可能不是那么尽善尽美,但它们必须具有实证性,必须描述一个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世界。

事实上,目前大多数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批判都毫无疑问地指向了它的真实性。公平地讲,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并不是寻找不到现实主义的踪迹,但这些踪迹往往作为辅助假设而被新古典主义基本理论所忽视。非主流经济学家则认为这种方法是具有欺骗性并且远离现实世界而建立在虚构世界之上的。

有机主义和个体主义

(Organicism and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个人,也就是经济学里讲的经济

代理人(economic agent)。它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①的基础,同时也是以微观为核心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根本所在。这种代理人代表了整个经济群体,他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他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银行或者工厂等机构只是个人意愿和偏好的掩体。这是一个由无数原子化的个人所组成的世界——一个充斥着个人主义的世界。

非主流经济学则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像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说的,个人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是受到文化、社会阶层这些环境因素所影响的。此外,个人微观经济可能会跟宏观经济发生冲突,例如著名的“节约悖论”^②。对于那些机构(像银行、工厂、政府等)而言,它们应该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而不仅仅是释放那些机构内部管理者欲望的工具。它们应该有自己的目标,就像某句名言所讲:“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③我们不能认为这些机构的存在是对市场体系的阻碍和破坏;相反,它们稳定了整个经济体系。已经涌现出来的强强联合和不对称现象促使我们去研究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权力机构(像银行和大型企业)的收入分配问题。它们还促使我们去研究不同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和制约。

有机主义,或者称为整体论,从某种程度上讲是非主流思想

① (译者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Walrasian general equilibrium)是微观经济学一个重要分支。它通过对市场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分析,在供给等于需求的均衡条件下寻求最优产量、最优消费量以及价格,使得消费者能够达到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能够达到利润最大化。

② (译者注)“节约悖论”(Paradox of thrift)最早由凯恩斯提出。通常情况下,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增加储蓄。但这种看似对个人有利的决定,却可能导致消费的降低和经济的加速下滑。

③ (译者注)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名言:“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parts.”

的基础。事实上,建立在非线性和奇异吸子基础上的混沌数学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空间。这是因为混沌动态分析需要采用整体法。

过程理性和实质理性

(Procedural and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经济代理人往往拥有绝对或者实质理性。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反驳这个不合理的预先假设。很显然,这意味着经济代理人可以拥有无限的知识并能够预先计算出最终结果。而某些新古典经济模型中引入了不完全信息理论也无非是突出计算优化信息这种不合理的能力。这种过度理性与很多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的理性预期概念紧密相连。

非主流经济学家(例如 Herbert Simon, 1976)将理性约束化或者程序化。个人和组织获取信息的能力受到很多限制。这种能力缺陷超出了信息不完全的范围。我们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里甚至可以发现代理人在搜寻最优信息的时候如何分配时间,而非主流经济学则认为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甚至不存在的,这使得个人和工厂不得不推迟他们的重要决定。实际上,这些决定取决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而未来预期又取决于现在他们要作出的决定,所以,他们很难作出决定。

正因如此,个人和工厂在作出决定时往往只能用“满意度”去衡量,因为没有人能知道最优解。在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人们往往给自己制定一些标准,比如风俗习惯、行为准则、经验、对邻居或者公众行为的模仿,甚至亲自制定规范来降低不确定性导致的危害。人们的经验没有什么特别,它们只是人们在遇到不确定问题或者复杂环境下的一种常规反应而已。

生产和稀缺 (Production and scarcity)

根据利奥尼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说法,经济学最常规的定义是对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但是,这个定义只符合新古典主义理论:物品的稀缺性引领大众的经济行为;一切具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稀缺的,所以他们具有机会成本;价格是这种稀缺性的表现。

交换的概念占据了新古典理论的核心位置。很多复杂模型所用到的辅助假说仅仅是再次完善了纯粹交换经济的条件和含义。生产者也只是在交换经济中进行操作从而攫取更多利益。

相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的是生产而不是交换。就像古典主义学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理论观点,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如何为扩大生产和积累财富创造更多的资源。他们的分析焦点是生产过剩的存在以及就业、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原因。这些环节都对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起着关键的作用。公平地讲,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内生增长模型也会讨论这些问题。但不同的是,非主流经济学家没有假设资源被全部利用,所以关于资源的有效分配也就不再是一个主要问题。更确切地讲,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的是这些资源的使用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经常在生产可能性边界^①所划定范围的内部运行,从而增加了生产的灵活性。这也会导致“免费午餐”的经常出现。即使有人假定充分就业可以实现,非主流学者则认为一系列技术

^① (译者注)“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frontier)用来描述在资源一定的条件下,生产者用尽所有资源和技术所能达到的两种商品产量的最大可能性组合。

创新会使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因此,经济学家不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资源的有效分配上,而应当超出稀缺性的范畴。

政治预先假设:如何看待市场

如果我们不讨论新古典主义和非主流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看法,以上所列举的预先假设则并不完整。非主流学者认为意识形态会引导经济研究甚至数据采集行为,而新古典主义学者则假设他们的理论是凌驾于所有意识形态之上的。

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支持企业自由和放任主义理念,因为他们都崇信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将经济导向最优化。虽然这是一个常见的说法,但很多建立在价格系统上的新古典主义模型在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时常常会出现不稳定或者次优的结果,但是这些模型往往被看作是异常现象被置之不理。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相信有办法改善因为竞争受限而导致的非理想化市场,完全信息和可变价格会将经济重新带回到均衡位置。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经常会用这样的话来诠释自己的观点:短期内,因为市场缺陷和外在性的存在,我们需要政府干预。长远来看,高度灵活的市场可以确保经济处于均衡,政府干预是市场效率低下的症结所在,所以将这种干预降低到最低程度才是最优的选择。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坚持自己对市场机制和看不见的手的信念,与此同时,非主流经济学家则对这种盲目依赖市场的理论提出质疑。他们从很大程度上质疑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公平性,甚至它的存在。很多社会和人文主义经济学家都强调了市场的不公平性。而且,因为市场无法规范自己,“自由”市场并不

存在。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2002年爆发的大规模金融公司^①欺诈案。这些实例也让非主流经济学家确信政府必须像保护私有财产那样严格监管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

综上所述,非主流经济学家将完全竞争看作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完全竞争很快就会形成寡头垄断或者完全垄断。政府必须干预市场,或者在私有市场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否则市场将会走向不稳定,并导致资源的浪费。在宏观经济角度上说,政府这种监督就是对总需求的监督。

1.3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以上所阐述的这些预先假设都是非主流思想所共同拥有的。我们又如何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其他非主流经济学派区分开来呢?很多学者(Eichner and Kregel, 1975; Arestis, 1996; Palley, 1996; Pasinetti, 2005)总结归纳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七个特点。

前两个特点——有效需求和历史时间最为基本。这两个特点经常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叙述中出现。后面的五个特点则起到辅助的作用,它们是前两个特点或者前面提到的预先假设所产生的结果。总之,并不是所有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将这些特点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其他学派也会采用其中的一些要素。

^① 例如,美国安然公司(Enron)和美国世通公司(Worldcom)。

有效需求原则

根据有效需求原则,商品的生产应该适应商品的需求。这个原则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经济是由需求决定,而不是被供给或者禀赋左右的。这就意味着投资跟储蓄是不相关的,投资和资本积累也不会受到家庭跨期消费决定的影响(Shapiro, 1997)

当然,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有同样的观点,但他们只把这种观点用于短期的条件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承认短期内总产出和国民收入是由总需求决定的。但从长期来看,他们都认为经济受到供给条件制约。

在新古典主义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AD-AS model*)中,长期总供给曲线往往是垂直的。这意味着在长期内经济实体无论在怎样的价格水平下都无法提高产量。在菲利普斯曲线^①的理论框架里,基于同样的理由,在自然失业率或者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②的水平上菲利普斯曲线也是垂直的。这个自然失业率是唯一的并且独立存在的,不受过去和目前失业率的影响。

① (译者注)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是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它表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交替存在:通过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低时,失业率高。

② (译者注)*NAIRU*: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 当实际失业率等于 *NAIRU* 时,通货膨胀率保持稳定。当实际失业率低于 *NAIRU* 水平时,通货膨胀预期升高,带动通货膨胀加速增长;而当实际失业率高于 *NAIRU* 水平时,通货膨胀预期下降,导致通货膨胀随之下降。

此外,在索洛增长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只受外生^①的人口和科技增长的限制。与之相似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积累的长期增长率受到利润储蓄率和利润率的限制。这些限制都是由供给决定的变量。

与之不同的是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不同意长期增长受到供给条件制约这个观点。后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有效需求原则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是极其重要的。投资导致储蓄,而不存在反向关系。因为有效需求和现存体制的约束,经济在长期内的表现无法确定,供给最终适应需求。

历史时间的动态发展

受到琼·罗宾逊(1980)的启发,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强调历史时间和逻辑时间的不同。在后者中,经济学家不关心经济如何从一个均衡位置移动到另一个均衡位置。当经济系统中某些参数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需求和供给曲线左右移动时,他们假设这种移动会瞬间完成。一旦经济到了新的均衡点,他们马上开始比较经济在新位置与在旧位置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所有的结论也是基于这种分析。当参数变回原值时,经济又重新回到了旧的位置,这一切似乎跟时间没有任何关系。逻辑时间这个概念是没有深度的。

历史时间则完全不同。时间是不可逆转的:经济个体只要执行某项决定,除非付出极高代价,否则这个过程将无法逆转

^① (译者注)“外生”(Exogeneity)和“内生”(Endogeneity)是经济学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经济学模型中,外生变量指的是来自模型以外,无法被模型解释的变量,例如这里的人口和科技增长,索洛模型假设这两个变量是外在赋予并固定不变的,它们不受模型内部变化的影响。内生变量则相反,它能够被模型决定并解释。它的变化往往受到模型或外生变量变化的影响。

(比如某人以高成本投资建造工厂)。如果说稀缺资源是存在的,那么它一定是时间。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期的经济表现跟短期的经济运行是分不开的,它只是一系列短期经济运行的结果(Kalecki, 1971, p. 165)。因此,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在任何外部冲击影响下的经济运行轨迹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像 Halevi 和 Kriesler (1991, p. 86) 所阐述的:“逻辑时间下的长期经济分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成立:某种动态调节程序能够清晰地说明经济从一个均衡点‘穿越’到另一个均衡点的过程,而且这种‘穿越’不能影响最终的均衡位置,也就是说经济的最终均衡点跟整个经济过程无关。”总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均衡位置的变换不能跟经济的长期运行过程割裂开来。

这也让后凯恩斯主义学者着眼于经济动态模型的分析。这种动态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物质资本和金融资产随时间变化的发展过程。这些模型还需要解释经济生产率结构的变化,这也是动态时间分析的根本。

可以肯定的是,均衡点跟经济过程的不可分割性并不是一个新的观点。凯恩斯和很多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如卡多尔和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很久以前就支持这个观点。有趣的是,这些曾经被认为很难模型化的观点现在已经成为基于滞后效应、路径依赖性,不可逆性和锁定效应(比如 QWERTY 和 AZERTY 标准键盘的使用)的非线性数学发展的核心内容。这些方法也最终使多重均衡成为可能。虽然并不是只有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倡导这些观点,但这些观点深深印在他们的经济学理念中。

除了以上讨论的非主流经济思想的预先假设,我们还可以通过表 1.2 来了解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其他特征。

表 1.2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征

主要特征	有效需求	不管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内,经济由需求决定;供给适应需求;任何时候,投资决定储蓄而不是反向关系
	历史时间的动态发展	我们必须考虑到经济变化的过程并认清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影响经济均衡位置的因素
辅助特征	可变价格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为收入效应,可变价格可能会将本来正确的情况变得糟糕
	货币型生产经济	模型必须考虑到合同是由货币的形式来表现的;企业的负债和家庭的资产会在财务方面约束他们的行为
	根本的不确定性	未来不同于过去。今天的决定会影响明天的结果,所以未来是未知的也是不可预知的
	相关的微观经济学	后凯恩斯注意微观经济学建立在“字典性”决定和反 L 型成本曲线的基础上
	多元论及方法	现实可以表现成多种形式,所以会有很多看起来并不一致的方法和经济理论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辅助特征

除了已经讨论过的主要特征,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在叙述其思想时通常也会借助一些其他特点。这里再介绍五个特点:可变价格的不稳定性、货币型生产经济、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相关的微观经济学、多元化理论。微观基础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否定作为新古典理论核心的可变价格原

则。他们并不重视替代效应^①，而是更多考虑收入效应^②。后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可变价格可能导致不稳定性。比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信名义和真实工资的降低会使经济重新回到充分就业的状态，而后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这些措施只会让情况更糟。这是因为不管是名义或者真实工资的下降都会降低工人的购买力水平，从而降低了有效需求并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负担。

在货币型生产经济中，这些债务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经济建立在以货币（像美元或英镑）为基础的经济合同上。它们不是以具体实物的数量作为衡量标准的。家庭不能直接拥有大型企业的物质资产，但他们可以获得金融资产，而且，他们对非流动性金融资产的抛售欲望会引发金融危机。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投资，其决定权取决于企业家和工厂，跟社会的储蓄水平无关。在这个角度上讲，银行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贷款给处于生产最初阶段并急需资金的工厂。后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只要企业信誉良好，银行就可以贷给它们资金，但这种信誉又取决于企业的负债水平。这就是卡莱斯基的“风险递增原理”，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流向企业的贷款以及贷款利息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的扩张程度，这跟银行的流动性偏好有关。

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

“流动性偏好”经常与“根本的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这个理论通常被认为出自凯恩斯和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著作。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根本的不确定性”与“概率风险”

① (译者注)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取决于相对价格的变化。

② (译者注)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取决于他们收入和科技水平的变化。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根本的不确定性”这个条件下，我们不可能计算出一个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可能结果。未来是未知和不可预见的。能够起作用的只有人们的信心，也就是凯恩斯所说的“投资本能冲动”(animal spirits)。

“根本的不确定性”这个说法还跟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其他两个概念有关：历史时间和有限理性^①。在历史时间中，未来跟过去和现在不同，如果借用物理学名词，这叫做“非遍历性”(non-ergodic)，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所观察到的均值和波动并不会在其他时间出现(Davidson, 1988)。就像沙克尔(G. L. S. Shackle)讲的那样，在事件的进程中每个关键的决定都在破坏这个进程。这种“非遍历性”让我们对建立在统计分析和计量研究基础上的结论和预测产生怀疑。现在发生过的事件在未来重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基原主义者，像戴维森(Davidson)和明斯基都相信“根本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彻底摧毁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根基。虽然这种不确定性在现实世界里广泛存在，但新古典主义学者却无视这个观点，并依然使用概率密度函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1981, p. 224)曾经说过：“在不确定性下，任何经济推理都是没有价值的。”戴维森(1984, p. 574)的一句话现在已经成为后凯恩斯学者的座右铭：“大体正确总好过彻底错误。”^②大体准确地描述一个现实世界总强过精确地描绘出一个虚幻的世界。

有些学者宣称“根本的不确定性”会导致虚无主义，因为如果这个不确定性存在，未来世界未知而且不可知，那么我们完全

① (译者注)有限理性指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的局限性。

② (译者注)It is better to be roughly right than precisely wrong.

无法推断经济政策是否能达到其预期目的。但我们很容易反驳这个观点：除了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不确定性一般会建立一种行为连贯性的基础上。经济组织和个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闻和其他事件时，一般不会贸然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Heiner, 1983)。也就是说，人们在没有得到足够的确切信息前，行为很难发生变化。

❖ 专题 1.2: 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中的诺贝尔奖得主

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琼·罗宾逊和尼古拉·卡多尔在他们过世前^①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一位在加拿大出生的美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在1996年因为他在信息理论方面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奖项宣布的三天后逝世。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们在听到他的颁奖演说后一定会非常惊讶。在维克里人生的最后12年里，他多次参加著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戴维森^②组织的学术研讨会。维克里(1997)认为现代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总需求的结构性不足。所以，只有大规模财政赤字才能实现充分就业。他强烈反对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那样限制财政赤字的政策。

① 他们分别于1983年和1986年辞世。

② Davidson和他的老师Sidney Weintraub共同创建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4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分支

方法和观点的多元化

现实世界有多种表现形式,这也是为什么非主流经济学家采用不同的方法。尤其对于后凯恩斯主义学者来说,这些方法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Dow,2001)。但是,这些方法也可能存在缺陷,就像 Walters 和 Young(1999)批评的那样,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可能给人一种缺乏一致性的印象。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多元论,也就是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后凯恩斯主义学派欢迎其他不同思想和学派的意见。例如,后凯恩斯主义学者经常在消费理论上同人文主义经济学家交换意见,也会在企业理论上接受制度经济学家的想法。

就像法国调节学派(French Regulation School)或者法国常规学派(French Conventions School)的经济学家,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从很多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得到启发,比如马克思、凯恩斯、卡莱斯基、卡多尔、莱昂惕夫(Leontief)、斯拉法、范伯伦、加尔布雷斯、安德鲁(Andrews)、乔治斯库-洛根(Georgescu-Roegen)、希克斯(Hicks)、托宾,还有一些其他学科(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和人类学)。所有这些理论和学科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真相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所有的方法,不管以数字还是以文字为表现形式,都是可以接受的。

基原主义者、斯拉法主义者和卡莱斯基主义者 (Fundamentalist, Sraffians and Kaleckians)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还远没有形成统一,目前有三个独立的分支:基原主义者、卡莱斯基主义者和斯拉法主义者(Hamouda and Harcourt,1988)。

基原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是戴维森(1972)和明斯基(1976),他们都是受到凯恩斯的启发。他们强调“根本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偏好、金融不稳定性以及方法论问题。这些通常被称作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学者认为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比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括性更强。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们一直以来的都在抨击新古典主义理论中一些模糊的论断,例如报酬递减原则。

斯拉法主义者则是受到了斯拉法的影响。同时他们也间接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启发。他们主要关注相对价格、技术选择以及多部门生产系统内部固有的独立性(例如投入—产出分析)。斯拉法理论还被贴上“剩余理论”的标签,因为他们的模型评估了生产中间过程所产生的剩余。

斯拉法的研究还强调联合生产(比如同时生产羊肉和羊毛)、固定资产的衡量以及价值的永定性选择。这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引起了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极大兴趣并于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公诸于世。这主要是因为两方面原因:(1)斯拉法的理论阐述了新古典主义分配理论的不合理性(Garegnani,1990;Pasinetti,1977);(2)它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过于简单化(Steedman,1977)。即使如此,斯拉法的理论仍然被认为是捍卫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的最后一块阵地,只是更加连贯和复杂化。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第三条分支是卡莱斯基理论(Sawyer, 1989)。卡莱斯基主义者主要受到卡莱斯基的启发,他们还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在马克思如何分析已实现利润的问题上),更直接的影响则来自卡多尔和制度主义者。卡莱斯基主义者更具有兼容性,他们的研究包括了微观经济学(比如定价过程)、宏观经济总体以及中观金融关系。

跟基原主义学者不同,卡莱斯基主义者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比新古典主义理论更具有概括性,但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更真实,对工业或经济其他部门更具有现实意义。

虽然很多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只遵循其中一种理论,但还有很多人受到所有三个分支的影响,其中包括阿尔弗雷德·埃西纳(Alfred Eichner, 1987)和爱德华·内尔(Edward Nell, 1998)。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斯拉法主义者和基原主义者之间(Arena, 1992),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批判方面。基原主义者认为新古典主义理论的错误在于它忽视了“根本的不确定性”、缺乏遍历性,以及与货币型生产经济相关的一些特征;斯拉法主义者否认新古典主义理论的依据则是新古典主义理论建立在以可变生产要素价格(真实工资、真实利率)为导向的调整机制的基础上,而这种用于表现相对稀缺性的假设被他们证明是错误的。

在罗宾逊(1980)看来,斯拉法主义者的批判往往被基原主义者和卡莱斯基主义者忽略是因为它是一种内在的批判,并没有引入很多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征,比如历史时间。

我们应当如何选择

一些后凯恩斯基原主义学者认为任何试图统一这三种分支

思想的做法都犯了策略性错误(Davidson, 2005)。最近一些学者在总结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时都将斯拉法主义排除在外,因为它的主题和方法都与其他后凯恩斯主义思想相距甚远。虽然在这本书中我并没有详细介绍斯拉法学派的核心思想,但从个人角度我依然把这个学派归入后凯恩斯主义思想中。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从历史和个人角度上讲,它跟后凯恩斯主义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第二,更重要的是,每当斯拉法主义者讨论宏观经济学时,他们使用的模型跟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非常类似。

如果我们跳过批评,重新来积极评价每种思想的贡献,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非常重视有效需求原则(King, 1995a, pp. 244-245)。例如,斯拉法主义者加里·蒙吉奥维(Gary Mongiovi, 1991)在有效需求基础上建立的就业模型得出与卡莱斯基模型类似的结果(参见本书第四章)。斯拉法主义经济学家海因兹(Heinz, 1994)所使用的基于有效需求理论的增长模型也是从卡莱斯基模型中演变而来(参见本书第五章)。达特(Dutt)和阿马德奥(Amadeo, 1990)在对分析三种思想的联系时,也提到“新李嘉图凯恩斯主义者”。

它们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共性。在讨论成本曲线的形状[比如,将本书第二章的内容与斯拉法主义者隆卡利亚(Roncaglia, 1995)和谢弗德(Schefold, 1997, ch. 17)的研究对比]或研究货币经济学时,我们可以发现斯拉法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密切联系。一些斯拉法主义者(比如 Carlo Panico, 1988)使用

内生货币^①模型并认为央行只能控制短期利率,这两个主题都是基原主义者和卡莱斯基主义者研究的中心内容(参见本书第三章)。此外,斯拉法主义者(比如 Roncaglia, 2003)在分析自然资源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的时候,没有使用任何稀缺性的假设条件。他们使用了一些后凯恩斯主义的关键理论,比如“根本的不确定性”和技术进步的固定增长率。

我们在这里要先作出声明,以下的章节更倾向于卡莱斯基的思想,而不是后凯恩斯基原主义思想。这主要是鉴于以下原因:第一,卡莱斯基有效需求理论更加清晰、真实、连贯;第二,模型的构架和难易程度也更容易让本书的读者所理解。因此,卡莱斯基理论代表了一种对“别无选择”理论的完美更正;第三,卡莱斯基模型非常灵活,它为很多非主流经济学家(比如马克思主义者、斯拉法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和调节主义者)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都是在卡莱斯基模型的基础上改进演化出自己的模型;第四,卡莱斯基模型很适合于计量经济研究,因为我们之前就提到,卡莱斯基自己就是一位计量经济学家。

最后,像其他的卡莱斯基主义者一样,我会尽量保持兼容并包的原则,将后凯恩斯学派所有思想融入到我们感兴趣的主题中。

❖ 专题 1.3: 后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

过去几十年里,新古典主义理论中新凯恩斯主义思想渐渐

① (译者注)虽然之前我们介绍过“外生”和“内生”两个概念的区别,但这里我们仍然需要强调“内生货币”的概念,因为它是我们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生货币”指的是央行不能任意决定货币发行量,货币供给是由市场的货币需求决定的。这个理论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完全背道而驰。具体内容我们会在本书第三章讲述。

兴起。这种思想在很多方面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无限制自由市场理论提出批评。那么后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之间有何联系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参见 Rotheim, 1996)。首先要肯定的是,他们属于新古典主义学派,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与他们所批判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同。然而,与后凯恩斯主义相似的是,新凯恩斯主义也有多个分支。

我们可以把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分支归结为三种。前两种有时被称作弱性新凯恩斯主义(参见图 1.1)。第一种试图解释名义变量的刚性(即非可变性),这种刚性被认为阻碍了经济的正常波动。从这个角度上讲,第一种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经济政策与新古典主义者非常类似。

在第二类分支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中包括了斯蒂格利茨等人,他们肯定了不对称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并尝试解释真实变量的刚性。对于他们来说,短期内工资和价格的可变性对于分析经济系统的最优化没有任何帮助。

第三类新凯恩斯主义者也被称作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Colander, 2003)。这类学者建立多重均衡模型,并将之归因于协调性问题。虽然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一般均衡理论和理性预期的影响,但它最接近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因为它质疑自然失业率和唯一自然增长率的存在(Van Ees and Garretsen, 1993)。这些模型具有复杂和混沌的动态特性,但这些特性破坏了它们自身的理论(Rosser, 1998, p. 293),因为它们宣称“在现实世界中不太可能实现理性预期”,而且他们也为“根本的不确定性”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基础。

这两个学派在计量研究,尤其是在货币政策和投资函数领域,也存在一些共同点。在这两个领域,他们都引入卡莱斯基所提倡的流动性限制。这个思想的主要支持者,被认为是新凯恩

斯主义计量经济学家的斯蒂文·法扎利(Steven Fazzari)实际上是一位真正的卡莱斯基主义经济学家!

然而,新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在约束最优化和有效需求领域分歧明显(Dutt,2003)。后凯恩斯学者认为有效需求理论在经济学里是关键的而且居于统治地位的,而新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总需求通常是外生的;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来自供给方面。

第二章 非主流微观经济学

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理论主要涉及了两个经济学概念：边际主义和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我们得到某种商品越多，从商品中获得的效用就越少。任何商品的重要性都由它产生的总效用来表示。商品的价格也是由多获得一件这种商品而产生的额外效用，也就是边际效用来表示。这就是边际主义。

最初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生产理论模型建立在消费理论的基础上。收益递减原则只是简单复制了边际效用递减原则。虽然学生们常常惊叹于这两项原则在分析消费者和企业理论方面所表现出的统一性，但它们并不是自然过程产生的结果；相反，它们是早先的新古典主义学者凭借对称性幻想虚拟构造出来的。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拒绝接受无差异曲线和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等量曲线和著名 U 形成本曲线。此外，在解释企业主和消费者行为规则方面，两个学派也有很大不同。

2.1 消费者选择理论

在发展消费者选择理论的时候,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借鉴了心理学家、社会经济学家、制度主义者、市场营销专家、行为学派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诸如尼古拉·乔治斯库-洛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 1996)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研究成果。德拉科普洛斯(Drakopoulos, 1992)指出,凯恩斯也很有可能支持这些非主流消费者理论。这些理论不是建立在公理之上,而是建立在可见的行为之上。Fontana 和 Gerrard(2004)指出,近期很多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在不确定性决策试验中都清楚地证明了后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正确性。

但在讨论后凯恩斯主义消费者选择理论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偏好(wants)和需求(needs)两个概念的区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他们的先驱者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门格尔(Carl Menger)不同,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经常混淆这两个概念。其实很简单,需求往往可以被划分等级或者层次,也就是说,需求是有等级体系的。而偏好则是由需求延伸而来并在某个特定的需求层次形成的不同选择(Lutz and Lux, 1979, p. 21)。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比喻来更好地表达这种差异:口渴表现为人们对水的需求,而到底选择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则纯粹取决于人们对哪种饮料的偏好。

消费者选择的七个原则

表 2.1 描述了七种用来诠释后凯恩斯主义消费者选择理论的原则。过程理性原则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讨论过。它是非主流经济学预先假设的一种。大多数消费者的决策都是自主

产生,而且符合常规和习惯。比如,人们在选择沙发的时候,颜色的选择跟皮质的选择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除非是购买非常重要的东西,否则消费者一般不会对消费品考虑得过于周全。也就是说,这种代价较小的非补偿性决策标准会使得消费者更快地作出决定。

表 2.1 后凯恩斯理论的七种消费者选择原则

过程理性 (Simon)	消费者倾向于遵从习惯、寻找捷径、使用非补偿性决策、对消费的满足(而不是最大化)
偏好满足 (Georgescu-Roegen)	当到达某一界限,需要已经满足,更多的商品不会带来更多的满足感
需求分离 (Lancaster)	消费者将需求和花销细分成许多种类,这些商品种类间的联系并不紧密
需求层次 (Georgescu-Roegen)	需求经常被划分成层次和等级,一种需求会高于或者低于另一种需求
需求增长 (Georgescu-Roegen and Pasinetti)	在划分好等级的需求层次中,时间的变化和收入的增加会转换人们的需求。
非独立性 (Galbraith)	需求收到很多外界事物的影响,比如公众、潮流、英雄人物、文化,家庭、朋友等等
遗传性 (Georgescu-Roegen)	当前的选择受到过去选择的影响

另外,消费者还会考虑到极限性,也就是满足需要原则。超过了一定的极限,购买额外的商品不会给消费者带来任何满足

感。虽然这看起来很像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新古典主义不饱和原则），但它们非常不同。后凯恩斯主义的满足原则存在于正价格和有限收入的基础上。

需求分离

接下来的两项原则最为重要，因为它们都在经济领域有强烈的反响。根据需求分离原则，我们可以对需求或者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进行清晰的分类。

如果只考虑各种商品之间的比较价格，我们几乎无法准确地将收入分摊到各种消费品上。但是，面对这种复杂性，消费者可以将自己的决定简单化和细分化。比如，他们首先把自己的收入定位在某些种类的消费品上，像食物、衣服、服务、休闲、住房和交通。在购买具体某种消费品时，他们再将其细分成互相独立的个体进行权衡。因此，每一笔开销都会以不同的可能性分配到细化后的个体之中。

细分后的某种的商品和服务相对价格的改变，不会影响到其他种类的商品和服务，它只会对同一种类内部的消费决策产生影响。举例来说，衬衫价格的降低可能影响到对裤子的需求，但不会影响到对服务业和计算机的需求。只有这个种类里面所有的商品价格全部增长，才会影响到其他种类商品的消费。比如，所有衣布类商品全面涨价会影响消费者在食品上的开销。

事实上，实证研究显示主要商品种类（民生类）的价格弹性^①非常低（在 $-0.003 \sim -0.072$ 之间），交叉价格弹性也接近

^①（译者注）“价格弹性”（Price elasticity）在经济学中用来衡量商品需求的数量随价格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如果价格弹性为零，则表示商品需求数量不会随着价格的变化而变化。

于0(低于0.02,参见Eichner,1987,ch.7)。也就是说,不同种类的商品之间几乎不存在替代效应。所以,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替代效应只有在同类商品之间才存在。

需求层次

如果我们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原则——需求层次,替代效应会被进一步削弱。这个原则来自于马斯洛(Abraham Maslow)和他的人文心理学派的金字塔形需求层次理论(从下至上的顺序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会按照层次来排列:收入首先会被用于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如果还有剩余收入,则消费者自由支配这部分收入,通常是按照优先等级购买其他种类商品。也就是说,消费的选择是按照字典顺序排列的。

根据这项原则,效用不能用单一数值来表示。如果效用存在,它应该用一个向量来表示,向量中的每个变量代表一种商品。这也就是乔治斯库-洛根(1996)所说的不可约性原则(principle of irreducibility),我们也可将其称作不可通约性原则(principle of incommensurability)。

※专题 2.1:后凯恩斯主义和字典序列

虽然后凯恩斯主义者从来没有系统的发展消费者决定理论,但是在很多著名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比如琼·罗宾逊,1956;鲁吉·帕西内蒂,1981,ch.4;爱德华·内尔,1992,ch.17;阿尔弗雷德·埃西纳,1987,ch.9;菲利普·阿雷斯特,1992,ch.5),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理论的踪迹。其中最有趣的发现来自于彼特·艾尔(Peter Earl,1983)。在拉沃(1992a,ch.2)的著作中也涉及本书所提出的七种原则中的五种

原则。我们还可以在德拉科普洛斯(Drakopoulos, 1994)的著作中找到对字典序列的严谨阐述。

如果我们一定要把需求分离原则和需求层次原则数量化,很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采用凯文·兰卡斯特(Kevin Lancaster, 1971)对商品特征的分析。

根据兰卡斯特的理论,消费者只是对某件商品的特性感兴趣,而不是商品本身。每件商品的特征都可以形成一个向量,所以全部商品累计起来会形成一个消费品矩阵。当矩阵被分解的时候,每种需求都会跟每类商品的一系列特征联系起来。这就是分离性原则。很多新古典主义学者也同意这种观点。

从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想讨论需求层次原则,我们就需要引入字典序列,也就是将每类商品的不同特征按照优先级顺序排列。兰卡斯特(1971, p. 154)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并将其称之为“支配法则”,但他并不是这个原则的忠实支持者。艾蒙格尔(Ironmonger, 1972)也同时采用了这种方法,并表示出极大的认同。

在不同种类的商品间,消费者无法投机买卖。不同种类的消费之间也没有替代效应。新古典主义理论的中心——阿基米德公理^①和“总替代效应”概念不再成立。“任何物品都有价格”和“任何物品都可以被其他物品替代”这两条假设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在同一类别的商品中才可能出现替代。

增长性、依存性和遗传性

在承认需求层次理论的存在后,这种层次结构是怎样组织

^① (译者著)“阿基米德公理”(Archimedes' axioms)指出,对于任何实数 x , 存在自然数 n , 使得 $n > x$ 。

起来的？我们怎样从一个层次转移到另一个层次？增长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和遗传性原则可以解释这些问题。增长性原则指的是人们会随着自己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自己的需求层次。收入效应可以解释需求在金字塔的不同层次中的进化。我们假设金字塔顶端的是道德方面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又涉及环境因素。

此外，如何去实现我们的需求？怎样了解我们的需求？需求的选择和进化受到我们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这其中包括时尚潮流和市场营销活动。这就是加尔布雷斯(Galbraith, 1958)提到的依存效应：消费者观察社会其他成员（这些社会成员或者是名人，或者是其他他们想模仿的对象），并试图模仿他们的消费行为。需求依存原则，有时也被称为需求非独立性原则，更像是一种炫耀性消费理念。就像范伯伦、布迪厄(Bourdieu)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强调的：人们的消费往往是为了满足别人而不是自己。

但是，依存效应还有另一种存在方式——遗传性原则，它更能体现需求的本质，而且也得到试验心理学很好的证明。它表明消费的选择跟这些选择的排列顺序是分不开的。乔治斯库-洛根认为习惯性选择就属于遗传性原则的范畴。人们从某些行为中得到的满足感取决于过去的经历、事件发生的间隔的时间以及过去所经历事件的持续时间和强度。遗传性原则将历史时间法则应用到消费者行为理论上：过去的选择影响未来的选择。这就像一种滞后效应：过去的经历决定了现在的局面。比如：如果人们最初选择了 X-BOX 游戏机，以后将不再购买 DVD。

❖ 专题 2.2: Rene Roy: 后凯恩斯主义消费者选择理论的最早支持者

1943 年，供职于法国路桥大学(l'Ecole des ponts et Chaus-

sees),同时也是 Maurice Allais 同事的 Rene Roy 教授在著名经济学期刊 *Econometrica* 上发表一篇名为“消费者选择理论中的需求层次和组别概念”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Roy 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满足性原则、非理性原则和层次性原则方面,发展了这种非主流消费者理论。我们摘录了部分章节来更好地说明他的观点:

“这些组别可以被构思并建立在下列事实的基础上:在消费用于满足较高需求层次之前,人们首先将收入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上面。这些生活必需品是为了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并受到人们生存条件、天气、居住特点以及其他社会条件的影响。因此我们能够将所有的商品和服务分成不同的组别,所有消费者只有在购买低层次组别的商品并实现基本生存需求后才会去消费其他组别的商品和服务。……

“通过对消费者现象的分析,我们认为满足人类需求的‘紧急性’这个概念创建了消费商品的等级架构,它们因此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组别,并且消费者在每个组别中的选择代表他们对不同商品的喜好。……

“只有在每个组别内,相对价格和个人偏好才能通过替代效应对某种商品的需求产生影响。”(Roy,2005,pp. 50,51,54)

对于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意义

不可约性原则包括了分离性原则和层次性原则。它意味着商品不能被看成相同的样式。也就是说,价格变化对商品需求量产生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例如,任意种类某件商品(比如某见小型工具)价格的变化都不会影响到人们对生活必需品(比如面包)的需求。但是,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变化则会影响到人们对奢侈品或者非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不可约性原则证明了某些政府干预措施的正确性：政府应当控制和补贴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来满足人们最根本的需求。这种干预政策也同样可以用于控制房租和公共房价。通过降低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多的人可以追求更高的需求层次。

对研究环境学的意义

我们可以用后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来解释环境学里一个常见的现象。很多学者都试图使用条件价值评估模型计算人们在选择更舒适的环境、更恶劣的环境或者保持野生环境不变的同时需要相应付出的金钱或得到的回报。这些学者近年来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比如投标)，但这些方案都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及其无差异曲线。

许多人在回答调查问卷的时候表明他们都在关注环境问题，他们声称不会牺牲环境来换取利益。其他被调查者的答案则有些滑稽地认为只有大量的金钱才能补偿他们所放弃的小部分环境。

但是，如果我们把环境看成人们在有限收入条件下的一项基本需要，他们的答案则是合理的。金钱不足以补偿环境恶化给人们带来的损失，或者衡量人们对环境的感受。所以人们的投标额要么为零，要么为无限大。这就是抗议投标方案(protest bids)(Spash and Hanley, 1995)。

❖ 专题 2.3: Jean Anouilh: 一位字典选择专家

Jean Anouilh, 剧作家, 也是著名的人类行为分析师。在下面这段摘录的场景中, 他描述了富商 Messerschmann 与年轻美丽却很贫穷的舞蹈演员 Isabelle 之间的对话。这段对话的背景是这样的: Messerschmann 的女儿爱上了领主大人, 而 Isabelle

冒犯了她。Messerchmann 正试图给 Isabelle 一些好处使她主动离开城堡。

M: 如果你能够不再见他, 离开这里, 我可以付给你钱, 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I: 不需要, 先生, 我以后不会再见他了。

M: 女士, 我不喜欢免费的东西。

I: 难道免费的东西会让你担心吗?

M: 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似乎是无价的。……我认为你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士, 我愿意表现出我最大的慷慨和诚意, 你想要多少钱?

I: 不需要, 先生。

M: 这个答案对我来说太昂贵了。

(Jean Anouilh (1972)[1951], *L'invitation au chateau*, Paris: Editions de la Table Ronde (Folio), Paris, Act IV, pp. 325-328)

这段对话就是字典排列的典型案例。当 Messerchmann 问 Isabelle 需要付她多少钱才能让她离开城堡时, 她的回答是“不需要”。这就是一个抗议投标方案。其他人无法购买她的意愿——是否选择离开, 即使这个意愿可以买卖, 那也是无价的。她的偏好是字典性的。Messerchmann 并没有错, 他也理解到这个问题的所在。所以当 Isabelle 回答说她愿意接受的价格为“零”时, 他会说: “这太贵了!”

❖ 专题 2.4: 环境经济学中的字典选择

假设人们必须在森林(质量或面积) f 和个人消费 y 中作出选择, 我们还假设只要人们的收入水平低于 y^* , 为了最大限度地消费, 他们会尽可能地追求高收入, 而不在乎森林的多少(也

就是环境的优劣)。但是,在收入到达一定水平之后,人们会倾向于森林数量最多的消费组合。所以,个人消费是人们的第一选择,森林只是他们的第二选择。在图 2.1 中,水平箭头的直线代表拟无差异曲线。随着曲线的升高,人们的满意度越大。但是在某一固定水平线上,右向的移动代表了更高的满意度。

如果收入等于或者超过了 y^* ,人们关心的问题就集中到森林的数量上,而收入具体多少则成为次要问题。拟无差异曲线变成垂直线。随着区间中的点向右方移动,人们的满意度越高。他们现在成为了“绿色”消费者。根据以上所说,人们偏好的顺序是 $A > C > B > D > E > G$ 。

我们假设某人在点 A 的位置,这时他拥有数量为 f_0 的森林和 y_0 的收入。那么他打算付多少钱来避免森林的减少呢?答案很显然是 $(y_0 - y^*)$,因为在 y^* 以下收入水平就变成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但这个答案很大程度上低估了森林的真正价值。随着森林数量的减少,这位绿色消费者发现自己的位置来到了 B 点。即使跟 C 点相比,他的满意度还是大幅度降低。我们又回到之前的问题,需要支付多少钱来补偿绿色消费者应为森林的减少而带来的损失?这个答案应该是不确定或者无限。

最终,当人们把森林作为自己字典选择中最关心的问题时,条件价值评估不足以解释这种无价值交换情况的出现。这种情况会在任何市场,甚至虚构的市场中出现。这种交易更像是一种勒索,但人们不会认为赎金和被勒索的事物或人具有同样的价值。因此,新古典主义福利理论是不成立的。人们只愿意支付 $(y_0 - y^*)$,否则人们将不再关心环境的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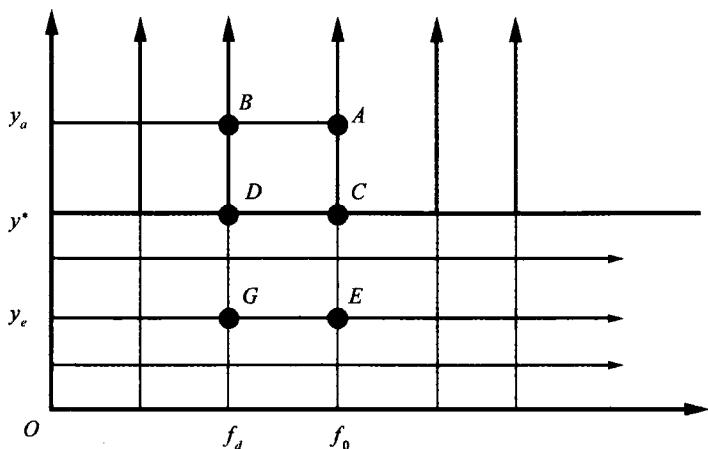


图 2.1 字典选择中的条件价值评估

2.2 寡头垄断市场和企业目标

后凯恩斯主义企业理论的特征

新古典主义企业理论建立在完全虚构的基础上：它假设小型工厂的收益递减，并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实现短期利润最大化，在利润最大化产量上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企业生存的条件是产品价格高于其平均可变成本。产品价格随着产品需求的增大而升高。

后凯恩斯主义企业理论与其有本质的不同。它强调的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尤其是寡头垄断市场。在寡头垄断市场中少数大公司在与众多小公司的竞争中占据统治地位。

因为某个企业的决策会影响其他企业，所以企业是互相依

存的。这就是说,企业决策必须考虑到其竞争对手以及还未进入市场的潜在对手的反应。因此,企业战略是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必须提前计划,采用的战略也必须有长远考虑。这种分析也体现在企业的定价决策上。在表 2.2 中,我们列出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多种定价方式和市场结构。

表 2.2 市场定价的不同方法

学 者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	新古典主义理论
Kalecki (1971)	成本决定价格	需求决定价格
Means (1936)	不可变价格 价格管制	可变价格 市场出清价格
Sawyer (1995)	企业决定价格 长期价格策略	市场决定价格 短期价格
Okun (1981)	价格制定者 价格标签市场	价格接受者 仲裁市场价格
Hicks (1974)	固定价格市场	可变市场价格
Chandler (1977)	管理中可见的手	市场中看不见的手

从这个角度上讲,“市场的力量”这个虚无而又万能的仲裁者是无法决定价格的。价格是由企业决定的。如果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那么它们会模仿同行业中大企业的定价模式,而后者则是价格的领导者。这些龙头企业必须制定商品的价格,而这个价格也成为这种商品市场的标尺。可以确定的是:价格不会出清市场^①,价格也不会导致需求和供给的平衡。

一些后凯恩斯主义学者[比如加尔布雷斯(Galbraith,

^① (译者注)“市场出清价格”(Market clearing price)也就是“均衡价格”,在这个价格水平下,市场中的商品供给等于商品需求。

1967)]强调,应该将企业拥有者和管理者的关系区分开,这也是后凯恩斯主义企业理论的一大特点。但罗宾逊(1956, ch. 7)则认为企业拥有者和管理者都怀有相同的目标:企业能够长期生存(除了个别情况,比如20世纪90年代金融市场的异常繁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需要制定一系列策略并付诸实践。

大型企业集团的一个特点是拥有很多工厂和企业,并提供种类繁多的商品和服务。就像我们在下面阐述的,它们的平均可变成本基本是固定的。

支配力和增长

很多研究表明企业管理有多项目标。但是为了生存,企业必须懂得如何控制市场环境。比如,如何阻止新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如何提高研发水平,如何协调供应商、金融机构,如何掌控企业未来发展和政府规章制度。企业必须拥有足够的市场支配力从而取得市场控制权,这也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市场支配力还能够使企业管理水平到达一个较高的社会层次并赢得公众的尊重。但是,作为管理的最终目标,市场支配力是一个模糊而且多方面的概念,因此企业具有很多更为直接的中间目标。

这些大企业和集团又是如何获得市场支配力呢?如果一个企业具有很好的销售业绩和较大的市场占有率,它就拥有较强的市场支配力。为了获得支配力和市场占有率,企业必须不断成长。因此,增长成为企业扩大支配力的手段。这也意味着如果企业一定要将某项指标最大化,这项指标一定是其增长能力。

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增长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根据罗宾逊(1962, p. 38)的观点:“资本积累的根源在于企业对生存和增长的欲望。”这条准则在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

可行的,无论是现在,100年前的范伯伦时代,还是50年前的加尔布雷斯时代。企业既不存在最优规模,也不存在收益递减。企业受制于它们的增长能力,而不是绝对规模。

卡莱斯基的风险递增原则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利润呢?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简单来说,利润有助于企业在金融市场和银行获得融资从而帮助企业增长。此外,未分配利润(或称为留存收益)可以为企业进行资本支出和内部研发提供更多的资金。

根据新古典主义理论,任何企业主都可以得到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阐述投资的重要性和未来的预期收益。这听起来很像新型的风险投资经济模式(互联网和软件开发)。但是这种经济模式在疯狂了几年之后就褪去光环并一蹶不振。

在现实世界里,企业发展经常会受到资金的限制。后凯恩斯主义企业理论与卡莱斯基(1971, ch. 9)的风险递增原则紧密相连。这项原则也与“根本的不确定性”有关。企业从金融市场或者银行所能获得的最高资金额度取决于企业的销售量,更确切地说,是取决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这是因为贷款人总是希望能够降低风险。因此,它们贷给企业的资金额是企业当前未分配利润的倍数。此外,真正的企业主(而不是诈骗犯)也希望将借款规模保持在一定限度内。他们担心过度借贷会让他们陷入缺乏流动资金或者违约的局面,从而威胁到企业生存。这是借款人的风险。

利润可以增加企业自有资金并保证企业拥有健康的财务状况,使得它们能够更容易获得来自银行和商业票据市场的援助。利润为解决企业在实现最大增长目标时所遭遇的资金瓶颈提供

了答案。

扩张边界理论

企业所追求的利润率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呢？后凯恩斯主义者(Wood, 1975)认为企业面临两个基本约束。一方面是资金边界,在卡莱斯基的风险递增原则的影响下,它将企业所追逐的增长率和为企业扩张提供资金的最低利润率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是扩张边界,它将增长率和企业希望达到的最大利润率联系起来。这两条边界也成为制约企业运行并影响其长远规划的条件。

在图 2.2 中,钟形扩张边界显示企业的增长具有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我们假设在增长率较低时,正效应超过负效应。在这个时候,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可以引进先进技术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润率。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企业在员工培训和普及管理哲学方面会感到捉襟见肘。这就是所谓的“彭罗思效应”^①。此外,快速增长还可能导致企业向陌生领域开展多元化经营,这会带来高昂的销售费用并降低利润空间。这些都会降低最大可达利润率,也解释了扩张边界后半段的下倾斜的特征。

^① “彭罗思效应”因经济学家 Edith Penrose (1959) 的名字而得名,彭罗斯同时又是琼·罗宾逊的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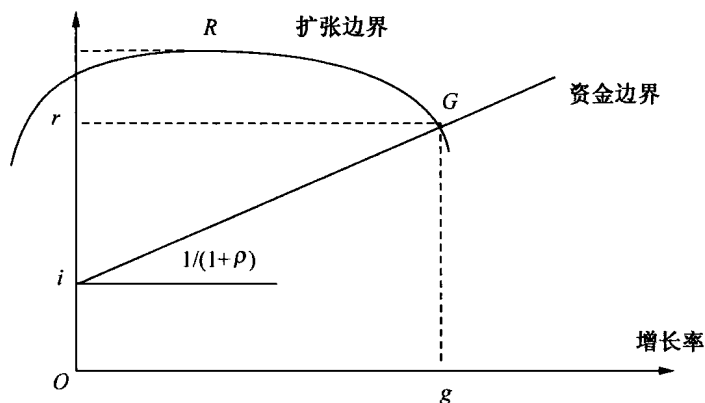


图 2.2 一个企业中的资金边界和扩张边界

资金边界

资金边界解释了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资金环境。企业可以通过使用自有资金(内部)、向银行贷款或向金融市场发行股票(外部)等方式为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我们假设外部借款是未分配利润的一个乘数 ρ , 并假设企业获得利润 P , i 为资本 K 的平均利率和股息, 那么以下公式就代表了最大投资值:

$$I = (P - iK) + \rho(P - iK)$$

如果我们两边都除以 K , 我们可以得到资本增长率 $g = I/K$, 资本利润率 $r = P/K$ 。移项转换后, 我们得到资金边界的表达式 (Marris, 1964; Sylos Labini, 1971)。这个公式说明在利率和股息等于 i 的条件下, 企业必须至少获得 r 的利润率, 才能保证以 g 的速度增长。这其中所有的三个变量既可以是名义值, 也可以是通过通货膨胀率计算出的真实值。经过一系列换算, 资金边界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r=i+g/(1+\rho)$$

两条边界的相交

图 2.2 描述了扩张边界和资金边界。两条边界相交于点 G,它代表了企业在受到竞争环境和资本限制时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这个点跟 R 点不同,后者是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就像哈维·雷布斯滕(Harvey Leibenstein, 1978)所描述的,企业因为很多因素导致的效用低下会使得它经常处于两条边界之间的位置,这也是它除了边界曲线唯一能达到的区域。

如果管理者希望企业能够以更高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希望 G 点向右移动。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相对于竞争对手,企业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或者开发出具有绝对优势(暂时性垄断)的新产品,从而推动扩张边界向外移动;第二,企业通过利率和股息的降低,获得更宽松的贷款环境使得资金边界向下方移动。

2.3 成本曲线的形状

大多数后凯恩斯主义者都使用莱昂惕夫型生产技术函数。在企业产量低于其最大生产能力的假设下(在以下分析中我们均使用这个假设),生产函数中的参数是固定的技术参数,它反映了企业机器、员工数量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因此,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否定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比如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这种生产函数假设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是替代关系。

一个企业往往会拥有一些工厂,每个工厂又可以分成几个

生产车间或生产线。一个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就是由这些工厂或生产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衡量的,所以也称作工程师定额生产力(Eichner,1976, p. 62)。每个生产部门的设计和运行受限于一定数量的工人和一定数量的工时。比如,每个职工一次只能使用一台计算机。即使有些时候这种操纵可以更加灵活,但官僚的规章制度(例如劳资协议和习惯)会使工人们集中在自己的机器上作业。所以固定的科技参数是对短期生产条件的最佳描述。

一些典型事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典型事实,这些也是后凯恩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核心所在(Eichner and Kregel,1975)

(1)单位直接成本和工厂的边际成本总体上保持不变,它们的上限是由工程技术人员数量所定义的工厂实际生产能力。

(2)一件产品的单位成本随着企业逐渐接近其实际生产能力而降低。(参见专题 2.5)

(3)企业的生产水平有可能会超过其实际生产能力,但会导致边际成本的上升。

(4)每个工厂实际生产能力的总和就是企业的最大生产力,也就是满负荷状态下的生产力(q_{ic}),企业一般在低于其最大生产力水平的状态下运行。从这个角度上讲,除了极个别情况,企业基本在单位生产成本不变的条件下运行。

当我们将历史时间和技术进步考虑在内,我们必须承认生产同种产品的旧工厂的单位直接成本要高于新工厂。所以,我们不能断定一个企业所有工厂的单位直接成本都是固定不变的。在这里,我们不考虑这种复杂的情况。我们假设当企业在其所有工厂展开生产程序时,不仅要考虑生产成本,而且还要考

考虑运输成本。

产能过剩

如图 2.3 所示,企业一般会以低于其最大生产能力(q_{fc})的水平运行。实际上,企业的生产水平经常保持在其最大生产能力的 70%~85%之间。很多统计和预测机构的研究成果都证明了这个典型事实。很多学者和专家发现企业会将自己的标准产能利用率(或正常产能利用率)定在 80%左右。为什么企业不去努力实现最大生产能力呢?毕竟那个时候企业的单位成本最低(参见图 2.3),它们为什么会剩余一定的生产能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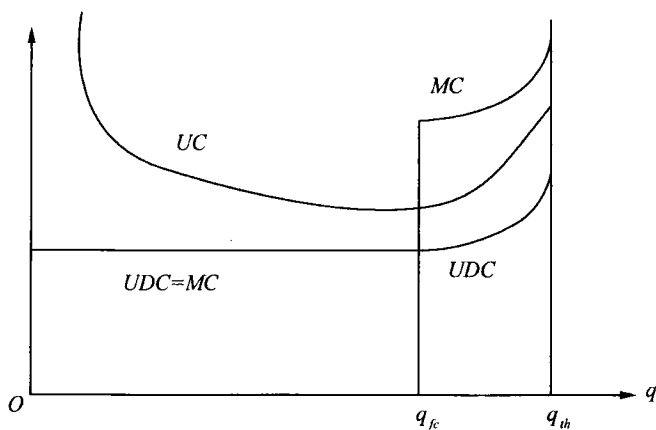


图 2.3 后凯恩斯成本曲线

除了不可分割性原则(一个生产能力饱和的工厂对于市场也许过于庞大)给出的解释之外,根本的不确定性原则再次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答案。在企业里计划性产能过剩扮演的角色如同个人手中的流动资金。家庭持有的活动资金或随时借贷的能力

可以使他们从容应对意想不到的现金短缺。同样,企业不可能百分之百预测到未来需求的变化。企业必须给自己留出一定的活动空间来应对意料之外的市场需求或自身的变化。因此,企业会暂时闲置一些工厂或者生产线从而更容易通过调整产量来适应市场的需求(Steindl,1952, ch. 1)。

※专题 2.5:直接成本、管理费用和单位成本

英国学者经常会使用直接成本(也称为“主要成本”)和单位直接成本(*UDC*)。这种成本包括工资、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成本。只要它们是不变的,单位直接成本就等于边际成本。这里所说的单位直接成本基本等同于传统微观经济学里的平均可变成本。

为了计算单位成本(*UC*),我们必须考虑到企业的一般开销。这种日常开销一般被称为管理费用或间接成本。这些成本指的是于生产过程监督和管理所需要的成本,以及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其他成本,比如运输成本。单位成本就是单位直接成本和单位管理费用的加和。在企业达到其最大生产能力的过程中单位成本会逐渐降低(Andrews,1949)。

单位成本跟传统微观经济学里面的平均总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平均固定成本)类似。但是,与平均总成本不同的是,单位成本不包括用于支付固定资本基本摊销费用的单位正常利润。

基于同样的原因,调整库存也可以用来适应市场需求。但是在始料未及的市场需求迎面而来时,库存往往很短时间就会消耗殆尽。其他的方法还包括增加工时、提高工资、调整工作结构等。这些措施都会使企业产量超过其实际生产能力并逐渐接近理论最大生产能力(q_{th})。但是这样会因缩短机器寿命而

提高生产成本,还会干扰正常的生产运行并最终导致顾客的流失。

如果需求系统性的超出预期并以更快的速度不间断增长,企业很难在中期内跟上市场的节奏。新建厂房和购置机器并不能一蹴而就。如果企业没有实行计划性产能过剩,市场需求增加的份额很可能被生产同类产品的海外企业或者竞争对手占据。因此,保存一定生产能力是企业驱逐潜在竞争对手进入市场的一个主要策略。

综上所述,企业倾向于在生产的同时闲置一部分生产能力来应对可能的需求激增,同时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深知顾客对所购商品的延迟供应毫无耐心。如果顾客当时不能买到某件商品,他们很可能去购买竞争对手生产的同类产品。然而,企业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这也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企业为什么会保存一定的生产能力,虽然这看上去是一种资源浪费。

❖ 专题 2.6: 关于产能利用率的问题

加拿大统计局作过一项年度普查(资产和修理费用调查)。这项调查涉及到 7000 个公司的产能利用率问题(美国人口调查局也一项类似的调查:工厂产能利用率普查)。在调查这些公司时,他们提出了如下问题:“2006 年,这间工厂以怎样的产能利用率运行?”这项调查对产能的定义进行了详细注解:“产能(生产能力)是工厂在正常条件(正常的员工节假日和休息时间)下所能达到的最大产量。”加拿大统计局提供了两个事例:

工厂 A 的工人每天一次轮班,一周工作五天。在这个条件下,企业的生产能力是每月生产 150 件产品。如果在这个月企业只生产了 125 件产品,那么工厂 A 的实际产能利用率为

$(125/150) \times 100\% = 83\%$ 。现在假设工厂 A 在周六也进行轮班用来满足市场需求的突然增长。根据工厂的运行条件,生产能力依然是每月 150 件产品,但实际产量达到了每月 160 件,那么实际产能利用率则为 $(160/150) \times 100\% = 107\%$ 。

2.4 价格设定

所有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都以成本加价定价原则为基础。为了制定价格,负责定价的相关部门首先需要确定单位成本是多少,并在这个基础上加入成本毛利率(与“成本毛利率”的概念不同,“利润盈余”是用来计算当前或者事后利润,而“成本毛利率”则用来计算事前利润)。价格总是在商品投入市场前确定下来(Brunner, 1975)。所以,就像米恩斯(Means, 1936)所说的,我们可以认为价格是被“管制的”。当然,不同商品之间的定价策略是互相影响的。半成品的价格对于使用半成品的企业就变成了成本(这种相互作用是斯拉法模型的关键要素)。

加成定价法(Mark-up pricing)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最简单的定价公式就是卡莱斯基本加成定价理论。实际上这是一种最古老的定价方法,但是因为这种方法较少涉及会计专业背景知识,所以目前仍然被一些小型和中型企业应用。因为其简单明了,所以这种定价法在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中最常被用到。

根据这种方法,价格取决于单位直接成本。单位直接成本加上总成本毛利(含有所有一般性成本、薪水和预计利润)得到产品的最终价格。

因为单位直接成本在任何生产水平下都基本保持不变(只

要产量低于最大生产能力),这就使得在这种定价原则下的会计账目核算并不复杂。

标准成本定价法(Normal-cost pricing)

最符合现实,同时也是大企业最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标准定价法,也被称作“标准成本定价法”。这种方法参考近些年会计的实践和发展,并能使企业将一般生产成本分摊到每一件产品上。按照弗雷德里克·李(Frederick Lee,1998)的观点,大型企业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使用标准成本定价法,而不是简单的成本加成定价法。标准成本定价法(有时也被称作“全成本定价法”)是由霍尔(Hall)和希治(Hitch,1939)在牛津大学研究企业行为时首先创立的。

在使用标准成本定价法时,企业首先计算标准单位成本然后加入净成本毛利(只包含利润)。标准单位成本包括所有直接和间接(管理费用)成本。但这种计算方法只能应用于当前企业的正常产出水平而不是估计或预期产出水平。更进一步讲,正常产出水平是企业生产的习惯性产出。企业通过自身和整体工业的标准、习惯和规章制度来制定正常产出的数量。正常产出水平是全产能水平和正常产能利用率的乘积。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企业无需知道在任意产量下相应的单位成本。它们只需要知道某一产量下的单位成本(此产量水平与正常产能利用率符合)。这就是标准成本定价法。这种标准单位成本不受需求变化的影响。

目标回报定价法(Target-return pricing)

很多研究证实大型和中型企业将产品定价跟它们的目标回报率绑定在一起。兰齐洛蒂(Lanzillotti,1958)在美国布鲁金斯

研究院的研究成果表明目标回报定价是标准成本定价的一种具体形式。在标准成本定价中,净成本毛利加价到标准单位成本上。这种净毛利包括当产品销售等于正常产出时企业资本目标回报率。这种方法是所有成本加价定价法中最复杂的,因为会计师需要对企业所用资本做出正确评估。

目标回报定价法非常接近于斯拉法多部门模型中的生产定价理论。实际上这里的目标回报率等于生产价格理论中的正常利润率。在斯拉法模型中,正常利润率类似劳动工资率在所有工业部门中相等。但在目标回报定价法中,利润率和工资率在不同的部门中可能相异。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斯拉法模型是基于目标回报定价法的多部门模型的一个理想版本。

❖ 专题 2.7: 成本加价定价模型的建立步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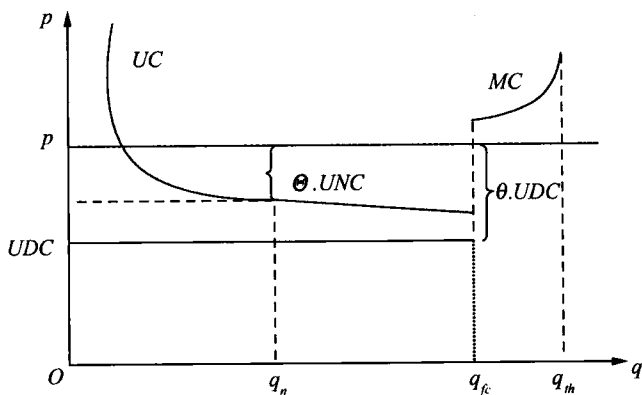


图 2.4 一般价格的设定

如图 2.4 所示,我们可以用下列方法建立不同的成本加价定价模型:

加成定价模型： $p=(1+\theta)(UDC)$

UDC 代表单位直接成本(平均可变成本), θ 是总成本毛利率。

标准成本定价模型： $p=(1+\Theta)(NUC)$

Θ 代表净成本毛利率; NUC 代表标准单位成本(标准平均总成本)。它在计算过程中使用正常或者标准产出水平, $q_n = u_n q_{fc}$, 在这里 u_n 是在最大产能(q_{fc})基础上的正常或标准产能利用率。

目标回报定价模型与标准成本定价模型相同, 但净成本毛利 Θ 的计算公式为:

$$\Theta = r_n v / (u_n - r_n v)$$

r_n 是目标回报率; v 是技术进步率, 也就是企业的资本价值与全产能下所有产出价值的比率。

生产价格

以下公式说明了斯拉法生产价格(参加 Pasinetti, 1977), 这其中并不涉及半成品。一件产品的价值是工资成本和资本利润之和:

$$p = wn + rMp$$

这里 p 是一系列价格的列向量; w 是工资率, n 和 M 分别是表示技术参数向量和矩阵, 前者代表了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劳动力数量(劳动生产率), 后者代表了单位产品所消耗的机器数量; r 是统一利润率。

经过转换,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p = wn[I - rM]^{-1}$$

这个公式与目标回报定价模型非常相似。在目标定价模型中, 我们通过把 Θ 代入标准成本定价模型中, 并假设直接成本等于单位产出所消耗的工资, 可以得到:

$$p = u_n w n (u_n - r_n v)^{-1}$$

斯拉法模型假设标准产能利用率(u_n)等于1,所以最后两个公式基本一致。此外,斯拉法模型中的统一利润率(r)也经常被其支持者称为正常利润率。它与目标回报定价模型中的目标回报率相同。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这些生产价格(无论回报率是否唯一)是怎样发生变化的。这个问题始终伴随着生产价格理论。目前有两种主要方法来解释这种变化。一种建立在“双重交叉动态”基础上。这种受到马克思主义和斯拉法主义经济学家(Dumenil and Levy, 1993)追捧的方法指出,价格会随生产和需求之间差额的变化而变化。第二种思想建立在标准成本定价模型的基础上,价格的变化受到成本变化的影响。其支持者中有斯拉法主义学者博吉奥(Boggio, 1980),他们更偏向于卡莱斯基主义分支。

2.5 成本毛利率的确定

建立于成本之上的价格真实吗

很多经济学家对成本加价定价法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这似乎是因为这种方法违背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企业竞争的理念。毕竟,人们很难相信企业在单位成本变化时都会随之改变产品价格。

这种说法当然不准确。我们必须认识到价格是标准单位成本的函数。在中期内,标准单位成本基本等同于实际单位成本,但在短期内,我们不去考虑导致实际单位成本变化的原因,这两种成本具有很大差别。当成本变化时,这种变化会改变成本毛

利率,而不是价格。这完全取决于企业在那时所采取的策略。实际上,库茨(Coutts,1978)和索罗斯·拉比尼(Sylos Labini,1971)的研究表明,企业根据单位成本的变化逐渐缓慢地调整价格。

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当前的国际商品市场中。在某些竞争激烈的工业部门或者在某些进口产品比例较小的市场中,外资企业会根据本地市场价格来定价。汇率的变动会给这种企业带来额外损失或者收益。另一方面,在外资企业占据主导的市场中,如果它们国内的成本上升或者汇率发生变化,外资企业会将这种变化施加给本地的消费者。这就是传导效应(Bloch and Olive,1995)。

价格领导者和价格接受者

以上的讨论可以让我们辨清设定价格的价格领导者和跟随价格领导者的价格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成本加价的方法解释了价格如何取决于直接单位成本或者标准单位成本。不管需求如何变化,这两种成本在短期内都是假设不变的。但是,卡莱斯(1971)认为,企业在根据单位成本设定价格的同时,也会考虑其他企业的产品价格。事实上,不管是竞争市场还是寡头垄断市场,所有企业对某种产品的定价都会趋于相同。

加成定价法和标准成本定价法的过程解释了那些在市场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格领导者如何设定产品价格。相对较小的企业,也就是那些价格接受者也会使用同样的方法,但它们还会参考价格领导者的定价。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外资企业也许不会将升高的成本通过提价的方式传递给消费者,这取决于它们在海外市场扮演价格领导者还是价格接受者。

效率较低的企业会承担更高的单位成本。这样一来,它们

就无法通过设定成本毛利率来获得标准目标回报率。它们不得不制定与竞争对手类似的价格。在短期内,它们能够保持市场份额并应对需求可能的突然变化。但是,在中期和长期里,只有懂得如何更新产品或者降低成本,低效企业才能实现标准目标回报率,否则市场会剥夺它们的利润。此外,竞争会导致低效企业的资金短缺,从而限制它们在扩大生产能力和研发方面的投资(Steindl, 1952; Kaldor, 1983, p. 47)。扩张边界和资金边界的交点会使高成本企业的增长率降低,因而减少它们的市场份额并最终导致它们的消失。

目标回报定价及其决定因素

什么决定了净成本毛利率?我们在之前的专题 2.7 中关于成本加价定价模型的部分介绍了它的决定因素:净成本毛利率与标准产能利用率成相反关系,与目标回报率和资本—产能率(如果管理层只关心近期投资的利润率,资本/产能比率也就是增值资本—产能率)成正向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假设标准利用率由公司或行业的规范制度决定,而且资本—产能率取决于工程设备,那么净成本毛利率最终由目标回报率决定。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目标回报率呢?或者说,是什么决定了正常利润率?表 2.3 给出了四个决定因素。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标准利润率由阶级斗争决定,也就是取决于企业主与工人谈判时的议价能力(劳动法、失业率等等)。卡莱斯基主义则认为除了阶级斗争,总成本毛利率和标准利润率还取决于企业的垄断程度,尤其是集中度和企业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的能力。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特别是在早期罗宾逊(1956)和卡多尔(1956)提出的增长模型中,经济的增长率和利润率有正向的

比例关系。这种关系在帕西内蒂的著作中也有提到。他将这种关系建立在“自然”经济的概念上,其中每个纵向整合部门的利润率等于这个部门的增长率。在斯坦德(Steindl, 1952, p. 51)和兰齐洛蒂(Lanzillotti, 1958)之后,很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比如 Eichner, 1987; Wood, 1975)都支持这个观点。这样就在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将企业增长率与其目标回报率或净成本毛利率结合起来。

表 2.3 决定目标回报率或标准利润率的多种因素

学 派	决定因素
马克思主义	阶级斗争
卡莱斯基主义	集中度和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的能力
剑桥学派	资本增长率
斯拉法主义	央行设定的利率

最近,斯拉法主义学者提出了第四种可能性:标准利润率取决于过去的利率水平或者未来预期的利率水平(Pivetti, 1985; Panico, 1988)。也就是说,如果央行设定的较高的利率,真实目标回报率也会随之升高。一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比如卡多尔和哈罗德)支持这种观点。他们都认为企业所付的利息也应该等同于其他成本,企业会将这种成本传递给消费者。

这些不同的决定因素彼此兼容吗

在以上给出的不同决定因素中,哪种对目标回报率的解释是正确的?我认为所有这些答案都具有一定正确性。实际上,它们都符合我们之前对扩张边界和资金边界的分析。例如,企业垄断能力的下降或者企业对工人议价能力的降低都会导致

扩张边界向下移动,从而在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导致标准利润率的降低。

对于那些试图将自己的增长率最大化的企业,它们在定价过程中所使用的目标回报率是被两条边界的交点所决定的。因此资金边界也可以被写成:

$$r_n = i_n + g_s / (1 + \rho)$$

每当利率趋势 i_n 升高或者增长率趋势(长期增长率 g_s) 上升时,目标回报率 r_n 就会升高。

正如我们看到的,资金边界和扩张边界让我们将不同的非主流方法联系起来。正因如此,需求的周期性上升会增加目标回报率,从而增加成本毛利率。否则,成本毛利率将不会随着需求的上升而增大。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个结论。

2.6 结论和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

很明显,以上的讨论对通货膨胀理论有深远的影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信总需求的增加是导致成本和价格上涨的原因,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坚决反对这种观点。除了少数经济部门(比如农业和原材料生产)外,需求的增加既不会升高单位成本也不会升高价格。这也是为什么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提倡使用原材料作为缓冲库存(Kaldor, 1976)。总之,通货膨胀并不是自然产物,它与制度和社会学因素有关,而这些都是可以被控制的。

第三章 宏观经济学中的 货币流通

全面认识货币和金融理论是我们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第一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支柱有效需求原则(也就是投资导致消费的过程)只有通过货币流通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更倾向于在解释就业和增长理论之前首先讨论宏观经济学货币理论。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古典主义学者(比如 John Fullarton 和 Thomas Tooke)的理论,他们又被称作“银行学派”^①(Panico, 1988; Wray, 1990)。这些学者反对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教

^① (译者注)“银行学派”(Banking School)认为,除了金银和钞票可以作为货币以外,其他信用手段也可以进入货币流通市场,也属于货币。市场中的货币数量由市场交易商品价格总额所决定。银行的作用是被动和消极的,它们只能提供货币来满足市场需求,并不能主动改变货币量。

科书所倡导的货币学派^①和货币数量论^②。银行学派对货币理论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这其中就包括内生性货币理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20 世纪早期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约瑟夫·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以及他们的前辈,瑞典学者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Bellofiore, 2005)都支持内生货币理论,而不是外生数量理论。很多著名的剑桥学派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比如卡多尔和柯汉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这是因为他们早期都接触过这些非主流观点。前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的时候就见过哈耶克,而后者则是维克塞尔著作的翻译者。

否定货币数量理论并支持内生货币理论的观点在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非常流行,甚至在货币主义的全盛时期这些声音都不曾消失。这些观点慢慢形成一种以货币循环和流通理论为代表的货币思想学派。这种思想受到凯恩斯名著《货币论》(而不是《通论》)的启迪,并与后凯恩斯主义思想非常接近。^③

货币数量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主要分歧可以用下面

① (译者注)“货币学派”(Currency School)由活跃于 19 世纪中期的一部分英国经济学家组成,与“银行学派”相反,“货币学派”或“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过度发行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因。为了限制货币发行,他们提出新增的货币发行量需要由等量的黄金储备作为支撑。银行的作用是主动和积极的,它们通过发行钞票或其他信贷方式增加货币发行量并左右物价。

② (译者注)“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代表主流经济学派的货币理论,它强调货币量与市场总体价格的正向关系。代表人物有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

③ 有两本著作强调了它们之间的联系(Deleplace and Nell, 1996; Rochon and Rossi, 2003)。

一段话归纳。这段话取自流通学派早期的一位领袖级人物于1962年发表的文章中：

现在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来诠释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数量理论学者和凯恩斯本人相信货币的数量是由银行系统独立设定的。……而银行学派和Wicksell则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银行决定的不是数量而是价格。银行系统为货币市场设定一个比率（或者一些比率），并在借款者能够提供良好抵押的基础上满足他们所有的借款要求。

(Le Bourva, 1992, p. 449)

“新共识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理论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流通理论学者宣称银行学派的统治即将到来而货币数量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后者随着货币主义的提出而达到不可思议的高度。直到最近，形势才发生变化。后凯恩斯货币主义理论慢慢地融入到近些年的新凯恩斯思想中，这也就是很多央行支持的“新货币共识”。一些美国教科书已经开始使用维克塞尔的观点(J. B. Taylor, 2004; Cecchetti, 2006)。

但是，“新共识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一个本质的区别在于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从根本上否定了被广大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的维克塞尔可贷资金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在没有货币的环境下，利率是可贷资金和真实投资之间的均衡价格，也就是说，利率使当前的投资倾向符合资本利用率。这就是自然利率的概念。央行的工作就是将它们设定的并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利率与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真实利率（自然利率）等同起来。当市场利率（真实值）低于真实利率就会产生通货膨胀。但是，

后凯恩斯主义者坚决反对自然利率的存在 (Rogers, 1989; Smithin, 2003)

除了这些,“新共识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之间还存在一些其他不同。虽然大部分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的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没有长期影响,但后凯恩斯主义者却不那么认为。后凯恩斯主义者相信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和长期内都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参见表 3.1)。

表 3.1 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货币的不同特点

特 点	后凯恩斯主义思想	新古典主义思想
货币的来源	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必须有其他参照物	是从直升机上洒落的 (央行凭空投放)
货币的形式	既是流量又是存量	存量
货币进入经济的方式	通过生产过程	通过交换过程
货币供给的特点	内生	外生
因果关系	贷款产生存款	准备金产生存款
利率	是影响分配关系的变量	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
基准利率	由央行设定	受市场影响
紧缩性货币政策	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只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自然利率	具有多重值或者根本不存在	是唯一的
信贷定量配给的原因	缺乏信心	信息不对称

3.1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分析的主要特点

反向关系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根本点是内生货币理论。在这里央行不能任意设定货币投放量。货币供给量是由商业银行借贷需求和公众需求决定的。货币供给量无法独立于市场需要而存在,也就是说,是贷款创造了存款。

因此,跟主流经济学理论不同,贷款跟存款之间的关系式是相反的。银行在实施贷款行为时不受存款的限制。货币贷款和之后存款的产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过程发生前不需要受到黄金或者储备金的限制。就像之前勒布瓦所说,整个过程唯一需要的就是借贷者拥有合适的抵押条件(Heinsohn and Steiger, 2000)。

另外,贷款的产生不是因为商业银行拥有超额准备金。在这里,因果关系也是相反的。后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银行首先增加或者延长贷款,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存款。然后,如果银行客户需要提取钞票(现金或支票),银行可以直接从央行处获得。银行也可以从央行处获得它们的法定准备金(Moore, 1988)。

高能货币(准备金和现金)就如同银行货币(银行存款)都是内生的,是由需求决定的。央行无法随心所欲地设定它。事实上,高能货币的数量与银行贷款的提供量和银行存款的数量(通过贷款除数的作用)有直接关系。银行存款不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是高能货币的乘数,正确的理解是,高能货币是银行存款数额的一部分。

这里讲到的反向因果关系是基于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另外

两种重要的反向关系。第一,我们已经指出企业投资创造储蓄。投资既不需要储蓄,也不需要存款作为支撑。只要这个国家的经济资源没有被完全利用,完成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资本投入就取决于借款者的信誉和已存的金融规则。金融资源的稀缺性只建立在常规之上(Parguez,2001)。

第二,通货膨胀不是因为货币发行量的过度增长而导致的。即使两者有关,因果关系也是反向的。价格和产出的增长率导致了货币存量的增加。通货膨胀是由其他因素产生的。

信贷经济和资产经济

在讨论货币理论的时候,我们应该对相关的制度体系保持清醒的认识。当今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主要指美国和英国)金融系统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和亚洲国家的金融系统有很多不同。虽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有些差别在逐渐消失,但还有很多仍然存在。正是这些差别导致以外生货币理论为基础的货币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的货币理论教科书中从来没有占据过主要位置。

最关键的差别表现在希克斯(1974)提到的欧洲和亚洲普遍存在的“信贷经济”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使用的“独立经济”(目前广泛接受的说法是“资产经济”)之间的区别。

在信贷经济里,货币是内生的,商业银行是央行的债务人。但在资产经济中,大家通常认为货币是外生的并受到央行的控制。虽然这两种情况足够反映不同国家在不同制度下央行的特点,但并没有说明理论结果。也就是说,这种区别表面看来并无法解释货币是否内生。然而,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无论一个国家采取怎样的金融制度,货币都是内生的。他们的观点是:当代金融系统在一个相似的框架中运行,这个框架就是我们之前提

到的反向因果关系。即使这种反向关系在信贷金融系统中更加清晰,但其作用在资产经济中也没有丝毫的减弱。

外生利率

在当代经济中,金融资产种类繁多,并且每种资产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回报率。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回报率中至少有一种是直接由央行调控,并成为金融市场中其他回报率(至少是短期利率)变化的参照点。虽然这个参照回报率的名称很多,比如关键利率、官方利率、关键政策利率或运行目标利率,但我更倾向于称其为“基准利率”(benchmark rate)。这是因为它是短期货币市场中其他利率的基础。

基准利率曾经是央行贷款给商业银行的利率(比如加拿大的“银行利率”或者美国的“银行贴现率”)。很多将公开市场业务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的国家曾经将基准利率作为短期国债(例如1~3个月的国库券)的回报率。然而,多数国家现在将基准利率与银行间的拆借率(interbank rate)或隔夜率(overnight rate)联系在一起。银行拆借率指的是商业银行之间每天在隔夜市场中借贷资金所遵循的利率标准,在美国也将其称为联邦基金率(federal funds rate)。

基准利率则是目标隔夜率,它是央行希望达到的隔夜率。在加拿大,它指的是“隔夜率的目标水平”;在美国,它指的是“联邦基金率的目标水平”;在英国,它是英格兰银行“两星期回购利率”;在欧盟,它是欧洲央行设定的“再融资主导利率”(或称“主导利率”)。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央行将基准利率目标定为3%,这个目标基本可以准确实现。有时基准利率会有细微的偏离,比如2.99%或3.01%。符合这种情况的国家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还有一些国家不能准确实现它们的目标基准利率。部分原因是央行无法完全、准确地了解金融系统中准备金的数量。此外,商业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数量也会每天变化。欧洲和美国的货币体系就是这类情况的典型代表。但是,美国的基准利率(目标值)和实际联邦基金率的平均价差也只有7个基点。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拆借率或者隔夜率是银行之间互相借贷高能货币时所依据的利率水平(借贷期限可能是一天、两天或者七天)。这种利率非常接近回购利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包括央行之间互相借贷政府短期国债或其他债券时所依据的利率水平,借贷期限可能是一天、两天或者七天)。在美国,美联储通过增加或降低准备金来干预短期国债市场用于实现目标联邦基金率。

这种货币机制非常强大:央行能够引导市场隔夜率大体达到目标基准利率水平。当然,市场知道央行能够实现其目标利率。因此,当央行决定改变基准利率的时候(比如,当它决定将基准利率提升25个基点),它不需要干预和改变流动资产结余:央行只需要宣布一个新的目标水平,其他短期利率会立即随之变化。这就是利率外生性的典型范例。

3.2 商业银行和央行之间的关系

央行发行的高能货币包括了现钞和商业银行放置在央行账户中的存款(也就是准备金和商业银行的清算余额)。很多后凯恩斯“水平主义”(horizontalist)经济学家,比如卡多尔(1982)、巴兹尔·摩尔(Basil Moore, 1988)和路易-菲利普·罗尚(Louis-Phillippe Rochon, 1999),都认为央行随时都会根据商业银行系统的需求来提供高能货币。高能货币是完全内生的,在以利

率为垂直坐标的图中,其供给曲线可以用一条水平直线来表示。

很显然,现钞必须是内生的。我们很难想象消费者无法从他们的银行账户或者 ATM 取款机中提款。当然,这种情况也许会发生在银根极端紧缩的情况下(比如 2002 年的阿根廷),但那只是极个别的案例。这也说明,关于高能货币内生性的讨论必须集中在准备金的作用上。

信贷经济

在信贷经济中,高能货币的内生特性是非常明显的。当商业银行需要现钞或者准备金时,它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从央行借款。这也是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银行系统的运行方式。

图 3.1 描述了欧洲央行以及整个银行系统的资产负债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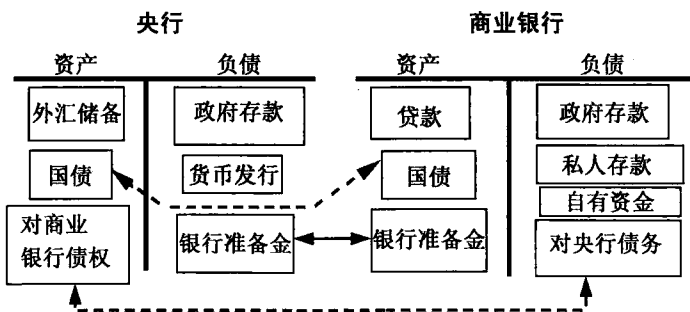


图 3.1 简易资产负债表: 央行和商业银行系统

资产负债表的基本规则是它必须处于平衡状态。也就是说,当商业银行系统的准备金增加时,这种变化必须被商业银行其他资产的减少或者负债的增加抵消掉。同样,如果商业银行放置在央行的储备金增加,也就是说央行的负债增加,央行必须相应地减少其他负债或者增加资产来保持资产负债表的平衡。

在信贷经济中,商业银行不会持有政府债券。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向央行借款的方式来获得额外准备金。因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在信贷经济中,央行为商业银行提供贷款的良好意愿有效地补偿了商业银行由于贷、存款增加所导致的准备金需求量的增加。

资产经济

根据上面的分析,对于在不同制度下运行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银行系统,我们是否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呢?

资产经济的一个很大不同点在于商业银行很少向央行借款(有时根本不借款)。我们在本章 3.1 中谈到不同制度下的金融系统不会对货币内生理理论产生影响,可是我们如何使资产经济的特点符合这个结论呢?

图 3.1 给了我们两个答案。第一,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将政府债券(国债)卖给央行来获得额外准备金。这也就是很多教科书中所说的“公开市场业务”。

如今,这种操作以央行回购债券和再回购债券的形式存在。央行并不是直接购买国债,也不会将其持有很长时间。央行同意购买债券的条件是商业银行在第二天或者很短时间内会赎回这些债券。然而,当我们思考这些交易的本质时,我们会发现央行的回购操作其实与信贷经济中的央行对商业银行贷款(或债权)非常相似。通过回购,央行同意商业银行以国债或其他债券作为抵押品来获得更多的准备金(通常时限为一天)。

第二个答案是央行可以调整它和商业银行之间的政府存款。这也是信贷经济中央行常用的手段。当央行决定将政府存款转移到商业银行账户时,它就增加了对商业银行的贷款,也就是产生了更多准备金。

由于政府支出或缴纳税款通常会造成准备金浮动,这种更加灵活的操作越来越多地被央行应用。比如,当政府消费时,它会从它在央行的账户中提取高能货币并转移到收款者在商业银行的账户中。准备金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同样,当人们缴税时(通过支票),过程正好相反,货币从个人的银行账户转移到政府在央行的账户,从而降低了银行准备金。在这两种情况下,央行通过反向调整政府存款来减弱其对准备金的影响。

在无存款准备(reserve requirement)的国家,比如加拿大,或者存款准备非常少的国家,比如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准备金的内生性非常明显。在这里,央行更像是一个结算中心,它确保某些银行每天产生的赤字会被其他银行产生的盈余抵消掉。隔夜率保证了清算过程的完成。所以,央行所宣布并力图达到的同业拆借率会作为基准利率来主导银行间的协商。

在开放型经济中会怎样呢

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提到央行资产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外汇储备存量。在传统的开放型宏观经济模型中,也就是固定汇率下的蒙代尔—弗莱明(Mundell-Fleming)模型中,商业银行必须通过央行将外汇收入兑换成本国货币,因此外汇的流入会导致国际收支顺差并使得更多的高能货币注入市场。这样又导致银行准备金的增加,从而通过货币乘数理论增加银行贷款和货币供给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固定汇率制下的开放型经济中,货币是内生的。

这个结论跟后凯恩斯主义所提倡的内生货币理论一致吗?答案是否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型中,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不是由市场对信贷需求的扩张而产生的。实际上,这个增加量跟需求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毫无疑问地否定了这种分析,并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方法:补偿性原理(compensation principle, Lavoie, 2001)。

在货币型生产经济中,只要贷款申请者符合信用要求,银行会根据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提供贷款。银行不需要持有超额准备金来扩大信贷规模。在信贷经济中,商业银行将外汇收入用于偿还其所欠央行的债务。对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而言,外汇储备的增加(也就是外债持有量的增加)会被对商业银行债权的减少(内债持有量的减少)完全冲销掉。最终结果是,央行的资产,或者货币存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同样的机制也存在于资产经济中,央行发起并主导了这种补偿性过程(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内生性冲销过程”)。但是,这种冲销是自动进行的:央行会主动吸收商业银行所不愿意持有的超额准备金,并提供给商业银行相应的国债或其他短期债券来交换这些准备金,同时商业银行也更倾向于持有前者因为它们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息回报。央行也可以选择降低商业银行所持有的政府存款。无论使用哪种方法,每天结束时所有准备金都会被完全清零(Godley and Lavoie, 2005-2006)。

央行反应函数

通过分析,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央行既不能控制总货币供给,也不能控制高能货币的供给。实际上,央行总是按照银行系统的需求来提供相应数额的高能货币。例如,加拿大央行能够准确地计算出银行系统整体清算余额并补偿商业银行进项和出项的差额。正因如此,加拿大央行可以准确地实现其基准利率目标。然而,美国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因为在运行方式上的细微区别,美联储只能依赖银行系统准备金的估算值而不是精确

值。所以联邦基金率只能接近目标基准利率的水平。但是短期利率是外生变量这个事实不容否认。

就像刚才讲过的，央行会根据一定的经济目标来调整基准利率。比如，当经济繁荣时，也就是产能利用率升高或者失业率降低时，央行会提高基准利率水平。当通货膨胀相对于目标值升高时（或者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央行也会提高利率。在其他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央行提高利率也许是因为房价和股市过热。基准利率水平也跟其他国家的基准利率水平有关。当然，当相反的情况发生时，央行会降低基准利率。

这些活动都可以被描述成央行反应函数[最好的例子就是泰勒规则(Taylor Rule)]。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受到系统中其他变量的影响，利率不再被看作是纯粹的外生变量。货币供给量必须被描绘成一系列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水平直线，从而重新形成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虚线(图 3.2 中的 H^s 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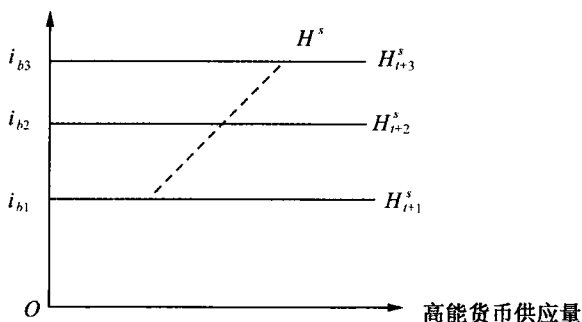


图 3.2 央行反应函数：一系列水平的货币供给曲线

然而，后凯恩斯主义者仍然认为基准利率是外生的：不同时间的货币供给曲线都是水平的。虽然央行会根据国内外发生的不同经济事件来调整基准利率，这不代表利率是内生变量，这是

因为利率的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央行独立的判断能力。基准利率并不是一个市场现象。当经济上升时,央行也经常会选择不提高基准利率和其他短期利率。

3.3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

初始和最终融资

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互相作用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企业拥有银行存款和一些金融资产。但是,银行和企业最重要的关系是债务关系,也就是银行同意为非金融企业的生产活动提供贷款。

这里的关键因素是时间:除了个别服务行业,大部分的生产和服务都需要消耗时间,企业必须想方设法在取得销售收入之前支付员工工资和支付供应商货款。我们当然可以假设企业有一定储蓄来完成资金周转。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需要依赖银行贷款,这种依赖甚至发生在企业生产之前。这种初始融资与企业生产的产品无关。所有企业,不管它们是生产消费品,还是生产投资品,都要依靠贷款。此外,在经济稳定发展的过程中这个逻辑同样成立,这是因为银行会保证企业贷款的持续和更新。也就是说,银行必须同意企业债务的滚动和累积。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与一些货币流通理论的支持者(比如 Graziani, 2003)一起对生产活动的初始融资和投资活动的最终融资作了区分。前者产生于企业向银行的借贷活动而后者往往发生在金融市场。戴维森(1982)分别用“建设性融资”和“投资性资助”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区分融资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

购买资本品的企业必须拥有足够的财力。除了他们的自有

资金(也就是未分配利润),企业必须通过银行系统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比如基金公司或保险公司)直接或间接地获得私人存款。^① 这种最终融资也是整个生产循环的最后阶段。

贷款信用的最高额度

银行和借款者在贷款合同中所商定的信贷额度在生产的初始融资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额度使融资更加灵活。在贷款利率确定的条件下,银行在合同中敲定的最高信贷额度规定了银行能够给企业提供贷款的最大值(Wolfson, 1996)。贷款利率有可能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借款者需要支付一定费用来确保这个固定利率;也有可能是浮动的,这时的利率水平是某些市场利率(比如短期债券利率)的加成。最终,信用额度的附属利率会遵循市场利率的变化而变化。

图 3.3 说明银行会根据企业负债的不同制定不同利率。对于其他条件相同的企业,银行会对负债率高的企业设定高额利率,因为提供它们贷款需要承担更多风险。当企业在金融市场中发行商业债券的时候,这种等级差异同样存在。图 3.3 描述了卡莱斯基风险递增原则(Kalecki, 1971, ch. 9)。这个原则最早产生于 1937 年。

^① 这里,获得私人存款指的是企业通过上市或者出售债券等长期融资方式取代银行贷款这种短期融资方式。对企业来说,这种长期融资风险性更低。它们通过投资银行等金融中介在市场上发行债券、股票或基金,以高额回报率鼓励人们将私人储蓄投资于金融市场,从而达到融资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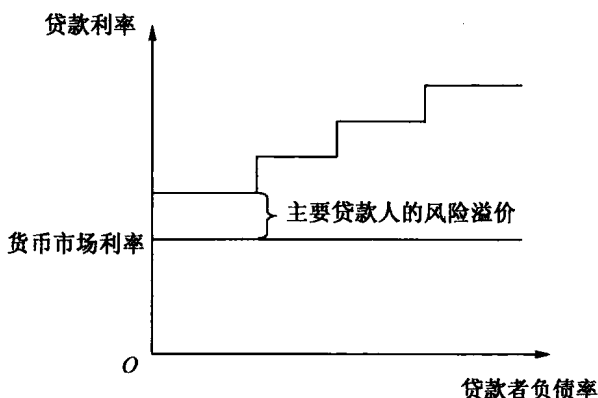


图 3.3 卡莱斯基的风险递增原则

信贷分配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中心是内生货币理论，这种理论渗透到货币经济的方方面面。首先，像上面提到的，央行会根据之前的需求状况提供银行准备金和现金。其次，每当人们希望持有一定比例的银行存款的时候，银行存款就会根据人们的这种要求而产生。但是，我们又是如何解释那些人们或者企业愿意短期持有并将很快花掉的货币呢？换句话说，我们怎样看待信贷货币呢？信贷货币也是内生的吗？

一方面，后凯恩斯主义认为信贷货币的供给也是内生的。这意味着银行总是主动满足企业的贷款需求。而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市场上总会有一些客户处于凯恩斯所描述的“不满意的边缘”（1930, vol. 2, p. 364）。也就是说，后凯恩斯主义也承认了信贷分配的存在。这两个论点难道不矛盾吗？它们是否对信贷

货币的内生性提出了质疑？

实际上答案很简单：银行总会满足那些信用良好的借贷者的需求。不满足银行贷款条件的借款人是不能得到贷款的。只有借款人信用良好，也就是他们能够按期还款，银行就会借款给他们。因此，银行的贷款只会有限地提供给那些优秀的或信誉度高的借款人。

当然，这导致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银行是否可以分辨出借款人信用的高低。银行通常使用多种复杂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银行把借款人归为不同风险类别，这种分类取决于借款人的历史记录、过去跟银行的关系、贷款资助项目的种类以及负债率和流动资金率（用于评估借款人现金流和利息负担）。那些不能满足贷款标准或抵押标准的借款人将会被拒绝。当然，那些满足所有条件的企业或个人就可以通过信用额度来满足日常财务需要，并开始生产过程。

※专题 3.1：后凯恩斯主义学者眼中的信贷分配

我们能够区分两种不同的信贷需求。总信贷需求包括了信用度较高和信用度较低的两种借款人的需求。这种需求也被称为信贷名义需求 (notional demand)。但是，由于银行只考虑那些信用良好的借款人，所以总的来说与之相关的只有信贷的有效需求 (effective demand)。这种需求只包括符合信用标准的借款人 (Lavoie, 1992a, p. 177; Wolfson, 1996, 2003)。如果我们假设一个平均贷款利率 i_1 ，A、B 之间的距离指的就是信贷分配。如果利率上升到 i_2 ，借款的成本升高，希望借款的企业和家庭也就更少。这在图 3.4 中表现为斜率为负的名义需求曲线。此时更多的借款人无法到达银行的贷款标准。换句话说，符合信用标准的借款人更少。结果，更多的借款要求被否决。当利

率上升的时候,如图 3.4 所示,名义需求和有效需求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增大。

银行的贷款利率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 i_b 指的是央行的基准利率,也可以延伸为货币市场的主要利率(比如短期国债利率或隔夜率);另一个部分反映了风险溢价 σ 。因此我们可以写成下面的形式:

$$i_t = i_b + \sigma$$

这样我们可以发现贷款利率的上升是由两个潜在因素导致的。第一,由于贷款利率是以央行设定的基准利率为基础的,任何基准利率的上升都会导致贷款利率的增加。另外,银行也可以通过提高风险溢价 σ 来调高贷款利率与基准利率之间的差额。对贷款的有效需求建立在给定的风险溢价的基础上。因此,当银行决定增加风险溢价时,它们实际上在提高贷款标准。这就使得有效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如图 3.4 中,有效需求曲线移向虚线位置)。因此,每一个风险溢价水平都会对应一条有效需求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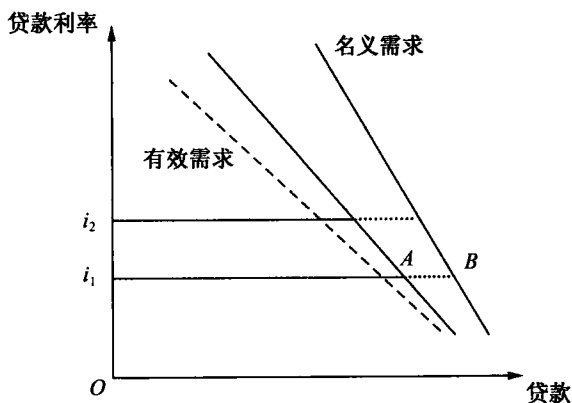


图 3.4 信贷分配:名义需求和有效需求

银行的流动性偏好

流动性偏好的概念也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中心议题，但很多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应该广义地理解这个问题(Dow and Dow, 1989)。虽然这个概念往往跟普通家庭的资产组合决定(就是人们如何决定资产中现金和其他金融资产的持有比率)有关,但它也可以被延伸到企业和银行的行为中。

对企业来说,他们的流动性偏好决定围绕在如何购买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上。对银行来说,流动性偏好指的是它们是否延长贷款。比如,具有较高流动性偏好的银行一般不愿意增加贷款,或者承接新客户。因此,我们可以在银行业中用流动性偏好这个概念来衡量银行向潜在借款人提供贷款的意愿。这体现了银行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信心。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衡量银行的流动性呢?这个绝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目前还是有很多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资产经济中,银行持有政府债券,我们可以用无风险债券与贷款比率来计算流动性。在信贷经济中,我们可以通过银行资本与贷款比率来计算流动性。实际上,国际清算银行(BIS)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同时考虑到资本充足率,来计算银行的偿付能力。

还有一些其他方法来计算银行的流动性偏好。比如,当银行对未来企业偿还贷款的能力表示悲观时,它们会提高贷款标准。这样一来,一些企业就不再符合贷款标准。银行会要求企业降低负债,增加现金流或提高抵押品标准。

因此,在不稳定的环境里,流动性偏好会升高。这样就带来两个结果:第一,贷款利率会升高。由于银行预期会有更多贷款违约或拖欠行为,它们会提高风险溢价来抵御风险,从而确保自

身回报率。第二,在更严格的标准下,很多借款者将无法得到贷款,他们的信用度受到质疑。

还需要注意的是,类似的行为也支配着金融市场。当市场恐慌时,政府债券和垃圾债券(高风险债券)之间收益的差额在不断增加。这也是反映经济情况的首要指标。

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和稳定悖论(Paradox of tranquility)

虽然银行会使用很多方法来评估借款者的信誉度,但这些方法基本上都是非常主观的。它们都依赖于银行对借款者的信心。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 1976, 1981)是研究银行及借款者行为的发起人之一,通过分析两者的互相作用,他揭示了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

明斯基的研究受到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和激进主义经济学者的追捧。他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FIH,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或被称作金融脆弱性假说(FFH, Financial fragility hypothesis)用华尔街的视角进行经济分析。与很多其他金融专家不同^①,明斯基认为家庭、企业和银行更倾向于在经济繁荣时期或者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时采取更为冒险的行为或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他主张银行应当降低风险溢价和贷款标准,并接受更高的债务负担(也就是第二章中所讲的参数 ρ 增大)。与此同时,所有普通家庭,企业和银行希望持有更小份额的流动性资产。这就是稳定悖论:稳定性孕育了不稳定性。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和高增长率会最终导致更加脆弱的金融环境。

更多的投机行为也会随着金融市场脆弱性的增加而出现。实际上,企业和银行利用债务作为杠杆彼此竞争,普通家庭会随

^① 比如 Gordon (1997)认为富有的企业家会越加谨慎。

之效仿,从而拉高了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最终,央行介入并加强信贷约束条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提高基准利率。

因为此时市场已经具有较高的债务负担,利率的升高加快侵蚀本已脆弱的金融系统。企业和个人很难支付其债务利息。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一定会通过提高风险溢价和紧缩贷款标准来改变行为方式。除非政府随时准备通过大规模赤字开支来支撑总需求并挽救经济,否则这些紧缩行为都会转化为股票市场的崩溃(参见 Bellofiore 和 Ferri, 2001 的多篇论文)。

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假说很好地阐述了伴随着良性和恶性循环并与实体经济无关的经济周期的本质。实际上,明斯基将经济波动与金融行业的不稳定以及经济个体的贪婪行为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也强调管理部门缺乏足够的力量去监督这些行为。

3.4 货币经济学的系统观点

以上的讨论很好地解释了货币理论,现在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加系统的角度对货币和货币循环理论进行思考。法国的循环理论学者经常推崇一种中观(mesoeconomic)方法来分析经济,这种方法独立于个体行为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经济内部结构的规律。

中观经济学介于宏观的有效需求分析和微观的个体分析之间。考虑到科技情况和相对价格因素,莱昂惕夫和斯拉法的投入—产出模型是中观经济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更好理解货币循环理论,中观经济分析建立在货币体系之上,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在部门资产负债表和资金流量的互动关系之上的。

系统的货币理论分析原则

在过去几年,很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使用矩阵来探求中观经济关系。在受到韦恩·高德雷(Wynne Godley,1999),兰斯·泰勒(Lance Taylor,2004)以及埃西纳(Eichner,1987)的诸多研究启发后,我相信这种方法为整合非主流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条新的而且非常重要的道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取代和瓦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约束最大化的概念。这种新的方法也吸收了很多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1982)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演说中,托宾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方法区别于标准的新古典主义模型。根据托宾的主张,宏观经济学必须包含四个重要特点:

(1)存量和流量必须完全融入到分析之中,并且它们的会计清算必须在前后完全一致的方式下完成。

(2)所有模型都应该包括诸多个部门、多种资产,其中每一项资产都有自己的回报率。

(3)结合所有货币和金融的运行,也就是将央行和商业银行纳入模型是非常重要的。

(4)模型中不能出现“黑洞”。所有资金流动必须拥有起点和终点。必须考虑到所有预算和资产组合加总的约束。这点在研究行为关系和变量的实际值时都会产生作用。

托宾曾经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工作,所以这种方法也经常跟“纽黑文学派”联系在一起。几乎在同一时间,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的高德雷和他的同事独立研究并提出了一种近似的理论和方法,这项创新也因此被称作“新剑桥主义”模型(Godley and Cripps,1983)。

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否定托宾的方法并再次退回到不

真实的“代表性主体”的假设^①之中，但很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支持托宾的理论，并将其融入到货币型生产经济中。在这个系统中，货币供给是内生的，所有行为方程都反映出卡莱斯基或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学的理解，摒弃了新古典主义理论。

托宾和高德雷的分析强调了整体一致的宏观经济框架的必须性。这个框架将宏观经济学的流量层面和与真实资本、金融资产和负债，以及它们对应的回报率水平有关的存量层面结合起来。

部门性资产负债表和资金流动

托宾和高德雷的系统方法建立在两个矩阵的基础上：资产负债表矩阵和交易流程矩阵。资产负债表涉及到实体和金融存量。实体存量包括机器设备和建筑(企业的固定资产)以及普通家庭所持有的房地产。实体存量还包括诸如可以用于交易的汽车等耐用品，还可能包括企业的库存存量(S)，也就是企业生产但未销售的产品。这些实体存量在资产负债表中并没有对应项。

另一方面，金融资产则拥有对应项——负债。它同时也相应地出现在其他经济个体或其他部门性资产负债表(普通家庭、生产企业、银行、政府或央行)的负债方面。比如，银行提供的贷款属于银行的资产，却是借款者的负债。

这些存量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或者来自于流量，并最终积累到现有存量之上；或者产生于资产重估，但在流程矩阵中我们没有考虑这部分因素。

^① “代表性主体”(representative agent)指的是所有消费者和生产者都被分别看作是相同的，并只用一个人作为代表。

每一项存量通过动态方程与特定的流量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将过去和现在结合起来。例如,普通家庭年终持有的所有股票价值 E ,在定义上等于普通家庭在那个时间段所持有的股票存量与股票价格 p_s 的乘积。这个价值的获得可以说有三个不同的来源:上年年末(或当年年初)所持有股票的价值;当年企业新发行并被普通家庭以市场价格购买的股票的价值;以及当年因为股票价格上升而导致的资产增值。

国民账户流量与资本流动的结合

交易流程矩阵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工具,因为它能够将所有重要的国民账户(NIPA)^①总计与影响资产负债表的资本流动联系在一起。这个矩阵描述了一个纵向整合的生产型经济。如同国民账户(NIPA)一样,它只是涉及到增加值,并且抽象概括了诸多模糊的并与中间生产过程有关的互相关联项目。

表 3.2 展示了这种方法的基本元素。为了使表格简单化,我们没有考虑央行和政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矩阵是一个纯粹的维克塞尔模型。

为了更加简单化,我们假设银行不会产生利润(我们假设贷款利率 i_l 等于存款利率 i_m)。我们还假设普通家庭不会向银行借款,企业也不会持有货币余额。

使用会计矩阵的一个优点是它们确保不会产生缺失项目:就像上面所说,所有流量必须从某地产生也必须在某地终止。这就是为什么每一行和每一列的加总值是零,矩阵是完全平

^① (译者注)“国民账户”(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NIPA)是用来测量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一种方式和架构,在这种双列会计报表中,表格左侧为收入账户,右侧为支出账户,两侧的底行均为 GDP。

衡的。

表 3.2 封闭型经济下的无政府交易流程矩阵

账户	普通家庭	企业		银行		Σ
		现金账户	资本账户	现金账户	资本账户	
消费	$-C$	$+C$				0
投资		$+I$	$-I$			0
库存存量		$+\Delta S$	$-\Delta S$			0
工资	$+wN$	$-wN$				0
净利润	$+P_D$	$-(P_{ND} + P_D)$	$+P_{ND}$			0
贷款利息		$-i_l L_{(-1)}$		$+i_l L_{(-1)}$		0
存款利息	$+i_m D_{(-1)}$			$-i_m D_{(-1)}$		0
用于贷款			$+\Delta L_f$		$-\Delta L_f$	0
用于存款	$-\Delta D_m$				$+\Delta D_m$	0
股票	$-p_e \Delta e$		$+p_e \Delta e$			0
Σ	0	0	0	0	0	0

横向来看,每一项流量都有相等的对应项。总体来说,每一行描述了商品从一个部门被交易到另一个部门的价值。流入量和流出量的相等是由以下三个原因之一造成的:第一,供给总是会针对需求作出调整,这个过程可能是通过调整生产或调整库存来实现;第二,需求可能会被配给(就像信贷配给的情况);第三,市场价格可能被用来迅速调整供给和需求水平(比如金融市

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封型经济更加容易；在开放型经济中，矩阵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影响。

纵向来看，每一项交易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每一列的加和等于零，这与每个部门的预算有关。我们先考虑普通家庭，他们的预算是他们的利息收入($+i_m D_{(-1)}$)、分红(P_D)和工资(wN)，通过这些收入，他们可消费(C)，可以增加他们的银行存款(ΔD)，或者在金融市场购入新发行的股票($p_e \Delta e$)。

企业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他们将消费品(C)卖给普通家庭的同时，他们也将投资品(I)卖给其他企业，还有那些已生产但尚未卖掉的产品(ΔS)。

这些已经实现的或者以会计分录形式出现的销售收入必须等于私有部门的工资，利息收入加上净利润。这些利润有两个组成部分：普通家庭的分红(P_D)和未分配利润($P_N D$)，未分配利润也是固定资产投资和库存存量投资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金的来源和使用

在流程矩阵中，所有正号的部分代表资金的来源。比如， wN 表示的工资是名义工资率 w 和雇员人数 N 的乘积。它是普通家庭资金(或收入)的来源。但是，从生产部门的角度来看，它代表了资金的使用或消耗。所以在代表企业部门的一列中它显示为负号。

矩阵最底部代表了债权或负债的变动。因为普通家庭通过增加股票持有量(股数 e 乘以股票价格 p_e)或增加银行存款(ΔD)来使用资金，因此它们是负向的。但是当企业得到了一笔新的银行贷款(ΔL)，这增加了银行的债务存量，同时也代表了生产部门的资金来源，因此它是正向的。

读者需要注意的是，在讨论银行所起的作用时，“资金的来

源和使用”这个说法可能会引起混淆。银行发放的贷款增加了其贷款总额,这项额外留出的贷款在交易流程矩阵中是负向的。与之对应的存款属于流入项,因此是正向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说对于银行部门,存款属于资金来源而贷款属于资金使用。我们还需要小心的一点是:这可能会让读者认为贷款需要以存款为前提条件,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推断。相反,就像后凯恩斯主义学者所坚持的那样,是贷款产生了存款。换句话说,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说,存款的增加可以被看作资金的来源,但实际的起因仍是在生产初期由银行发放的贷款。贷款的产生是为了满足符合银行信用标准的企业生产的需要(Lavoie,2003)。

货币的产生

我们现在已经阐述了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基本要素。例如,在3.3节我们讨论了初始和最终融资的区别。但我们又如何解释货币流通呢?我们可以通过表3.2建立的交易流程矩阵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做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解释初始和最终融资的关键区别。

交易流程矩阵中的生产部门再次被细分为资本账户和现金账户。两个账户合计为零。资本账户描述了最终融资资金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模型中,年末或季末的固定资产的积累和企业库存的增加所需的资金只可能三个来源:新发行的股票,从银行新借入的资金以及未分配的利润。

相反,矩阵中的阴影部门代表了最初融资。在生产过程的最初,也就是货币循环的开始,企业必须借入资金来支付员工工资并开始生产新产品(ΔS)(在我们假设的封闭型纵向整合生产经济中,工资是唯一生产成本)。在这个时期,企业借款完全等于工人工资。这是循环的第一个环节。这个过程与贷款的用途

(用于消费品还是投资品)无关,实际上两种商品的生产都需要最初融资。

因此,在循环的初始阶段,企业在负担银行债务的同时,又持有银行债权(企业在银行存款)。实际上第一个环节非常短暂:企业只有在需要支付工资和开始生产的时候才使用其信用额度。支票和电子转账是目前完成这一环节最普遍的方式。一旦工资被支付,它就成为普通家庭和工人的收入。在这笔收入用于消费之前,它会变成普通家庭的存款(ΔD_m)。阴影部分描述了第二个环节。

我们已经提到生产部门的资本账户代表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终融资。这个时候企业通过产品销售向普通家庭收回资金。

会计准则和四路会计原则

在用矩阵分析的过程中,特别是涉及到企业运行时,我们需要求助于一些相关的会计准则。当商品生产出来但未被卖掉时,它们就成为库存存量(ΔS)。为了与会计最佳实践统一起来,库存产品的价值应该以当时的生产成本或重置成本(而不是它们的预期销售价格)为计算标准。

在我们的纵向整合经济中,这些存量的生产成本等于在这段时间内企业向普通家庭支付的工资。从这个角度上讲,库存的增加值(ΔS)等于 wN ,也就是我们在表 3.2 的企业现金账户中的阴影部分。

流程矩阵的使用也证实了“四路会计”原则(Copeland, 1949)。因为各行各列的加和为零,所以每项交易在矩阵中需要至少四项会计分录的对应变化才能使表格重归平衡。比如,如果银行决定增加生产部门贷款(ΔL),这必然会引起相对应的存

款等量变化(ΔD)。这样银行部门的资本账户加总为零。而且,新增贷款必须记录在生产部门资金账户的负债中。这样才能确保贷款行的加总为零。因为生产部门银行存款增加,第四项变化的产生保证存款行的加总为零。最终,每项交易产生了至少四项分录的变化。

模型和流程矩阵的作用

部门性资产负债表矩阵和部门性交易流程矩阵揭示了货币型生产经济中各部门之间的基本联系。我们应该将解释经济各部门的行为方程和连接存量和流量的动态方程结合这些基本联系进行分析。

任何模型都会产生某种行为方程来总结模型并解释结果。但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例如 Godley)认为这种关键的会计核算方程和动态存量—流量方程会缩小结果范围。换句话说,模型的配置和动态不可能得出完整的结论,因为它们与会计核算准则背道而驰。正如兰斯·泰勒(2004, p. 2)所指出的,存量—流量宏观调和模型及其基本会计核算方程“很大程度减弱了宏观层面上的支付结构的自由度”。

根据高德雷的理论,任何能够充分表示货币型生产经济的完全连贯的模型都会产生一定中期和长期的结果,这些结果是独立存在的,与参数值无关。这种模型体现了所有存量和流量之间的关系,并考虑到所有交易流程和预算约束。此外,这种模型还必须解释存量约束(例如资产组合约束和资产加总约束)。

为了确保流量和存量的汇总,经济个体往往会以一定的比率作为目标,比如企业的理想销售与库存的比率。实际上,这个目标的制定可能不是依赖于个体所掌握的知识。例如,当普通家庭每年将一定的收入/财产比率用于消费时,他们只是简单地

在其财产(存量)和可支配收入(流量)两者间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

从系统方法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本节所提出的后凯恩斯主义模型所遵循的原则证实了在3.1节中我们所阐述的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主要特点。虽然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受到不同的、独立的制约(货币供给受到央行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制约,而货币需求受到普通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的制约),也就是说,即使在表面看来模型中没有公式强制两者相等,它们的内在关系也是相等的。

这点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新古典主义者声称的过多货币供给导致通货膨胀这个论述是错误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过多的货币发行量从来不是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

我们还可以表示出央行和财政部是怎样设定利率的。虽然央行通常只控制短期利率,但它同样可以控制长期利率,这取决于央行的意愿。如果那样做,央行将不得不接受它的负债项目会发生剧烈变化,因为短期和长期债券在央行的负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否则,长期利率会随着短期利率的变化而变化,即使这个变化过程非常缓慢,但最终长期利率会趋于短期利率的未来预期值。只要央行有决心并持续地推动它们,这些预期利率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已知的短期利率,而且这些短期利率本身又趋近于基准利率。

系统性分析还告诉我们在开放型经济中,贸易失衡无法影响央行操纵基准利率的能力。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唯一的障碍是贸易失衡状态无法靠自身恢复,最终外汇储备的枯竭会使得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我们在第五章中将会看到,在开放型经济中存在通货紧缩

性偏差。贸易顺差国家的扩张性经济政策永远不会受到制约,并对贸易逆差国家的紧缩性经济政策影响起到补偿作用。

第四章 短期有效需求和 劳动力市场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有效需求的作用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就像第一章中所声明的：经济中的需求导向性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中心论点。实际上，有效需求是就业理论的关键要素。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不同的是，真实工资的降低不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正相反，真实工资的上升会扩大消费，从而增大劳动力需求和降低失业。最终，最低工资水平和平均工资水平的升高有利于就业和整体经济。这个结论与那些捍卫“别无选择”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理论完全相反。

在本章中，我们的分析只局限于短期内。我们将所有影响长期经济的因素放在下一章分析。

短期和长期

在进一步讨论前，我们需要搞清楚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之间的区别，这点非常重要。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有两种解释。

我们往往可以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发现第一点区

别：“长期”一般定义为一个实现预期的过程，这些预期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价格预期和通货膨胀预期。而“短期”指的则是价格预期落空或者预期尚未完全实现的情况。

短期和长期的第二点区别则更加具体。在“短期”内，资本产品存量被认为是固定的，而在“长期”内，投资会改变现存的资本存量。因此，“长期”描述的是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普通家庭的真实财产是固定的，而净投资（净资本折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经济增长表现为资本存量和普通家庭财产的指数倍增长。

建立在第二种解释之上的短期经济分析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我们在上一章中讲到完整的连贯性分析必须将存量和流量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假设即使企业投资和家庭储蓄这些行为存在，资本存量和普通家庭财产依然恒定，我们就会忽略许多重要的结论。也就是说，在这些条件下，当不同的时间被串联起来时，相关的讨论只能说是总体经济的一个缩影。托宾（1979，ch. 4）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说明时间的误用：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的 IS-LM 模型确定了正向的储蓄和投资，但没有考虑到它们对财富和生产力的影响。

本章中的短期分析忽略了投资对资本存量的影响（第二个定义），但我们会假设在商品市场均衡时预期会得到实现，产品供给在一段时间内自我调整并符合产品需求（与第一个定义有所不同）。

4.1 有效需求及其组成部分

自发性支出和促发性支出

在标准的新古典主义模型中,总需求取决于两个基本要素:财政政策和货币供给。但是,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中货币供给是内生变量,因此它不能作为有效需求的决定因素。至于财政政策,我们的简易模型先将其放在一边。我们假设一个无政府的封闭型经济,在这个简易模型中,什么是决定总需求的关键因素呢?

凯恩斯(1936, ch. 3)在《通论》中对有效需求组成部分的自发性支出和促发性支出进行区分。“促发性支出”指的是受当前收入水平影响的那部分总需求。相反,自发性支出与当前经济水平无关。在无政府的封闭型经济中,总需求只有两个部分组成:消费和投资。

凯恩斯认为投资是一个独立变量,它取决于企业家的长期预期。而消费则是部分促发性的(受到收入影响)。实际上,这个想法与卡莱斯基(1971, ch. 8)大体一致。卡莱斯基认为投资与当前经济总量无关。他把消费分成两个部分:基于工资的消费(工人)和基于利润的消费(资本家)。前者是促发性变量,而后者是自发性变量,因为后者取决于已实现利润。

宏观经济学的利润决定因素

在卡莱斯基的著作中(1971, ch. 7),解释宏观利润的公式非常简单。卡莱斯基的公式基于国民核算分析并与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用到的交易流程矩阵(特别是生产企业的现金账户)非常相

似。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计算国民收入：收入法和支出法。名义国民收入 Y 可以用以下公式定义：

$$\text{国民收入} = \text{工资} + \text{利润} = \text{消费} + \text{投资}$$

根据上面我们对消费的分类，我们也可以写成以下形式：

$$\text{工资} + \text{利润} = \text{基于工资的消费} + \text{基于利润的消费} + \text{投资}$$

根据卡莱斯基及其前辈马克思的理论，我们进一步假设工人没有储蓄，他们将自己全部收入用于消费，我们可以得到：

$$\text{基于工资的消费} = \text{工资}$$

将这个公式代入前面的公式中，我们可以得出卡莱斯基于1933年在波兰首次提出的著名的利润公式：

$$\text{利润} = \text{基于利润的消费} + \text{投资}$$

通过这个公式所揭露的内在关系，我们得出一项重要结论：在无政府的封闭型经济中，如果工人没有储蓄，宏观经济的利润等于私人部门的投资与资本家基于利润的消费。

卡莱斯基公式的因果关系

但是，这个公式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呢？这个公式又含有怎样的因果关系呢？我们如何解释结论？卡莱斯基提出这些问题，并给出如下答案：

“这个公式有什么意义？这是否意味着某段时间的利润决定了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还是反向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哪些因素直接受制于资本家的决定。我们清楚的一点是，资本家可以决定在某段时间他们可以增加消费或投资，但他们不能决定自己是否赚了更多。因此，是消费和投资决定影响了利润，反之则不成立。”(Kalecki, 1971, p. 79)

我们可以借助卡多尔(1956, p. 96)的名言来总结这条宏观经济理论：“资本家赚取了他们所花费的，而工人花费了他们所

赚取的。”这句话强调了一种不对称性：资本家和企业主总是可以决定是否花费更多（如果银行同意贷款），而工人却无法决定是否能够赚得更多，因为这取决于企业主提供的工作机会。

※专题 4.1：对“挤出效应”的否定

那些捍卫“别无选择”理论的学者经常争辩说为刺激总需求而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最终会失败。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将资源用于私人部门的投资，而不是赤字支出上。这就是所谓的“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凯恩斯于 1930 年抨击这个理论时称之为“财政部的观点”。根据所谓“财政部的观点”，政府赤字的增加会挤掉私人投资，并导致利率升高。

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完全否定这个观点，原因有很多：第一，我们在上一章中讲到，市场利率取决于央行设定的基准利率。第二，利用卡莱斯基公式的一般模式，我们可以轻松地表明财政赤字实际上增强了私人部门的盈利能力。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反向的挤出效应，有时候也可称作“挤入效应”（crowding-in effect）。在把政府部门加入简易模型后，我们通过转换卡莱斯基公式将这种效应表示出来。根据卡莱斯基（1971，p. 82）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

除去税收后的净利润 = 基于利润的消费 + 投资 + 财政赤字

4.2 卡莱斯基模型

凯恩斯还是卡莱斯基

受到恩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启发而完成的巨著《通论》中，凯恩斯（1936）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一些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

设。比如,他假设货币存量是给定的,他还假设企业在收益递减的约束下完成利润最大化。我们在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否定了这些假设。

凯恩斯保留这些新古典主义特点的目的在于他希望告诉同僚他的理论更具有概括性。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得到公平对待和传播,凯恩斯努力使自己的论述为同僚们所熟悉并更容易被接受。不幸的是,凯恩斯的策略有很多缺陷。例如,后凯恩斯基原主义经济学家(比如 Davidson 和 Weintraub)仍然坚持凯恩斯的方法。这导致了他们的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建立在收益递减的总供给分析的基础上。他们的理论与凯恩斯失衡主义学派(例如 Malinvaud 和 Benassy,或者 Barro 和 Grossman)相似。

但是,卡莱斯基与马克思属于相同学派,与马歇尔并无关系。因此,在他的第一篇关于经济周期和有效需求理论的文章中,卡莱斯基没有为新古典主义假设留下任何空间。具体地讲,他坚定地认为在固定单位成本的情况下企业依旧可以扩大生产。卡莱斯基的有效需求理论往往被认为超越了凯恩斯的理论。这点尤其被罗宾逊(1973, p. 97)和卡多尔(1983, p. 15)认同。为了说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先进性,我们必须“学习卡莱斯基而不是凯恩斯”(Bharduri, 1986, p. ix)。因此,我们应该将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讨论的内容称为卡莱斯基主义经济学,而不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Dostaler, 1988, p. 134)。

※专题 4.2: 利润方程的进一步推导

为了进一步讨论有效需求,也许我们应该将卡莱斯基利润方程的推导更加细化。我们可以用上一章中的一些数学符号来推导国民收入核算。我们将国民收入定义如下:

$$Y = wN + P = C + I$$

其中 $C = p_{a_c} = p a_{c_c} + p a_{c_w}$

$$I = p a_i$$

总收入是工资 (wN) 与利润 (P) 的加和, 这些已经包括了需要支付的利息。 C 和 I 代表名义消费和投资支出。 a_c 和 a_i 表示真实消费和真实投资。 p 是价格, a_{c_c} 和 a_{c_w} 分别代表资本家和工人的真实消费。

我们再次假设工人没有储蓄,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利润方程:

$$P = p a_{c_c} + p a_i$$

根据卡莱斯基的理论, 宏观经济利润是被提前确定的, 因为它们取决于已经实现的投资以及企业过去的投资决定。资本家的消费取决于他们在过去实现了多少利润(或者在金融市场获得多少盈利)。

任何时期内, 资本家的真实投资 and 消费都是自发性变量。考虑到投资在经济学中是一个有争议的主题, 所以将其看成一个外生变量也许是短期分析的最佳选择。

因此, 宏观经济利润取决于真实自发性支出 ($a = a_{c_c} + a_i$), 我们可以将之前的利润方程写成:

$$P = p a$$

无论企业如何调整单位劳动成本和真实工资, 这个时期内总的真实利润完全来自真实自发性支出。

※专题 4.3: 总需求方程

在宏观经济层面, 至少在我们的无政府封闭型经济简易模型中, 需求取决于两个部分: 工人的促发性消费(出自他们的工资)和自发性支出(包括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因此我们可以将有效需求写成如下形式:

$$AD = wN + pa$$

如果我们将 AD 除以 p , 我们可以得出总需求的真实值:

$$RAD = (w/p)N + a$$

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总需求取决于货币供给。而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总需求来自工资和真实自发性支出,后者也就是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的决定。

※专题 4.4: 另一种利润方程

很多后凯恩斯主义学者通过忽略时间延迟的方式稍微修改了卡莱斯基利润方程。在他们的很多模型中,资本家的消费只是取决于他们当期所实现的利润。假设资本家将一定比例(s_c)的利润用于储蓄,他们的消费则等于:

$$pa_c = (1 - s_c)P$$

将这个公式代入利润方程,我们得到:

$$P = p(a_i/s_c) = I/s_c$$

这就是卡多尔(1956, p. 96)提出的剑桥学派短期利润方程。他将方程与卡莱斯基的利润方程,以及凯恩斯(1930, p. 139)的“寡妇之罐”的比喻联系起来。凯恩斯借助《旧约·列王纪》中讲述一名寡妇家里坛罐中的油和肉永远取之不竭的故事来说明:“无论企业主在消费品上花费了他们多少利润,企业主本身的财富积累并没有改变。因此,无论企业主怎样挥霍,作为他们资本源头的利润就如同‘寡妇之罐’一样永远取之不竭。”卡多尔还指出,企业主的投资也遵循同样的原理。

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利润与投资支出成正比,与资本家的利润储蓄倾向成反比。我们会在下一章中使用这个关系的动态方程。但现在我们继续关注卡莱斯基方程。

后凯恩斯主义的产能利用函数

卡莱斯基的总需求曲线建立在第二章讲述的当代企业理论的基础上。卡莱斯基模型将生产函数假设成为一种更现代的形式,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也称之为“产能利用函数”(Nell, 1988, p. 106)。他在模型中假设只要产能利用率低于百分之百的水平,收益递减原则就不会存在。收益不变原则是普遍存在的。琼·罗宾逊于1964年首先提出产能利用函数暗示了企业在固定资本设备水平下可以雇佣的员工可多可少,与之相关的只是不同的产能利用强度(产能利用率)。

关于劳动力,卡莱斯基模型总体上考虑了劳动力的两种形式:可变劳动力(蓝领工人或直接劳动力)和固定劳动力(上层劳动力或间接劳动力)(Asimakopulos, 1975)。可变劳动力与商品的生产和服务直接相关,因此它是生产中的可变因素。可变劳动力的工资是企业直接成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固定劳动力或上层劳动力与生产并无直接关系,通常指的是白领雇员或其他管理人员。

这个重要区别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周期中的平均工资变动(Lavoie, 1996—1997),在这里我们并不过多陈述。但即使通过这样简单的叙述,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卡莱斯基模型的一些重要结论,尤其是就业和真实工资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

卡莱斯基成本悖论

图4.1中的卡莱斯基劳动力需求曲线显示在水平的真实自发性支出(a)给定的条件下,真实工资与总就业水平是正向关系。真实工资 w/p 的增加使劳动力有效需求曲线移动,并产生更高的就业水平。这与新古典主义就业理论和“别无选择”理论

的支持者的说法完全不同。

表面看来,这个结论似乎并不成立。但是它对一条重要谬论作出如下更正:如果所有企业共同追逐对自己有利的经济行为(降低工资),这将对整体经济产生危害。

企业个体确实能够通过独自降低工资成本来实现盈利,但整个社会的总利润最终却不会升高。一旦所有企业都降低工资并保持物价水平不变,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利润加成,他们最终只能卖出更少商品。卡莱斯基(1971, p. 26)提醒过我们:“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有利于某个企业主的行为不会为所有企业主带来利益。”这就是卡莱斯基的“成本悖论”,这个理论与凯恩斯的“节约悖论”颇为相似。

根据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节约悖论原则,普通家庭储蓄倾向的增加不会带来总储蓄和总收入的增加。实际上,只要投资一定,也就是自发性支出给定,储蓄倾向的增加不会给总储蓄带来任何影响。多存钱的结果只会是总收入、消费额以及总就业的降低。

与之相似,在成本悖论原则中,如果真实自发性支出恒定,真实工资的降低对总利润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利润只取决于真实总支出水平(或取决于卡莱斯基方程中的真实投资支出和基于利润的储蓄)。虽然较低的真实工资可以增加销售单位产品的利润盈余(参见第二章中边际成本参数 θ 或 Θ 的增加)、国民收入、销售以及就业则会相应下降,同时宏观经济利润总值保持不变。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总需求的降低。由于工人工资消费倾向要高于资本家的利润消费倾向,因此收入分配的变化和工人工资水平的恶化导致了总需求的萎缩。

※专题 4.5: 卡莱斯基模型的公式分析

卡莱斯基的劳动力市场模型非常简单。我们以前面提到的真实总需求函数作为出发点:

$$RAD = (w/p)N + a$$

接下来我们使用后凯恩斯主义产能利用函数,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其中产量直接与用于生产的劳动力挂钩,我们得到如下公式:

$$q = TN$$

T 代表了每个工人产出,也就是工人的生产率($T = 1/n$; n 在第二章中指的是技术参数,也就是单位产出的劳动力需求量),我们假设其固定不变。这是技术进步水平的总体计算方法,也就是为何我们用大写字母 T 来表示生产率。

通过真实供给等于真实需求,我们得到 $q = RAD$,同时我们也得到下面的方程式来描述劳动力有效需求(也被称作“就业曲线”):

$$N^{Dff} = a / [T - (w/p)]$$

$$\text{或 } (w/p)^{Dff} = T - a/N$$

两个方程式中描述的曲线上的点都代表了商品市场的平衡状态,在每个平衡点上投资等于储蓄。换句话说,在劳动力有效需求曲线上每个点(真实工资—就业组合)上,所有产出都按照企业设定的价格卖出。如图 4.1 所示,曲线下方的部分表示商品市场处于总供给过剩的状态,而曲线上方部分代表了市场中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投资超过储蓄)。只要企业针对供给(或需求)过剩采取降低(或增加)产量的行为,经济就会向均衡方向移动。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条件下,模型处于稳定状态。这也是我们在本章剩余篇幅中的假设前提。为了方便解释,我们假设经济总

是在劳动力有效需求曲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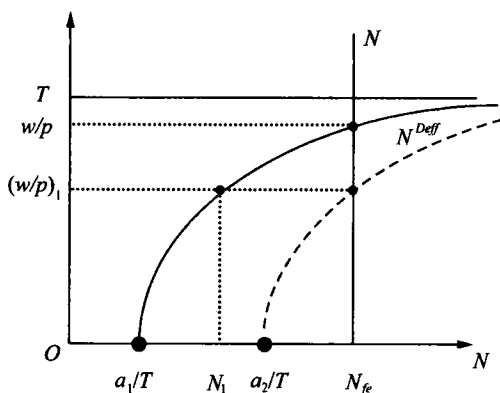


图 4.1 卡莱斯基的劳动力市场

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的模型中劳动力有效需求曲线具有正向斜率,这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并不相同。卡莱斯基劳动力需求曲线趋近于代表劳动生产率 T 的水平直线。这样真实工资永远不会超过蓝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否则企业将会亏损。

因此,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现代企业只面临一点约束:有效需求。每个企业倾向于生产和卖出更多产品,因为他们知道,至少到达全产能利用率之前,更高的产出不会导致单位成本的上升。但是企业会受到其市场份额的制约。

增加真实自发性支出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现在已经明确真实工资的增加会带来真实总需求的增加,并导致生产和就业的扩大。有没有其他方法也可以增加产量并实现全体就业呢?

卡莱斯基和凯恩斯的分析只给我们留下一种选择：增加自发性支出(a)。每当自发性支出增加时，劳动力有效需求曲线会向下方移动。因此，为了保持相同的真实总需求，我们需要降低真实工资。但是，如果真实工资保持不变，自发性支出的增加会扩大就业，这与标准的凯恩斯模型的结论相同。图 4.1 中虚线部分表示：在固定真实工资水平 $(w/p)_1$ 下，真实自发性支出由 a_1 增至 a_2 会导致就业水平由 N_1 增长至 N_f 。

当然，我们会问：为什么首先增长的是自发性支出？我们讲过自发性支出有两个组成部分：基于利润的消费和投资支出。凯恩斯(1936)认为央行调低利率会刺激这类支出，但他还表示即使利率降到最低水平，这种影响可能也不够充分。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依赖公共支出来降低持续性失业。

但是，一些与凯恩斯同时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比如庇古(Pigou)和唐·帕廷金(Don Patinkin)就认为公共支出无法恢复充分就业。他们认为名义工资和价格是灵活的，失业会导致两者的下降。最终，由于普通百姓所持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增加，私人自发性支出自我扩张。根据这种新古典主义观点，市场规律最终会消灭失业。这个论述也被称作真实余额效应或财富效应。

然而，后凯恩斯主义学者质疑这种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首先，我们在第三章中可以看到，在一个货币和财富都是内生变量的世界里，这种机制无法存在。其次，凯恩斯(1936, ch. 19)和托宾(1979, ch. 1)提醒过我们，价格下滑会对企业和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比如，它可能增大真实债务负担，从而引发破产和市场混乱，并使经济停滞和衰退的现状更加恶化。

※专题 4.6: 成本和节约悖论的剑桥学派方程

教科书里的简易凯恩斯模型中, 储蓄与总收入之间只是简单的比例关系(s), 因此, 消费占总收入的比值是 $(1-s)$ 。在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 储蓄与投资的相等意味着总产出与真实投资具有以下关系:

$$q = a_i / s$$

这个公式中的 $1/s$ 就是著名的“凯恩斯乘数”。

剑桥学派的模型中, 我们之前提到工人没有储蓄而资本家将利润的一部分(s_c)用于储蓄。此时储蓄与投资的相等则得出以下关系:

$$q = a_i T / [s_c (T - w/p)]$$

这个方程可以让我们立刻证实节约悖论和成本悖论的有效性。在真实投资 a_i 固定的前提下, 利润储蓄倾向 s_c 的升高会导致总产出的减低。在给定生产率 T 的条件下真实工资的降低也会导致相同结果。当然, 总产出会随着真实投资 a_i 的增加而增大。

乘数值的确定则更加复杂(乘数 $= [s_c (T - w/p)]^{-1}$)。乘数的大小取决于利润储蓄倾向 s_c 以及反映收入分配的真实工资和工人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上。

此时的就业方程为:

$$N = a_i / [s_c (T - w/p)]$$

4.3 卡莱斯基模型的进一步研究

多重均衡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讨论过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形状。

我们只是将其假设为一条垂直直线。但是,很多劳动经济学家假设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向内弯曲的。在工资水平低的时候,工资上涨促使工人加入工会并获得更长劳动时间,替代效应超过收入效应。这部分的曲线的斜率是正向的,非工业化国家的情况往往如此。另一方面,当工资水平相对较高时,收入效应占据优势,因此曲线的另一部分的斜率是负向的。

在加入正向或向内弯曲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后,短期卡莱斯基模型提出两个可能的充分就业均衡点(Seccareccia, 1991)。比如,在图 4.2 中的较低工资 $(w/p)_L$ 水平下,劳动力市场在 L 点达到平衡。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数量均为 N_{fel}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充分就业的较低均衡点,但这种充分就业发生在真实工资和产出非常低的情况下。相反,第二个充分就业均衡点相对应的则是较高的真实工资 $(w/p)_H$,同时伴随着较高的产出和就业 $N_{f,H}$ 。

在这两种可能性中,哪一个均衡点(L 或者 H)更可能实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设定一个初始真实工资 $(w/p)_0$ 水平点,这个水平处于两个充分就业真实工资水平的中间位置。在这个工资水平下的劳动供给为 N^S ,劳动需求为 N^D ,在短期内经济总是处于投资等于储蓄的均衡坐标位置(位于劳动力有效需求曲线上)。

商品市场在 $(w/p)_0$ 的水平下处于均衡状态,但这时存在失业,因为劳动供给量大于劳动需求量。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种情况很可能会长期存在,因为企业家的销售预期实现后,他们没有任何动力去改变劳动力的雇佣状态(这也是“短期”的第一条定义)。在充分的制度刚性的条件下,只要失业保持稳定,真实工资就不会改变。

这就是说,如果劳动力市场失去惯有原则和规章制度,名义工资 (w) 具有下跌的趋势。相反,因为经济处于劳动力有效需

求曲线上,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所以商品价格趋于稳定。因此价格可变的经济中,名义工资的下降和价格水平的稳定会导致真实工资的下降至 $(w/p)_L$,也就是较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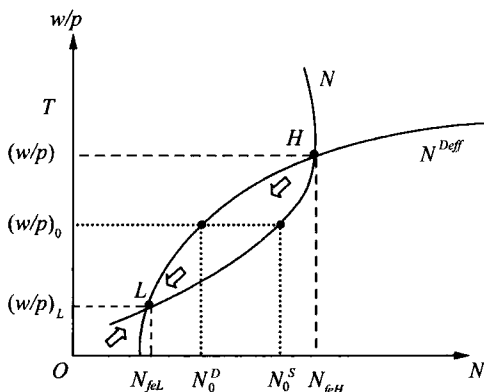


图 4.2 包括内弯形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卡莱斯基模型中的多点均衡

市场规律的不良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放任自流,市场会通过自己的力量将经济带向充分就业的较低均衡位置(图 4.2 中的点 L)。这个位置具有较低的真实工资、产出以及就业。在人口数一定的情况下,这也就意味着,相对于点 H 的经济状态[较高的真实工资 $(w/p)_H$,产出和就业 N_{feH}],目前的生活水平较低。

我们的分析表明“高”均衡点是不稳定的,而“低”均衡点是稳定的。在缺乏刚性的世界里,市场规律会将经济推离高点均衡并向低点均衡移动(如图 4.2 中箭头所示)。换句话说,市场规律会将经济带至次优均衡位置。

因此,与“别无选择”支持者的论调不同,市场规律和可变价格不一定会产生最优结果。在失业存在的情况下,强大的工会组织可以通过避免工人真实工资降低的方式来促进就业和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因为较高的充分就业均衡点不稳定,所以只有持续的政府干预才能保证经济在较高就业水平运转。实际上,即使在失业上升的阶段,政府也必须通过干预来确保较高的真实工资。这可以通过最低工资保障法和最低生活工资标准(例如很多美国城市实行的法案,参见 Pollin, 2003)来实现。制定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会推高整体工资结构。政府还可以提高公共服务行业的工资,批准法令鼓励发展工会来对大型企业的力量形成制约(参见 Galbraith, 1967)。

卡莱斯基的多点均衡模型说明市场规律会将经济导向较低工资水平、产出和就业的均衡位置,它还表明适当的立法和体制可以将经济推向较高的就业,真实工资以及生活水平。

技术性失业

在讨论了失业的多方面原因后,我们必须提及一个经济学中最古老,也是最有争议的论述:科技发展的作用以及它对失业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 1817 年撰写《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时就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虽然他一开始认为技术进步不会产生任何永久的不良影响,但他后来改变了看法。这本著作第三版的第三十一章阐述了这个观点的转变。

新古典主义学者总是不厌其烦地说科技进步对就业只会产生正面影响,最多也只对某个部门产生负面影响。实际上,他们还在嘲笑那些警告机器人和计算机的应用会对就业水平产生潜在危害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警告说,技术进步会对就业

水平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不只是局限于某个部门,而是体现在整个宏观经济层面上。很多工人因此而担心失业,因此这值得我们拿出一定的篇幅来讨论并研究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目前的问题是:技术进步是否会增加失业?技术性失业是否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

实际上,卡莱斯基模型非常适合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因为它的方程式和图示相对简单,还因为它更关注所有影响总需求的因素。

生产率升高对劳动力有效需求曲线产生的影响

生产率的升高如何表现在卡莱斯基模型中呢?在真实工资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将收入分配向获得利润方倾斜。就如第二章所说,生产率的升高表现在企业利润盈余(θ)的上升,真实工资此时保持不变。最终,总需求下降,劳动力需求也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图 4.3 的虚线所示,劳动力有效需求曲线左移。在图 4.3 中我们仍然假设只有一个充分就业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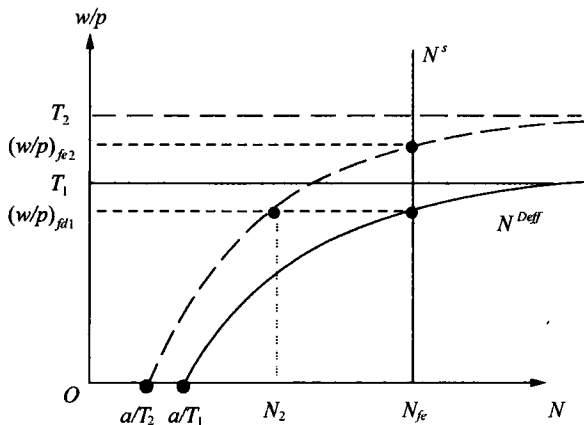


图 4.3 生产率升高对劳动力有效需求曲线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假设经济的起点为充分就业点 N_{fe} ，此时的真实自发性支出为 a ，生产率为 T_1 ，真实工资为 $(w/p)_{fe1}$ 。我们假设生产率升高至 T_2 。这会使劳动力有效需求曲线上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真实工资上升至 $(w/p)_{fe2}$ 才能确保充分就业。如果真实工资保持不变，就业就会下降至 N_2 位置。

因此，当我们在模型中假设真实自发性支出固定时，每当生产率上升，真实工资必须相应上升才能保证就业水平不会下跌。为了保证当前的就业水平，每个工人劳动生产率与真实工资的差额必须保持不变。否则，我们必须扩大真实自发性支出。即使真实工资与单位工人生产率的比率保持不变，也就是说真实工资与生产率以相同速度增长（这种情况最可能发生），我们仍然需要扩大真实自发性投资来保持就业水平。

因此，在卡莱斯基模型中，技术性失业确实可能存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生产率的提高对就业产生的不良影响必须由真实工资和真实自发性支出的升高来抵消掉。

经济周期和生产率

下面的两种情况哪种最可能发生：真实工资与生产率共同上升，还是生产率的变化对真实工资并无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取决于经济周期的阶段。

我们首先讨论生产率上升有利于就业的情况。如果生产率的提高发生在经济上升期，此时的就业率较低，这时它可能不会对劳动就业产生不良影响，因为工人此时有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并很可能在劳资谈判中获胜并得到较高的真实工资。此外，经济活动的扩张鼓励企业增加投资支出，同时普通百姓也开始增加消费。

然而，如果生产率的升高是企业降低成本的结果，这可能是

因为经济处于衰退期,或是因为企业及其股东认为他们没有获得足够的利润,这种生产率的升高就会对就业产生不良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理的主要任务是增加利润盈余,所以他们不愿意与工人分享生产率升高的收益。最终,工资不会升高,而且企业也不愿投资。

※专题 4.7:技术性失业、价格制定以及自发性真实需求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表示出这样一个关系:真实工资相对于生产率上升相应比例并不足以保证当前的就业水平(Nell, 1988, p. 124)。我们假设企业根据简单的加成原则来制定价格:

$$p = (1 + \theta)(DUC)$$

在我们的简易卡莱斯纵向整合模型中,直接单位成本(DUC)指的就是每项产出的工资成本。因此,整体水平下的加成价格方程变为:

$$p = (1 + \theta)wn = (1 + \theta)(w/T)$$

移项可得真实工资方程

$$w/p = T/(1 + \theta)$$

由此可知,工人的真实工资以及他们的购买力与生产率(T)直接相关。它们还与成本毛利率(θ)成反向关系。如果企业在缩减单位成本的同时不打算提高成本毛利率(θ 保持不变),真实工资(w/p)就会与生产率(T)等比例变化。比如,当生产率上升5%,真实工资同样上升5%。

我们将真实工资方程代入早先我们得到的劳动力有效需求方程中 $\{N^{Def} = a/[T - (w/p)]\}$,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方程:

$$N^{Def} = a(1 + \theta)/T\theta$$

即使我们假设真实工资和生产率等比率上升, T 的升高也会导致劳动力有效需求的降低。为了保证劳动力有效需求不变,我

们还需要等比例增加真实自发性支出(a)。因此,在成本毛利率(θ)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比率 a/T 保持不变,劳动力需求曲线是固定的,就会避免了技术性失业。这些条件非常苛刻,因此技术性失业不应被忽视。萨伊定律(Say's Law)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信奉的自由市场有能力使真实工资等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并不成立。

这些就是经济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的典型案列。当经济在增长时,规模效应和劳动力资源的缩小导致的生产率的上升不会对就业产生不良影响。但是,当经济处于衰退或停滞的时候,每个企业都有正当的理由去缩减单位成本,即使这危害了整个宏观就业形势。这种技术性失业的恶性循环与 20 世纪 80~90 年代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形势非常相似。根据后凯恩斯主义学者的观察,我们不能将这些国家所经历的高失业率归因于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其主因应该是由于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所导致的有效需求的匮乏。这些紧缩性政策本意是为了保证欧洲货币系统内国家的经济运行,以及为了使一些国家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加入欧盟(Irvin, 2005)。

工作分摊^①

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最近 20 年的高失业率促使中左翼社会经济学家针对如何降低失业率提出很多开创性政策。这其中就有工作分摊政策:工人缩短工作时间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凯恩斯(1936, ch. 22. V)曾经提到过这项建议,但他并没有在这上面投入更多关注。

^① (译者注)“工作分摊”,又称“工作分享”(work sharing),指的是为了提高劳动力的工作机会而对工作时间进行重新分配。

工作分摊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企业需要一定的工作时间来完成它的生产目标。如果工人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天数或星期数），企业除了雇佣更多的工人外别无选择。

然而，工作分摊除了影响就业和周薪或月薪外，还对工人的每小时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很多企业宣称每周四天工作制，而不是五天工作制，会带来每小时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最好的情况是工人更能够在四天内完成以往五天需要完成的工作。

如果确实如此，而且假设工人可以接受 20% 的周薪或月薪的降薪幅度（因为他们少工作一天），单位劳动成本会降低 20%，同时每小时生产率则得到相似比例的上升。

作为工作分摊计划的一部分，工人每周工作小时数的降低可能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但是，本章之前的部分中提到生产率的升高又会对就业造成不利影响，除非这种影响能够被真实工资的升高抵消掉。以四天工作制这个极端情况为例，工人在四天内做了平常情况下需要五天做的事情，如果有效需求不变，这对工人的就业人数没有任何影响。但实际上，因为每小时生产率的升高而同时每小时真实工资不变，有效需求将会降低。

工作分摊计划，或者是四天工作制，只有在时薪 w/p 增加的情况下（至少与生产率等比例增加）才能对就业有利。如果这项计划的提出伴随周薪和月薪的降低，因为工人在时薪不变的情况下缩短了工作时间，这会对劳动力需求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这项计划的成功与真实时薪的上涨紧密相关。这样才能维持工人的购买力水平从而保证总需求。否则，这项计划所导致的每小时生产率的提高只会缩小劳动力有效需求。

增加时薪的最好方法是在缩短工人劳动时间的同时，保持周薪或月薪不变。后凯恩斯主义者只有在增加工人真实时薪

的情况下才会支持工作分摊计划。也就是说,即使工人每周的工作小时数减少,他们依然可以拿到与以前相同的周薪。

※专题 4.8:工作分摊计划、每小时劳动生产率以及有效需求

在我们前面的劳动力需求方程中,所有变量都被表示成“年流量”的形式(例如,年产出), T 表示单位工人的年产出,也就是年生产率,而 w/p 表示单位工人的年真实工资收入。

因为我们现在要考虑每周或每年工作小时数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根据每周工作时间的改变来重新定义变量。我们作出如下定义:

$$T = T_h h$$

$$w/p = w_h h$$

在这里, h 指的是每个工人的平均工作小时数, T_h 指的是每小时劳动生产率, w_h 则是每小时真实工资(真实时薪)。

劳动力有效需求方程:

$$N^{Dff} = a/[T - (w/p)]$$

可以被转换为:

$$N^{Dff} = a/[T_h - w_h]h$$

我们来考虑两种极端的情况。如果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也就是每个工人年工作小时数(h)减少,而每小时生产率(T_h)和真实时薪(w_h)保持不变,这会导致总就业水平(N)的升高。工作分摊计划达成预期目标。

但是,在四天工作制的条件下,如果工作时间的缩短被每小时生产率的升高抵消,这样年生产率(T)将不会发生变化。同时,我们假设真实时薪(w_h)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每个工人的年工资收入(w/p)= $w_h h$ 低于从前(过去年平均工作小时 $h=2000$,也就是每年工作50周,每周工作40小时,但是在新的四

天工作制下,总工作时间为 1600 小时,也就是在 50 个周里每周工作 32 小时)。通过方程 $N^{Def} = a/[T_h - w_h]h$ 我们可以发现这会导致就业下降。如果每个工人的年工资收入保持在初始水平,就业既不会升高,也不会降低。

如果企业主在生产率升高的情况下依然保持成本毛利率 (θ) 不变,也就是说,真实时薪与每小时生产率等比例上升,劳动力有效需求方程则变成如下形式:

$$N^{Def} = a(1+\theta)/(\theta T_h h)$$

因此,如果年生产率下降,也就是说,工人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本应在较长的时间内完成的工作,就业就会上升。

第五章 长期新旧增长模型

5.1 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

剑桥学派模型

在第一章里我们讲到,后凯恩斯主义者以增长和分配模型(比如1956年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罗宾逊和卡多尔所开发的模型)而闻名。这些早期模型的主要目的是在给定增长率的条件下解释收入分配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解释利润率,并与新古典主义的边际生产率理论割裂开来。

为了解释利润率,这些早期后凯恩斯主义模型以卡莱斯基利润方程($P=I/s_c$)的动态形式作为起点。等式两边同除以资本存量(K)后,我们得到利润率($r=P/K$)和增长率($g=I/K$)。因此,根据利润方程,我们得到如下关系:

$$r=g/s_c$$

这就是剑桥学派方程式。它表明宏观经济利润率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与利润储蓄倾向成反比(我们仍然假设工人没有储蓄)。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个方程定义为储蓄方程,我们也正打算这样做。总储蓄是利润与利润储蓄倾向的乘积。因此,根据这种储蓄观点,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可以表示为利润储蓄倾向与利润率乘积的形式。我们可以将剑桥学派模型写成如下形式:

$$g^s = s_e r$$

香蕉图形

我们已经了解什么决定利润率,那么又是什么决定经济增长率呢?根据罗宾逊(1962)的理论,经济积累增长率,也就是企业家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家的预期利润率或者估计利润率(r^e)。如果我们将其表示为线性关系,它的动态投资方程可以写成:

$$g^i = \Delta K/K = I/K = \alpha + \beta r^e$$

但是罗宾逊本人将经济积累率与预期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假设为非线性的:任何积累率的增长都需要预期利润率更大幅度地增长(参数 β 逐渐变小)。

将企业主的投资方程与储蓄方程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图 5.1 中的两条黑色实体线。这就是香蕉图形,因为这两条线所组成的部分看起来像一只香蕉。但是,在投资方程非线性的条件下,这个图形产生了两个可能的均衡位置。也就是说,有两组值可以使得预期利润率等于实际利润率。这两个均衡点都是长期均衡点。

L 表示较低的均衡点,在此位置的利润率和积累率都较低,而且不稳定。相反,高点均衡位置 H 是稳定的,并具有较高的利润率和积累率。处于 L 点右方的经济最终都会到达 H 点。

这里关键的问题当然是为何 H 点是稳定均衡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假设企业主预期利润率为 r^e ,这个值大约在

两个均衡点的中间位置。根据这个预期利润率和投资方程(g^i),企业主的资本存量增长率为 g_0 ;而根据上面的剑桥学派方程,实际利润率为 r_0 。我们要注意的 r_0 大于 r^e ,这样就会使得企业主在下个时期具有更乐观的预期利润率(企业主具有适应性预期的能力,只要过去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未来)。预期利润率会逐渐增加,直至点 H 的 r_h^* 处。此时预期利润率等于实际利润率,积累率等于 g_h^* 。

节约悖论的再讨论

早期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的目标之一是将凯恩斯某些短期经济分析的观点进行延伸。换句话说,早期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希望为凯恩斯的静态分析提供一种动态延伸。凯恩斯最重要的结论也许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节约悖论。在这里,我们用动态的形式对其进行讨论。

在我们这样做之前,我们需要知道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索洛模型),储蓄率的下降虽然会造成人均产出的降低,但它对经济增长率不会产生影响。但是,在新古典主义内生增长模型中,储蓄率的降低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降低。这个观点与那些捍卫“别无选择”信条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一致:长胜还需短痛。

但是,后凯恩斯主义者是怎样看待储蓄率降低呢?他们仍然认为这会导致产出和增长的下降吗?节约悖论的动态形式是否存在呢?

图 5.1 可以证明节约悖论事实上也存在于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中。如果储蓄率降低至 s_2 ,储蓄曲线(g^s)会向下方旋转(如图中虚线 g^s 所示)。我们假设经济的起始点是长期均衡点 H (增长率为 g_h^*),此时的实际利润率大于预期利润率(r_h^*)。

这是因为较低的储蓄率使得总需求超出预期。企业主会相应调高预期利润率,从而增加资本积累率。最终,经济到达新的稳定均衡点 H' 。经济此时具有更高的利润率和积累率。因此节约悖论依然存在:储蓄率的降低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这个结论很明显与“别无选择”的基本信条对立。“别无选择”理论认为只有普通家庭增加储蓄率才能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在后凯恩斯主义的框架里,节约只能导致经济下滑和利润率的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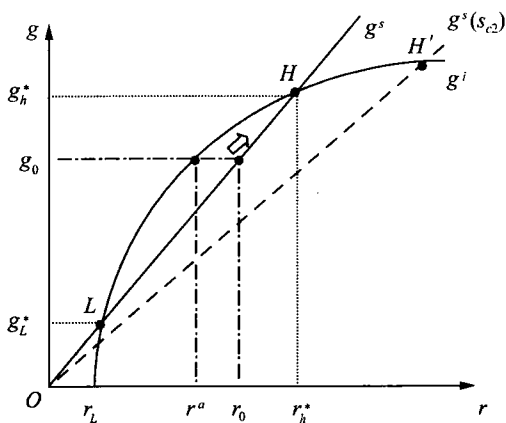


图 5.1 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和节约悖论

增长壁垒

然而,早期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中的一个特点一直为卡莱斯基主义和斯拉法主义学者们所诟病。卡多尔和罗宾逊增长模型的利润率和总成本毛利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在他们的模型中,总成本毛利率(θ 或 Θ , 参见第二章)的

长期可变性促使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升高。根据早期后凯恩斯主义学者的观点,总成本毛利率的增长是由长期竞争所推动的。20世纪70年代的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如埃西纳(Eichner, 1987)和伍德(Wood, 1975)认为这种推动表现为每当垄断寡头市场的主要企业感觉到经济增速时,它们就会增加总成本毛利率,上述分析可以由第二章的资金边界推导出来。

如果我们承认这种推动的存在,我们就必须接受这样的结论:在给定的生产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增大必然伴随着真实工资的降低。这就形成经济增长壁垒,因为工人很有可能会抵制真实工资的降低,并要求名义工资上涨,从而产生工资—价格螺旋上涨。这点被罗宾逊(1956, p. 48)称为“通货膨胀壁垒”。如此一来,真实工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很有可能会是负向关系。但这个说法不被卡莱斯基主义和斯拉法主义学者所接受。

凯恩斯的理论与《通论》的长期延伸理论之间存在很明显的矛盾,保罗·戴维森(1972, ch. 5)首先对此展开研究。在短期内,凯恩斯(以及卡莱斯基)认为需求的上升带来生产的扩大,并增加产能利用率。但是,卡多尔和罗宾逊的模型假设产能利用率在长期内会回到正常水平。因此,长期内商品供给和需求之间,或储蓄与投资之间的调整通过改变价格和总成本毛利率完成。

因此,早期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不能概括凯恩斯《通论》以及卡莱斯基模型,因为在这些增长模型中,经济趋近于均衡点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量的变化。这些缺陷促进了新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的发展,这些模型更多地借鉴于卡莱斯基增长模型。

5.2 新卡莱斯基模型

新卡莱斯基模型是由剑桥大学的罗伯特·罗森(Robert Rowthorn, 1982)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艾米塔瓦·达特(Amitava Dutt, 1990)和兰斯·泰勒(Lance Taylor, 1991)共同提出的,但最初的版本由阿尔弗雷多·德尔·蒙蒂(Alfredo Del Monte, 1975)发表,他也是卡莱斯基的学生。

与早期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不同,在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中企业的利润盈余是给定的,它不是一个内生变量。这就意味着在技术一定的条件下,真实工资也是恒定的而不是内生变量。

整个模型建立在有效需求原则的基础上,所有的调整都是通过数量变化完成。我们先从短期而且投资给定的条件下开始分析。假设总收入上升,这可能是由于边际储蓄倾向的降低(或者说自发性消费的升高)或者是由于真实工资的上升。从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知道总需求的上升会导致生产和产能利用的扩大。

在这些卡莱斯基模型中,闲置产能的降低会促使企业增加固定资本投资。换句话说,产能的增加推动积累率(资本增长率)的增加。在长期内,有效需求的增长会加速经济增长。这也是早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例如希克斯和萨缪尔森)经常提到的加速原理的变形。

❖ 专题 5.1: 利润率的分解

辨别新旧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不同的一个方法是将利润率分成数个部分。实际利润率 r 指的是实际利润与资本存量的

比值。我们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r = P/K = (P/Y)(Y/Y_f) (Y_f/K) = \pi u/v$$

因此，实际利润率是三个部分的乘积，这三个部分依次是：收入的利润份额($\pi = P/Y$)，产能利用率($u = Y/Y_f$)以及技术参数 v 的相反数，也就是资本存量 K 与全产能收入 Y_f 的比值。

我们简单假设 v 是定值，利润率 r 的增加的原因可能是利润份额(π)的增加，也可能是产能利用率 u 的增加。就像我们在第二章中讲的，早期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的簇拥者假设产能利用率保持在正常水平($u = u_n$)不变。因此，只有利润份额(π)的升高才会导致利润率(r)的升高。而 π 的升高只能通过总成本毛利(θ)的升高才能实现。这种情况会在真实工资(w/p)降低并且生产率水平(T)保持不变时发生。

但是，与早期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不同，较高的积累率并不会带来较高的产能利用率。尽管单个企业能够在长期内将产能利用率保持在正常水平(u_n)，但如果所有企业都表现出类似行为，宏观经济整体将会出现一个矛盾的结果，企业最终会以高于或低于正常产能利用率的水平进行生产。总体上讲，即使企业以最大的努力使产能利用率回到正常水平，长期的实际产能利用率也会与正常水平不同。

卡莱斯基模型的图形表达

与早期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一样，卡莱斯基模型也可以用两个简单的方程来表示储蓄方程和投资方程(g^i 和 g^s)。只要满足稳定性条件，市场的力量会将经济推向两个方程曲线的交点。

我们假设工人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谈判或立法获得

较高的真实工资。这也就意味着总成本毛利率(θ)和利润份额(π)会减小。这些变化在长期对积累率和利润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积累率会升高。这可以通过图 5.2 的上半部分表示出来。利润份额(π)的降低会减小总体经济的储蓄率($s=s_c\pi$),因此储蓄方程曲线(g^s)向下方旋转(如图 5.2 中的虚线 g^s 所示)。首先,初始积累率为 g_0^* ,由新的收入分配和更高的消费品需求所提高的销售量与产能利用率 u_1 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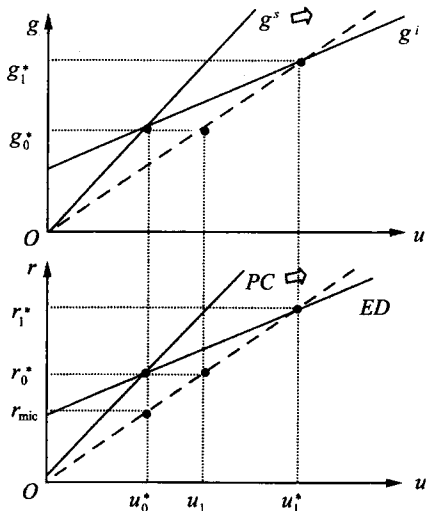


图 5.2 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及其悖论

这些较高的销售量导致企业预期更高的产能利用率,从而促使它们提高积累率,直至经济达到更高的产能利用率 u_1^* 。在这个点上,销售量与生产量完全一致,经济达到新的长期均衡位

置。新的均衡点再次证明节约悖论的存在：利润份额和总储蓄率的下降会导致长期积累率和产能利用率的升高。

※专题 5.2: 卡莱斯基模型的公式化

让我们考虑一个卡莱斯基模型的简单形式 (Edward Amadeo, 1986)。模型中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投资方程, 这与罗宾逊的线性方程类似, 但这里它取决于产能利用率, 而不再是利润率。因此, 我们可以将其写成以下形式:

$$g^i = \alpha + \beta(u - u_n) \quad (5.1)$$

我们可以将 α 解释成企业预期销售的趋势增长率。当实际利用率等于正常利用率 (u_n) 时, 企业希望产能增加的速度与销售增长的速度保持相同, 这个时候 $g^i = \alpha$ 。当实际利用率低于正常水平时, 也就是 $u - u_n < 0$ 时, 企业认为它们产能过剩, 它们会调整它们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并降低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此时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低于销售增长率 $g^i < \alpha$ 。当利用率大于正常值的时候, 情况相反: 企业发现它们没有充足的闲置产能, 它们会使积累率的增长幅度超出预期销售增长率, 从而使产能利用率在将来回到正常水平。投资方程反映出这样的观点: 单独来看, 每个企业都试图回到产能利用率的正常水平。

卡莱斯基增长模型中的其他两个方程现在已经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第二个方程是剑桥学派储蓄方程:

$$g^s = s_c r \quad (5.2)$$

对于第三个方程, 我们需要借助于专题 5.1 中所做的利润率分解。从会计学和成本 (利润成本 PC) 的角度, 利润率 r^{PC} 为:

$$r^{PC} = \pi u / v \quad (5.3)$$

在这个方程中, π 是外生变量, 它与后凯恩斯主义成本加价定价方程中的成本毛利 θ 或 Θ 成等比例关系。在这个简易模型里,

没有上层劳动力(管理人员),生产率恒定,真实工资与利润份额(π)成反比。

结合方程(5.1)和(5.2),我们可以得到有效需求约束,也就是坐标系中所有储蓄等于投资的均衡点。这意味着所有产出都被卖掉,我们从而得到有效需求利润率 r^{ED} :

$$r^{ED} = (\alpha - \beta u_n + \beta u) / s_c$$

另外,将方程 5.1 和 5.2 联立,我们可以得出以产能利用率为表现形式的储蓄方程:

$$g^s = s_c \pi u / v$$

现在我们可以画出代表这三个方程的曲线(如图 5.2 所示)。图 5.2 上半部分表示投资方程[方程(5.1)]和储蓄方程[方程(5.2)],而下半部分则是利润成本曲线 PC 和有效需求曲线 ED 。

成本悖论

第二种效应同样非常重要甚至令人惊讶,这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成本悖论的动态形式。真实工资的升高虽然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但也导致更高的长期利润率。换句话说,每家企业总成本毛利率的降低最终会导致整个经济利润率的升高。

利用图 5.2 的下半部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悖论。真实工资的提高和利润份额 π 的降低可以被表示成为 PC 曲线的向下旋转。

它表示产能利用率与会计利润率的对应关系。如果利用率保持在 u_0^* ,利润率会降至 r_{mic} 。这种情况等同于微观部分均衡分析中假设企业成本毛利率的下降。但是,如果我们考虑这个假设的宏观经济影响,实际产能利用率不会保持在初始水平。随着实际销售量的增长,利用率会增至 u_1 。即使成本毛利率下

降,企业短期利润率仍然能够保持初始水平 r_0^* 。

在长期内,加速效应产生作用。利用率提高增加积累率,后者同时又带动利润率至更高水平。经济最终会到达利润率 r_1^* ,此时 PC 和 ED 再次相交。

这个例子说明成本悖论是个宏观经济现象。如果某个企业提高实际工资并减低总成本毛利率,其他情况不变,很明显企业只能获得较少利润并面临利润率降低(除非出现效率工资理论中的真实工资增长同时导致生产率增长)。但是,如果所有企业降低它们的总成本毛利率,这会提高整体经济的产能利用率,从而提高宏观经济利润率。

最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单个企业通过降低真实工资或裁员(但不会降低剩余员工的生产率)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利润毛利并独自获利,但是只有所有企业同意降低总成本毛利率,利润率整体水平才能升高。

成本悖论和节约悖论是卡莱斯基本标准增长模型的两个关键特点。储蓄率的降低会升高积累率,而真实工资的升高会带来宏观经济利润率的提高。这两个结果与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别无选择”理论直接对立。实际上,在没有假设充分就业和全产能作为经济分析起点的情况下,这是两个描述经济发展的经典案例。这两个悖论强调有效需求的重要性,真实世界中经济调整是通过数量调整而不是价格调整来完成的。最重要的是,它们指明微观市场个体行为分析的缺陷在于它忽视宏观结果分析。没有综合考虑宏观经济整体规律而想当然地推断往往会产生谬误。

5.3 卡莱斯基模型的延伸和批判

自然增长率和有效需求

我们之前的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分析只考虑到需求方面，并没有为供给分析留下任何空间。但是，我们还应该重视供给条件，因为它们也会影响经济发展。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考虑一些这方面的影响。

我们的分析从自然增长率问题开始。自然增长率是技术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的集合。按照卡莱斯基模型的分析，如果自然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发生偏离，失业率就会根据当时的情况持续增加或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卡莱斯基模型将是不稳定并趋于离散的：这种非均衡状态只可能出现在短期，否则实际失业率会降低为零或者升高至无限大。

我们有两种方法来回应这个批判。第一点是假设员工的谈判能力，也就是企业成本毛利率会针对实际经济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差值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失业率的变化会导致成本毛利率（或员工谈判能力）的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利润盈余的内生性会将经济增长率推至其自然水平。但是，有效需求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更强大的自发性需求会降低长期失业率（Stockhammer, 2004）。

第二点回应也许更加激进：尽管供给条件很重要，但自然增长率会针对实际增长率进行相应调整。也就是说，供给根据有效需求的变化而变化（Leon-Ledesma 和 Thirlwall, 2002）。这也意味着自然增长率是内生变量。

内生性技术增长

如果我们以上所说是正确的,那我们如何证明呢?很多理论可以解释自然增长率的内生本质。比如,当经济快速膨胀时,劳动力供给也会顺应发展,这主要是通过增加单位员工的劳动小时数、增加人口的就业率(特别是扩大女性就业),或者增加外来移民劳动力来完成。当然,其他一些因素也可以提高技术增长率: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部门的转移倾向、规模经济、知识掌握的动态机制(实践学习)以及科技创新的迅速传播。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说明自然增长率是内生变量,并随着经济需求的变化而调整。自然增长率的内生性可以被解释成一种滞后现象:实际总需求增长率产生了多重自然增长率。经济具有路径依赖性。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观点相对新颖,是受到非线性动态理论,滞后理论以及锁入效应理论等近期文献的启发而产生,但实际上早期的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就已经提出了多重自然增长率的可能性,例如以下引文的内容:

“在生产能力的期望扩张速度(企业主各项决定的结果)超过劳动力扩张速度(正如我们所见,这个扩张速度是自发性的,但受到产量增长的限制只能局限于一定水平)的社会,技术进步的增长很可能达到最大水平。”(Kaldor, 1960, p. 237)

“但是与此同时技术增长速度会加快并适应资本积累的增长水平。技术增长率并不像天上飘落的细雨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当经济驱使企业主提高人均产出时,企业主会努力创造发明并提高科技水平。比如加快新发明更重要的是加快科学创新的普及速度。当企业主发现它们面临潜在市场的膨胀,但劳动力很难凑齐的情况下,他们就拥有充足的动力去提高生产率。”

(Robinson, 1956, p. 96)

凡登定律 (Verdoorn's Law)

我们刚刚简要介绍了经济增长率与技术增长率的正向关系,也就是卡多尔(1957)所说的技术进步函数。这个正向关系被多个国家所验证,经济学界称之为凡登定律(McCombie and Thirlwall, 1994)。

凡登定律与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结合会产生令人惊讶的结果。让我们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成本毛利率降低(真实工资升高)。根据卡莱斯基模型,这会导致有效需求的升高,从而加快增长率。但是现在凡登定律告诉我们增长率的升高会导致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也就是参数 T (第四章中定义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增大。因为在总成本毛利率一定的条件下,真实工资取决于 T ,这也就意味着真实工资增长速度的提高(Lavoie, 1992a, p. 327)。

因此,凡登定律再次印证卡莱斯基模型中的成本悖论。总成本毛利率的降低以及真实工资的上涨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利润率,还对技术进步的长期增长率、真实工资的长期增长率和人们购买力的长期增长率起到积极作用。卡莱斯基模型的结果再次抨击了“别无选择”捍卫者所谓的“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

投资方程的变形以及社会阶级矛盾

卡莱斯基模型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它强调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矛盾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以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不同,真实工资和利润率之间并不一定是反向关系。恰恰相反,卡莱斯基模型告诉我们工人和资本家的合作会给整体

经济带来有利影响。工资增长带动利润增长,资本积累是以工资为导向的。

但是,很多马克思主义和斯拉法主义经济学家质疑卡莱斯基模型的结论。他们对模型进行少许修改。我们会在这里介绍两个有趣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来自巴杜里和马格林(Bharduri 和 Marglin, 1990)以及科兹(Kurz, 1990)的研究。

这些学者接受卡莱斯基模型的假设,但他们修改了投资方程。他们认为积累率 g^i 不仅取决于利用率,而且还取决于利润份额 π (Bharduri and Marglin), 或者取决于企业评估的正常利润率 r_n (Kurz)。虽然这些变化表面开起来不会产生多少影响,而且也不会对节约悖论产生任何影响,但它们实际上对成本悖论有重要意义。

我们来考虑真实工资的上升所产生的影响,这导致了利润份额和正常利润率的降低。真实工资的上升对总需求中消费部分产生的正面影响被工资上升所导致的总需求投资部分的负面影响所抵消掉(至少是部分上抵消掉)。在某些参数水平下负效应占主导地位,真实工资的上升就会导致积累率的下降、利润率和利用率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积累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在这种投资方程的变形中,成本悖论不再是不可避免的,它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根据这些区别,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和激进主义学者似乎达成了以下共识(参见 Blecker, 2002):在实践中,正常利润率降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销售量和生产者现金流的增加所抵消掉。实际上,很多实证研究证实投资的决定对企业现金流的变化非常敏感(Fazzari et al., 1988);而且我们知道较高的现金流与较高的产能利润率密切相关。

最终,基于工资和薪水的储蓄以及劳动收入的赋税似乎会

减少降低总成本毛利率对经济增长所起的积极作用。此外,在开放型经济中,真实工资的升高(通过增加名义工资来实现)会降低本国企业相对外国企业的竞争力,从而降低国际市场对产品的需求。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周期的实证研究得出的不同结果也证实成本悖论只是在某些参数值范围内成立。

※专题 5.3: 金融市场的作用

为了简便,目前讨论的所有模型都省略了金融市场。如果将利息支付和金融市场纳入后凯恩斯主义模型,又会如何呢?在第二章关于资金边界的叙述首先为我们提供了暗示——真实利率的升高导致企业毛利率的升高或自我支付能力的降低。在标准卡莱斯模型中,这两种变化都会导致不利影响:前者降低了工人的消费水平,而后者降低了投资水平。

如果我们采用马格林和巴杜里或科兹对投资方程的变形,模型将更加复杂。由于金融资产的高回报率(也就金融市场的高额资本收益),以利息为主要收入的人的消费水平会提高,这时较高的真实利润对经济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这个结论已经被艾普斯滕(Epstein G. A., 1994)以及海恩和奥森(Ochsen K., 2003)的研究所证明。

最后,法国调节学派的一些学者,例如博耶(2000)和普利翁(2002),通过参考基于股票收益的消费,以及金融投资者对其投资的生产部门的投资回报底限(例如,为了促使管理人员将股东利益最大化,金融投资者会要求15%的股东回报率),分析了宏观经济悖论的其他可能性。

第三章所讨论的系统性货币体系非常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因为它包括了企业债务负担和普通家庭对不同金融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的偏好。

收支预算平衡约束

我们现在放弃卡莱斯基模型迄今为止的一个重要假设并研究国外总需求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将收支预算平衡作为分析起点。某些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从哈罗德的开放型经济乘数中得到启发(卡多尔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这个领域也作出突出贡献):如果没有受到收支平衡约束,很多国家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实际上,根据某些学者(例如 McCombie and Thirlwall, 1994)的理论,当国家进口增长过快从而导致贸易失衡时,多数政府会对增长施加约束。这些国家具有刺激高速增长的手段和资源,并创造出充足的国内总需求来保证资本积累。但这些国家往往被经常性账户赤字所制约。

虽然国外资本涌入所造成的资本账户盈余可以轻松补偿经常性账户赤字,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现象(美国除外,因为它的货币是国际通用货币)。这些国家无法忍受长期的经常性账户赤字,因为它们不得不为累积外债和外国投资支付高额利息和分红。因此,在长期内,经常账户必须保持平衡,进口必须尽量与出口相等。

如果我们假设本国出口取决于国外收入,而进口简单地取决于本国收入和本国进口倾向,根据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外向型经济(除去美国)的长期最大增长率可以用如下方程表示(也被称作 Thirlwall 定律):

$$g^{BP} = \epsilon z / \eta$$

其中 g^{BP} 指的是经济在收支预算平衡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增长率。

最大增长率与国外收入(z)和对本国商品的国外需求弹性(ϵ)成正比,与进口需求弹性(η ,弹性在这里定义为收入增长一

定的百分比所导致的需求增长的百分比)成反比。

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证实了这个简单函数的有效性。实际上,除了美国和日本,这个理论可以应用于1960~1990年间的所有发达国家。美国的实际增长率远超 g^{BP} 的估计,部分原因是美国的贸易伙伴购买大量的美元债券来负担美国大规模的经常性账户赤字。日本的实际增长率却低于 g^{BP} 的预期,这是由累积现金账户盈余造成的。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2000年后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

然而,在美国的案例中,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官员所说,收支预算平衡约束具有更多含义,因为它迫使其其他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缩减国内需求。结果导致全球总需求呈现下降趋势。

面对这种压力,戴维森(1982)倡导一种国际体系迫使“债权国”调整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IMF或其他国际货币组织应当要求经常性账目盈余的国家增加它们的总需求,从而避免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经常性账户赤字的国家采取紧缩性货币和财政政策。

通货膨胀

除了上述外部约束,另一种约束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个约束可能会破坏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结果:这个约束就是通货膨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杰拉德·杜梅尼尔和多梅内克·列维(Gerard Dumenil and Dominique Levy, 1999)提出卡莱斯基模型的另一种变形,并改变了其常规的长期结果,特别是节约悖论和成本悖论。

根据杜梅尼尔和列维的理论,当产能利用率水平超过正常水平的时经济中会产生通胀压力。这也是需求驱动型通货膨胀

的典型示例。当需求超过正常利用率水平下的供给时，通货膨胀出现。实际上，在杜梅尼尔和列维的模型中，通胀水平与产能利用率实际水平与正常水平的差额成正比。

根据这些学者的理论，只要通胀持续，央行就应该采取紧缩性政策。例如，只要通货膨胀率没有回到零点，也就是实际产能利用率高于正常水平，央行可以提高利率。经济将会面临持续升高的利率。这些高利率最终会减缓预期销售增长趋势（投资方程中的参数 α ）。高利率还会降低积累率，因为企业由于过于沉重的财务负担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

短期内采用凯恩斯主义，长期内采用古典主义

如果这个观点被广泛接受，货币政策将变成一种自由调整机制，自我矛盾的宏观经济规律将被避免。这种机制可能偶然与央行的新共识主义模型类似。比如，以降低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会迫使产能利用率回归至正常水平。卡莱斯基模型的意义非常重要。

事实上，就像杜梅尼尔和列维所讲的，采用这种方法的货币政策使得经济学家在分析短期波动时成为卡莱斯基主义（或者凯恩斯主义），而分析长期增长时保持古典主义。根据他们对卡莱斯基模型的变形，储蓄率的降低（真实工资的提高）即使对短期有利，最终也会导致长期积累率的降低以及真实利率的上升。杜梅尼尔和列维试图复兴古典主义学者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资本积累需要节制、节俭以及贷款供给。我们又回归到“压抑科学”的教育中。

然而，后凯恩斯主义者不同意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古典主义变形。他们相信产能利用率的升高不一定导致单位成本的上升。这种通货膨胀的观点与我们在第二章中的分析一致——只

要利用率保持在低于全产能的水平,企业的边际和平均可变成本曲线就会保持原来的水平。此外,如果按照凡登定律,经济增长促使生产率提高,并部分抵消掉由于失业率的下降而导致的工资上涨所产生的影响,通胀压力会被抑制。这正是发生在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经济现象:高速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并存,而且同时没有产生通胀压力。

根据后凯恩斯主义理论,通货膨胀主要是社会各阶级(收租人之间,工人和企业主之间)因为收入分配而引发矛盾的结果(Taylor, 1991, ch. 4; Cassetti, 2003)。高利用率产生高利润率,这也促使工人和工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Kaldor, 1985, p. 39)。这也是在高利润率与高增长率和低失业率并存时的典型案例。良好的工资谈判机制会避免高增长与高通胀的同时发生(Hein, 2002)。此外,世界性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原材料成本上涨可以通过超主权缓冲性库存来解决。通货膨胀绝不是无可避免的,它只是低效的政府和制度造成的不幸结果。

❖ 专题 5.4: 水平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

菲利普斯曲线也许是经济学中最著名的概念。一般来讲,这个曲线叙述了失业率与价格通货膨胀率或工资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最近,菲利普斯曲线的意义得到进一步延伸,用来解释产能利用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正向关系。在杜梅尼尔和列维(1999)的模型假设这种正向关系长期成立,而新古典主义学者通常认为这种正向关系只在短期内成立,长期内的菲利普斯曲线则是处于正常利用率水平(与之对应的是自然失业率或者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垂直直线。

大多数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否定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这个概念。他们相信,即使 NAIRU 存在,它也不是

单独由供给决定而与总需求无关的。实际上,后凯恩斯主义者甚至对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也提出一些不同解释:

“如果真的只存在一个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水平,宏观经济政策就失去了继续讨论的意义。现在我开始不再相信这个论述,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正确性。我可以接受通货膨胀率适当升高是实现低失业率所可能付出的代价这个说法,但我不认为失业率降低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Godley,1983,p.170)

目前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是非线性的,如图 5.3 所示,增长率、失业率或产能利用率的中间一段是水平的。通货膨胀在这段水平部分保持稳定。很多阐述滞后效应的文献也认为 NAIRU 会趋向于实际失业水平,并受到总需求的影响(Eisner,1996;Filardo,1998)。实证研究的整合分析结果(Stanley,2004)显示,政府在调整需求和充分就业政策上仍有很大空间。尽管目前大多数央行,尤其是欧洲央行,仍然将经济目标锁定在利用率的 u_m 上,并认为这是唯一的非通货膨胀利用率水平,但央行应该更多地向美联储学习,在对经济水平的深浅不断进行探测和试验后,逐渐将经济推向图 5.3 的 u_{fc} 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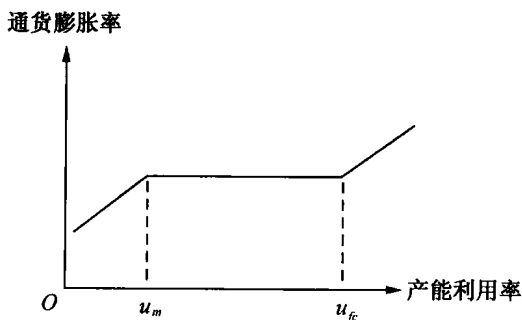


图 5.3 后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水平部分

第六章 结 语

受到凯恩斯的启发,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作是一个鼓励自发性和创造性的系统。在一个良好的政府以及民主制度的支撑下,政府通过调整收入分配以及向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建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有能力克服自身的缺陷以及过剩危机。

贯穿本书的一个潜在宗旨是:如果放任自由,资本主义最终会在丧失竞争力和巨大浪费中走向灭亡。如果没有政府干预,资本主义会产生不稳定和经济周期,它既不会带来劳动力充分就业,也不会实现充足的总需求。

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不同,后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这种不稳定不是竞争力匮乏或者价格僵化的结果。相反,后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价格管制、规则和法制(例如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增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认为以压制短期总需求(例如,降低通胀、外债以及公共债务)为目标的紧缩性政策会带来长期不良影响,因为它们降低了经济生产能力。根据本书的论述,我们应该重新考虑这些消极政策的可行性。现在是将政府和央行的首

要目标从通货膨胀转向充分就业的时候了。

为了保证充分就业(即使经济依然有通胀压力),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倾向于包括资本收入的永久性收入政策(Davidson, 1972, ch. 14)。还有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热衷于就业缓冲存量的方法,这通常被称为“就业保障计划”、“最后的雇主”或“公共服务就业”。通过这些方式,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为那些希望就业却无法在私人部门找到就业机会的人提供公共事业工作机会(Forstater, 1998; Juniper and Mitchell, 2005)。这会降低非自愿性失业所带来的危害和浪费。与普通的总需求政策相比,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就业保障计划”迫使政府在市场最需要的时候向高失业率地区和社会阶层扩大开支,从而使经济保持通货膨胀稳定的同时降低失业率。

后记 次贷危机

我认为,中国真正需要的是那些曾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工作过,并拥有像西方金融精英那样锐利的眼光和精准的判断力的人才。

——摘自格林斯潘 2007 年著作《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

历史背景

这本书最初的法文版写于 2003 年,后于 2005 年译为英文版。从 2006 年开始,很多欧洲大型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减记美国次级贷款市场业务。2007 年 7 月,美国当时的第四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rns)宣布该银行旗下两支投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的对冲基金破产。但这一切并没有引起大多数分析家的重视。接下来,在 2007 年 8 月,随着欧洲很多商业银行濒临破产,银行互相之间失去信任,灾难性的时刻终于到来。结算盈余的银行拒绝通过拆借市场向结算赤字的银行贷款。这迫使欧洲央行不得不源源不断地向货币市场提供大规模资金来确

保隔夜率接近基准利率水平。这次危机很快得到平息,央行的决策者们以为他们聪明有效地避免了金融风暴的发生。然而之后不久,全世界的投资者开始停止投资以长期债券、抵押和证券(尤其是美国次级贷款市场证券)为支撑的短期资产,从而导致很多国家爆发流动性危机。几周后,英国大型风险抵押债券发行商 Northern Rock 发生大规模挤兑。尽管百般不愿,但英国政府不得不救助 Northern Rock 并将其国有化。

从那之后,整个世界处于次贷危机的笼罩之下。这场危机开始只是通过房地产市场冲击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但随后迅速波及到股票市场和实体经济。许多国家震惊之余不得不经历银行救助、银行国有化、经济衰退以及财政刺激计划等一系列过程。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次危机感到吃惊,这其中包括宣称危机在 2006 年之前就已经被有效阻止的韦恩·高德雷和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前者认为普通家庭的债务将不会继续累积,而后者则认为房价将会停止上涨。尽管经过数年来衍生和无节制扩张的金融数学模型越来越趋向复杂化,但这两种影响交织在一起(过高的家庭债务和停滞甚至下跌的房价)还是暴露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对于这次的次贷金融危机有何见解?它能够分析这次危机的本质吗?这本书有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呢?我认为,虽然《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本书没有预测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试图去那样做),但是书中的很多篇章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很多近期发生的事件。毫无疑问,这次的金融危机就像 20 世纪 30 年的大萧条一样会被载入史册。事实上,与西方国家最近经历的两次经济衰退相比(分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我们认为这次的次贷金融危机与导致 1929 年经济大萧条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为相似。

银行业：对利润的贪婪和对亏损的恐惧

由于次贷金融危机主要涉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所以我们首先将这部分与本书内容联系起来。在“宏观经济中的货币流通”一章中，我屡次强调银行系统可以无限制地发放贷款。与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不同，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不认为可贷资金能够限制货币增长。贷款的产生取决于银行的流动性偏好以及借款者信心。银行业的基础是信赖、信心以及良好的信誉。如果某家银行认为贷款可以带来更多盈利，只要它可以取得其他银行的信赖，它就可以永远放贷。银行的运营永远是在对利润的渴望和对亏损的恐惧的交替中前行。增加贷款可以获得更多盈利，但是为错误的对象或在错误的时间（如果借款人无法偿还利息或贷款违约）提供贷款却会导致大规模营业和资本亏损。这就是为什么银行需要制定标准，从而帮助他们决定贷款给谁、何时贷款以及如何抵御风险。

但是，这些标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因为它们不是完全客观并被广泛认可的。银行往往在经济糟糕的时候设定更严格的标准，而在经济扩张的时候设定更宽松的标准。就像书中第三章图 3.3 所示：在经济衰退的时候，银行实行信贷配给并提高信贷成本（也就是扩大实际贷款利率与基准利率之间的差额）；但是，在经济上升的时候，金融机构会鼓励借款者申请贷款并提供较低的贷款利率和息差，因为这时候他们认为违约风险较低。我们在第三章 3.3 节讨论后凯恩斯主义主要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的时候也对此作出更为详尽的阐述。根据明斯基的理论，随着经济繁荣的到来，经济个体将减持非流动资产并增加负债。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有利的条件最终导致金融系统的不稳定。这就是他所谓的“金融不稳定假说”或“金融脆弱性假说”。

明斯基的研究显示在经济上升期银行倾向于提高杠杆比率 (leverage ratio)^①,企业也倾向于提高负债比率。如同明斯基预测的那样,随着次贷危机的到来,虽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高杠杆化比率,但企业发现它们的负债比率在2000年经济扩张过程中并没有增加,甚至有所下降。相反,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等许多国家的家庭负债率^②不断攀升。在Dorene Isenberg (1988,1994)根据大萧条的历史数据研究明斯基理论时,她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普通家庭(而不是企业)表现出负债率上升。他们的负债/收入比率在1922~1929年间翻了一番。普通家庭通过疯狂借贷来购买房产和股票。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大萧条的主要特征是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和超额购买股票(通过贷款),但是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债务却来自房产抵押。这与现在的次贷危机有很多相似之处: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以及很多欧洲银行通过对冲基金纵容高比例杠杆操作,同时普通家庭可通过大规模借款来购买住宅。

黑天鹅

那些通常谨小慎微的银行家又是如何卷入这场超额借贷的陷阱中的呢?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将其归因于“根本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在一个信息和未来不确定的世界,任何决定都取决于信心和投资本能冲动。在人们的一系列行动中并没有清晰的基本原理可以遵循。在金融市场尤其如此。在无法得到可靠信息的条件下,银行家和投资者只能相信过去。他们依赖普通概率

① “银行杠杆比率”也称作“银行举债比率”,指的是银行的金融资产规模与其自有资金的比率。

② 净资产或可支配收入中的债务比例。

分布模型,假设最近的过去能够指引未来。就像最近一部畅销书的作者(Taleb,2007)所描述的:大多数银行家和投资者都不会假设黑天鹅(不可预测的灾难性小概率事件)的存在。就像贷款可以无限产生一样,如果处理不当,流动性危机所需要填补的资金也是无限的。大多数非主流学者,特别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相信放任自由的市场是不稳定的。金融市场更是如此。金融的不稳定性带给实体经济(也就是美国人常说的“商业街”)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由于金融系统自身的不稳定性以及某个大型金融机构倒塌可能给本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带来的系统性伤害,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第一章 1.3 节和第三章 3.3 节)主张,银行和金融市场需要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

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证券化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银行家将金融创新一般化和概括化并称之为“证券化”。这意味着一种被称作“创新分配体制”的新型银行业的诞生。在这项金融创新之前,银行发放的抵押贷款往往终止于银行,并且只能在 25~30 年的期限内获得小额利润。如果借款人喜欢风险投机,那么发放抵押贷款的银行需要承担更多风险。但是,证券化过程改变了一切。发放抵押贷款的银行通过将这些抵押贷款重组打包并以证券的形式(并且大多数是高等级债券)将其出售获得巨额利润。违约的风险不再属于发放贷款的银行,而是转向购买这些债券的投资者。这种方法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因为它将风险稀释并分摊到投资大众和投资机构上,而由这些投资人和投资机构对新获得的资产进行风险评估。随着金融机构大规模购买抵押债券,大批金融衍生品不断地输入市场,商业票据大量发行。富有的家庭,拥有流动现金的小企业以及养老基金公司为了追逐流动资产和高额

利润大量买入这些债券和票据。模拟证券化过程以及人造资产的出现促使金融创新进一步加深。投资者通过“信用违约掉期”^①等手段对赌这些证券是否能够实现承诺的回报率。

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系统，我们根本不需要经济学博士学位，因为它与房产经纪人、抵押贷款经纪人和银行家的短期盈利奖金紧紧联系在一起，而资产长期持有者的损失则没人负责，它充斥着不稳定，鼓励诈骗，并最终走向金融灾难。这就如同法国人所讲的“après moi, le déluge!”（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明斯基（1987）很早就警告说证券化会帮助银行摆脱资本充足率的束缚。明斯基宣称，在极端情况下，只拥有少量资金的银行可以凭借制造巨额抵押贷款，将其证券化并向非金融部门抛售，而这一切行为将不会受到任何规则的约束。明斯基还认为证券化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美国的抵押贷款可能以债券的形式被其他国家所持有。虽然在很多国家（例如德国）禁止证券化，但德国的货币当局没有禁止德国银行购买抵押债券。最终，很多德国银行在美国次贷交易中遭受巨额损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德国银行甚至不得不先于美国同行接受救助。事实上，正是一家德国银行的破产导致了2007年8月的欧洲银行拆借市场危机，而那只是形势恶化的第一个信号。

流动性

这场次贷危机将一个经济学概念推上前台，同时这个概念

^① “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 CDS)是金融衍生工具之一，双方交易时，买方为信贷违约时受到保护一方，而卖方为买房信贷违约的损失提供保险赔偿。CDS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信用违约者提供一个高比例保险业务。但是如果担保方没有足够的资金保证，则是非常危险的投机行为。

屡次被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强调,这就是“流动性”。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论断,市场总是能够自己找到正确价格。如果价格降低,就会有人购买。但这一切只发生在市场具有流动性剩余的基础上。如果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出售某项资产,而同时没有人愿意购买这项资产,市场就必须有一名最后的贷款人,否则这项资产的市场将会冻结。自从2007年8月以来,美国政府某些时候在货币市场正是在扮演这样的角色。明斯基的很多相关分析在次贷危机中频繁地被《华尔街日报》等多家金融刊物放在显著位置,并称之为“明斯基时刻”。那些需要流动性,或者所持有的流动资产被冻结的经济个体,试图出售其他资产(金融资产或实物资产)来挽回流动性,但这些举动只会使这些资产的价格急剧下滑并最终导致恶性循环。就像本书第一章1.3节中非主流经济学家所担心的,市场价格的灵活可变性导致如此恶果。

为了保住声誉,央行的决策者们对市场已经进行大规模干预。除了考虑用巨额的安全的政府债券交换风险资产(当银行需要借款时,可以用这些政府债券作为抵押),央行每天还要向无法从拆借市场借款的银行提供大量现金来维持其周转,因为拆借市场此时已经完全冻结。这种行为主要发生在2007年8月和2008年9月,在这两段时间内,华尔街很多投资银行或者破产,或者被救助,或者国有化。银行更倾向于将清算盈余存入央行账户而不是为了微薄的利息收入而将钱冒险借给第二天清晨或下周就可能破产的其他银行。然而,这个混乱时期却证明了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很多理论的有效性(如书中第三章3.2节的内容)。无论什么时候,尽管银行系统的现金需求量很大,货币当局依然能够将基准利率控制在(或接近)目标水平。

对于货币理论的意义

如果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来看待这次次贷危机,我们还要指出两点。第一,我们清楚地看到宏观经济模型无法简单地通过流动性变量、单一利率或单一存量(货币主义提倡的货币存量)来实现。存量—流量比率,比如负债/收入比率和财富/收入比率(部分取决于房地产和股市的坚挺程度)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我看来,次贷危机有力地印证了本书的信条:货币经济需要一个系统性的观点。

金融关系从中扮演关键角色,我们需要分析这种金融承诺如何影响实体经济。适当的资产负债矩阵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交易流程矩阵(如第三章 3.4 节的简易形式),并将所有的金融流量与不同的金融和实物存量联系起来。研究这些存量的变化过程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流动性变量(比如消费和投资),就像明斯基(1996, p. 77)曾经说过的:“与资本主义经济有关的经济模型的结构应该包括相关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次贷危机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还表明我们需要多种利率,而不是几个一般性利率。在经济危机中,无论是短期、长期低风险利率还是市场利率都与银行和非金融机构的违约风险有关,并且不同利息之间差值很大。虽然当我们在本书第三章 3.3 节讨论银行和投资者流动性偏好的时候强调过这点,但这次危机告诉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差异,因为在危机中即使货币当局不断降低基准利率及其目标值,风险市场利率很有可能会持续上升。

次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金融化

最后,我们再简单总结一下这次次贷危机形成的系统性原

因,我们可以将直接原因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和证券化的产生,但人们可能会思考是否还有其他的潜在因素导致了这次危机。许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次贷危机是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不可避免的产物。“金融化”具体指的是金融业控制实体经济的过程。通过金融化,金融服务行业所占GDP的比重增加,经济总体利润份额也会增加(非金融行业管理者被要求实现更高利润),同时,流向金融投资者利润比例也在上升,因为他们可以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本书第五章专题5.3所讲)。当代的金融化进程充斥着金融诈骗和管理者的巨额收入。

在本书第四章中,我们强调了真实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我们主张真实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比率的下降将会导致总需求和经济活动的萎缩。在本书第五章探讨经济增长以及工资导向型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和成本悖论的时候,我们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西方世界真实工资的增长开始逐渐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GDP中的工资份额也远不如前。这种现象本应该导致消费降低和经济增长速度变缓。但至少在某些国家或某段时间内,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另外两个因素抵消了真实工资下降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一,我们已经指出,金融化促使企业将绝大多数利润转移到投资者手中。在本书第四章专题4.2以及第五章的增长模型中,这等同于降低利润储蓄率(参数 s_c)。同样,当普通家庭所获得的利润增大时,他们基于利润的储蓄倾向也会降低。企业的储蓄包括所有未分配利润,而普通家庭则会花费一部分其金融投资收益。因此,储蓄率的降低能够提高利润水平并刺激经济增长。这些高额利润同时导致股价上升。随着股票市场资本收益的提高,利润储蓄率会进一步降低。股票市场的繁荣使人们

感觉自己变得更富有并扩大消费。

第二,金融化放松了信用贷款的发放标准,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很多研究证明,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繁荣是通过提高普通家庭的负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来实现的。换句话说,普通家庭债务的累积鼓励了银行业的发展,消费者带动经济增长。这些现象的发生而后又导致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并再次刺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因此,由于金融化的出现,原本依赖于高工资和高投资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一种依赖于高消费和高额家庭债务(表现在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上)的增长模式。企业没有为普通工人提供适当的工资,也没有大量投资实物资本,而是支付工人较低的工资并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购买消费品、房产和金融资产。

很多后凯恩斯主义观察家(Godley, 1999b)指出,这种增长模式不具有持续性。它适用于负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不断增高的情况下。普通家庭的债务负担最终会爆发(特别是在利率上升的条件下,例如美国上次房地产高峰期的最后阶段)。由于美国和英国房地产市场大量过剩,房地产的繁荣景象始终处于崩溃的边缘,并最终造成次贷金融危机。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目前以消费和债务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我们通过使用本书第三章第四节的交易流程交易流程矩阵,并对实体经济进行模拟分析,也可以很好地证实这种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Godley and Lavoie, 2007)。相对于个人收入,抵押和消费信贷的增高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但在长期内会导致不良后果。为了维持短期的高增长率,普通家庭需要承担更重的债务负担。随着次贷危机的到来,抵押和消费信贷停止流动,甚至成为负值,这因为银行停止房贷,并且普通家庭努力开始还债。整个经济进程开始反向运转,短期内,也许几年内,普

通家庭贷款的下降将对经济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并使得整体经济形式更加恶化。

现实意义

像当年的大萧条一样,这次次贷危机也具有很多附加效应。如上面谈到的,我们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会促使普通工人工资的增长再次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这也许无法在最近几年内实现,因为在经济衰退中,经济规律往往表现为工资的降低。随着失业率的升高和工会力量的削弱,私有企业不会提高工资水平。而对于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巨额赤字将是拒绝为公务员加薪的最佳理由。

从另一个方面讲,银行家们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型企业(例如通用汽车)面对困境的乏力以及对很多企业经理人欺诈行为的隐瞒使很多企业管理者不合理的丰厚报酬公之于众。目前,有迹象表明政府将要严格限制他们的薪金(比如,限制薪金与公司平均工资的比例,或者禁止股票期权甚至津贴计入薪金,否则他们会在公司巨额亏损的同时还享受高额奖金)。此外,这种不合理的高薪鼓励公司管理者追逐短期盈利,忽视长期的不良后果并最终造成灾难性影响。

现在公司的管理者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那些向董事会提交薪酬建议的顾问)已经不可能以高效工作的理由要求数百万美元的年薪了。造成数万亿美元损失的次贷危机显示出银行的高层管理者缺乏适当的判断力,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团队购买或开发了怎样的金融工具。次贷危机还证明,与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市民相比,那些高层管理者在洞察力和能力上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换句话说,管理者的薪水并不是由边际收益决定的,这也与主流教科书的论断相左。

更加显而易见的是,大多数银行家开始认识到对金融行业施加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也会为自己带来利益。金融市场无法自我规范。如果银行通过将重心转移到其他金融部门的方式来规避规章制度,这就意味着这些非银行的金融部门也需要接受相似的管制。同样需要管制的还有对冲基金,因为很多大型对冲基金公司的失败证明它们是整个货币系统的不稳定因素,并最终迫使政府对其进行救助。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虽然拥有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担任顾问,但它依然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

概括地讲,金融市场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在过去30年里,大多数政府奉行市场主导政策,它们这样做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金融市场的压力和胁迫。具体来讲,政府担心如果它们债务负担过重或者忽视信用等级评定机构的警告,这些机构会降低它们证券的等级。目前政府的巨额赤字正是金融市场那些银行家,金融咨询师以及信用等级评定机构的不负责任和愚蠢行为的结果。正是他们造成了现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人们已经不再相信银行管理者和那些首席经济学家的观点,因为人人都知道如果政府没有提供数十亿美元、英镑或欧元的直接救助,如果美联储没有提供安全的国债贷款,他们的公司早已破产。

与此同时,主流经济学家的思想开始发生彻底改变。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曾经认为政府应该像对待瘟疫一样避免财政赤字,他们还曾经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禁止受到1998年亚洲金融海啸冲击的国家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但他们现在开始赞颂使用财政刺激方案应对衰退的优点。突然之间,他们又重新抬起了凯恩斯的标准救助法案,这也是面对经济下滑最为有效的对策。

IMF的经济学家甚至建议国家财政赤字可以达到国民生

产总值(GDP)的2.5%。当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随着价格的下滑处于萧条边缘的时候,他们对公共赤字会带来挤出效应和高利率的担心全都消失了。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赞成财政赤字有利于提高商业利润这个观点(就像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专题4.1讲到的)。随着普通百姓消费意愿的降低,企业投入生产的意愿也在下降,银行更加担心客户的信誉度,政府已经成为稳定经济的唯一部门,也只有政府才能作为一种平衡力量支撑起有效需求。可变市场价格已经无法实现这个目标,而货币政策虽然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但它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只是维持货币系统的运行。

从一个更加深远的角度考虑,次贷危机为主流经济学以及它对“别无选择”理论(除了市场自我调整、私有化、解除管制、消除财政赤字、降低税率和国际资本市场自由化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实现经济目标)的盲目追捧敲响了警钟。毫无疑问,我们看到,或者我们即将看到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当前的第二次凯恩斯主义革命会保持怎样的广度和深度我们尚待观察。很多主流经济学家仍然坚持认为本次次贷危机是政府管制和干预造成的。

令人欣慰的是,超过13亿的中国人民从2007年开始目睹了本次危机的全过程。他们中有很多人也在近期的股市崩溃中蒙受损失。作为工业化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逐渐认识到放松管制的市场并不能带来主流经济学家所许诺的美好愿景,自由市场远远无法达到高效和稳定的状态。他们现在有机会认识到中国经济的高速腾飞并不是因为听从了那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建议。次贷危机令我们与主流经济学划清界限。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我们希望非主流经济学思想在世界多个角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参考书目

Amadeo, E. (1986) 'The role of capacity utilization in long-period analysis', *Political Economy: Studies in the Surplus Approach*, 2(2), 83—94.

Andrews, P. W. S. (1949)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individual busines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1) (January), 54—89.

Arena, R. (1992) 'Une synthèse entre post-keynésiens et néo-ricardiens est-elle encore possible?', *L'actualité économique*, 68(4), 587—606.

Arestis, P. (1992) *The Post-Keynesian Approach to Economic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Arestis, P. (1996)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towards coherenc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 (1), 111—35.

Arestis, P. and M. Sawyer (eds) (1994) *The Elgar Companion to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Aldershot, UK and Brookfield, USA; Edward Elgar).

Arestis, P. and M. Sawyer (eds) (2002)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Dissenting Economists*, 2nd edition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Arestis, P. and M. Sawyer (eds) (2006) *A Handbook of Alternative Monetary Economics*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Asimakopulos, A. (1975) 'A Kaleckian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8(3), 313–33.

Bellofiore, R. (2005) 'Monetary economics after Wicksell: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within the theory of the monetary circuit', in G. Fontana and R. Realfonzo (eds), *The Monetary Theory of Production: Tradition and Perspectiv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pp. 39–51.

Bellofiore, R. and P. Ferri (eds) (2001) *The Economic Legacy of Hyman Minsky*, 2 volumes,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Bhaduri, A. (1986) *Macro-economics: the Dynamics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Bhaduri, A. and S. Marglin (1990) '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 the economic basis for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4(4), 375–93.

Blecker, R. (2002) 'Distribution, demand and growth in neo-Kaleckian macro-models', in M. Setterfield (ed.), *The Economics of Demand-led Growth: Challenging the Supply-side Vision in the Long Run*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pp. 129–52.

Bloch, H. and M. Olive (1995) 'Can simple rules explain

pricing in Australian manufacturing?',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35, 1—19.

Boggio, L. (1980) 'Full cost and Sraffa prices: equilibrium and stability in a system with fixed capital', *Economic Notes*, 9, 3—33.

Boyer, R. (1990) *The Regulation Schoo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oyer, R. (2000) 'Is a finance-led growth regime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Fordism? A preliminary analysis', *Economy and Society*, 29(1), 111—45.

Brunner, E. (1975) 'Competitive prices, normal costs and industrial stability', in P. W. S. Andrews and E. Brunner, *Studies in Pricing* (London: Macmillan), pp. 18—34.

Cassetti, M. (2003) 'Bargaining power, effective demand and technical progress; a Kaleckian model of growth',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7(3), 449—64.

Cecchetti, S. G. (2006)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New York: McGraw-Hill).

Chandler, A. D.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hen, A. and G. C. Harcourt (2003)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Cambridge capital theory controvers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1), 199—214.

Colander, D. (2003) 'Post Walrasian macro policy and the economics of muddling throug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3(2), 17—35.

Copeland, M. A. (1949) 'Social accounting for money-flows', *Accounting Review*, 24 (July), 254—64. Reprinted in J. C. Dawson (ed.) (1996) *Flow of funds Analysis: a Handbook for Practitioners* (Armonk, NY: M. E. Sharpe).

Coutts, K., W. Godley and W. Nordhaus (1978) *Industrial Pric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dson, P. (1972) *Money and the Real World* (London: Macmillan).

Davidson, P. (1982)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the Real World* (London: Macmillan).

Davidson, P. (1984) 'Reviving Keynes's revolution',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6(4) (Summer), 561—75.

Davidson, P. (1988) 'A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uncertainty and the longrun non-neutrality of mone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 329—37.

Davidson, P. (2005) 'Responses to Lavoie, King, and Dow on what Post Keynesianism is and who is a Post Keynesian',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7(3), 393—408.

Davidson, P. (2008) 'Securitization, liquidity, and market failure', *Challenge*, 51(3), 43—56.

Deleplace, G. and E. J. Nell (eds) (1996) *Money in Motion: the Post Keynesian and Circulationist Approaches* (London: Macmillan).

Del Monte, A. (1975) 'Grado di monopolio e sviluppo economico',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ociali*, 46(3),

231—63.

Dostaler, G. (1988) 'La théorie post-keynésienne, la Théorie générale et Kalecki', *Cahiers d'économie politique*, 14—15, 123—42.

Dow, S. C. (2001) 'Post Keynesian methodology', in R. P. F. Holt and S. Pressman (eds), *A New Guide to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Armonk, NY: M. E. Sharpe), pp. 11—20.

Dow, A. C and S. C. Dow (1989) 'Endogenous money creation and idle balances', in J. Pheby (ed.), *New Directions in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Aldershot, UK and Brookfield, USA: Edward Elgar), pp. 147—64.

Drakopoulos, S. A. (1992) 'Keynes's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ur',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9(3), 318—36.

Drakopoulos, S. A. (1994) 'Hierarchical choice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8(2), 133—53.

Duménil, G. and D. Lévy (1993) *The Economics of the Profit Rate* (Aldershot, UK and Brookfield, USA: Edward Elgar).

Duménil, G. and D. Lévy (1999) 'Being Keynesian in the short term and classical in the long term: the traverse to classical long-term equilibrium', *The Manchester School*, 67(6), 684—716.

Dutt, A. K. (1990)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tt, A. K. (2003) 'On Post Walrasian economics, macro-

economic policy and heterodox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3(2), 47—67.

Dutt, A. K. and E. J. Amadeo (1990) *Keynes's Third Alternative? The Neo-Ricardian Keynesians and the Post Keynesians* (Aldershot, UK and Brookfield, USA: Edward Elgar).

Earl, P. E. (1983) *The Economic Imagination: Towards a Behavioural Analysis of Choice*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Eichner, A. S. (1976) *The Megacorp and Oligopoly: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 Dyna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ichner, A. S. (1987) *The Macrodynamics of Advanced Market Economies* (Armonk, NY: M. E. Sharpe).

Eichner, A. S. and J. A. Kregel (1975) 'An essay on post-Keynesian theory: a new paradigm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3(4), 1293—311.

Eisner, R. (1996). 'The retreat from full employment', in P. Arestis (ed.), *Employ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Essays in Honour of Paul Davidson*, vol. 2 (Cheltenham, UK and Brookfield, USA: Edward Elgar), pp. 106—30.

Epstein, G. A. (1994) 'A political economy model of comparative central banking', in G. Dymski and R. Pollin (eds), *New Perspectives in Monetary Econom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231—77.

Fazzari, S. M., G. R. Hubbard and B. Petersen (1988) 'Fi-

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141—95.

Filardo, A. J. (1998) 'New evidence on the output cost of fighting infl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Quarterly Review*, 83(3), 33—61.

Fontana, G. and B. Gerrard (2004) 'A post Keynesian theory of decision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5(5), 619—37.

Forstater, M. (1998) 'Flexible full employment: structural implications of discretionary public sector employ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2(2) 557—64.

Fullbrook, E. (ed.) (2003) *The Crisis in Economics: the Post-autistic Movement* (London: Routledge).

Galbraith, J. K. (1958) *The Affluent Society* (London: Hamish Hamilton).

Galbraith, J. K. (1967)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Garegnani, P. (1990) 'Quantity of capital', in J. Eatwell, M. Milgate and P. Newman (eds), *Capit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pp. 1—78.

Georgescu-Roegen, N. (1966) *Analytical Economics*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dley, W. (1983) 'Keyn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real nation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in D. Worswick and J. Trevithick (eds), *Keynes and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35—77.

Godley, W. (1999) 'Money and credit in a Keynesian

model of income determin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3(4), 393—411.

Godley, W. (1999b) 'Seven unsustainable processes', Special report, 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Godley, W. and F. Cripps (1983) *Macroeconomics* (London; Fontana).

Godley, W. and M. Lavoie (2005—06) 'Comprehensive accounting in simple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 with endogenous sterilization o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8(2), 241—76.

Godley, W. and M. Lavoie (2007) *Monetary Economic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redit, Money, Income, Production and Wealth* (London; Palgrave/Macmillan).

Gordon, M. J. (1997) 'A Keynesian theory of finance and its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in G. C. Harcourt and P. Riach (eds), *A Second Edition of the General Theory*, vol. 2 (London: Routledge), pp. 79—101.

Greenspan, A. (2007) *The Age of Turbulenc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Graziani, A. (2003) *The Monetary Theory of P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levi, J. and P. Kriesler (1991) 'Kalecki,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the surplus approach',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3(1), 79—92.

Hall, R. L. and C. J. Hitch (1939) 'Price theory and business behaviou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2), 12—45.

Hamouda, O. and G. C. Harcourt (1988) 'Post Keynesian-

ism: from criticism to coherence',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40(1), 1—33.

Hein, E. (2002) 'Monetary policy and wage bargaining in the EMU: restrictive ECB policies, high unemployment, nominal wage restraint and inflation above the target', *Banca del Lavoro Quarterly Review*, 222, 299—337.

Hein, E. and K. Ochsén (2003) 'Regimes of interest rates, income shares, savings and investment: a Kaleckian model and empirical estimations for some advanced economies', *Metroeconomica*, 54(4), 404—33.

Heiner, R. A. (1983) '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4), 560—95.

Heinsohn, G. and O. Steiger (2000) 'The property theory of interest and money', in J. Smithin (ed.), *What is Money?* (London: Routledge), pp. 67—100.

Hicks, J. (1974) *The Crisis in Keynesian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olt, R. P. F. and S. Pressman (eds) (2001) *A New Guide to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Armonk, NY: M. E. Sharpe).

Ironmonger, D. S. (1972) *New Commodities and Consumer Behavi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rvin, G. (2005) 'The implosion of the Brussels economic consensus', Working paper 11,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Turin.

Isenberg, D. (1988) 'Is there a case for Minsky's financial fragility hypothesis in the 1920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2(4), 1045—70.

Isenberg, D. (1994) 'Financial fragilit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evidence on credit growth in the 1920s', in G. Dymski and R. Pollin (eds), *New Perspectives in Monetary Macroeconomics: Explorations in the Tradition of Hyman P. Minsk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201—29.

Jorion, P. (2008) *L'Implosion: La finance contre l'économie* (Paris: Fayard).

Juniper, J. and B. Mitchell (2005) 'Towards a spatial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 Working paper 05—09, Center for Full Employment and Equity,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Kaldor, N. (1956)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3 (March), 83—100.

Kaldor, N. (1957)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67 (December), 591—624.

Kaldor, N. (1960)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ssays on Economic Stability and Growth* (London: Duckworth), pp. 233—42.

Kaldor, N. (1976) 'Inflation and recess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 86 (December), 703—14.

Kaldor, N. (1982) *The Scourge of Monetar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ldor, N. (1983) 'Keynesian economics after fifty years', in D. Worswick and J. Trevithick (eds), *Keynes and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48

Kaldor, N. (1985) *Economics without Equilibrium* (Ar-

monk, NY; M. E. Sharpe). Kalecki, M. (1971)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ynes, J. M. (1930) *The Treatise on Money,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Keynes, J.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Keen, S. (2001) *Debunking Economics: the Naked Emper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Zed Books).

King, J. E. (1995a) *Conversations with Post Keynesians* (London: Macmillan).

King, J. E. (1995b)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Aldershot, UK and Brookfield, USA: Edward Elgar).

King, J. E. (2002) *A History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since 1936*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King, J. E. (ed.) (2003) *The Elgar Companion to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Kurz, H. (1990) 'Technical chang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a steady-state approach to unsteady growth', in *Capital, Distribution and Effective Dema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210—33.

Kurz, H. (1994)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6(4), 393—421.

Lancaster, K. (1971) *Consumer Demand: a New Ap-*

proa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anzillotti, R. F. (1958) 'Pricing objectives in large compan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5), 921—40.

Lavoie, M. (1992a) *Foundations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 Analysis* (Aldershot, UK and Brookfield, USA: Edward Elgar).

Lavoie, M. (1992b) 'Towards a new research programme for post-Keynesianism and neo-Ricardianism',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4(1), 37—78.

Lavoie, M. (1996—97) 'Real wages,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the aggregate demand curve in a Kaleckian short-run model',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9(2), 275—88.

Lavoie, M. (2001) 'The reflux mechanism and the open economy', in L.-P. Rochon and M. Vernengo (eds), *Credit, Interest Rates and the Open Economy*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pp. 215—42.

Lavoie, M. (2003) 'A primer on endogenous credit-money', in L.-P. Rochon and S. Rossi (eds), *Modern Theories of Money: the Nature and Role of Money in Capitalist Economies*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pp. 506—43.

Lavoie, M. and W. Godley (2001—02) 'Kaleckian models of growth in a coherent stock-flow monetary framework: a Kaldorian view',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4(2), 277—312.

Le Bourva, J. (1992) [1962] 'Money creation and money

multiplier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4(4), 447—62.

Lee, F. (1998) *Post-Keynesian Price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ibenstein, H. (1978) *General X-efficiency Theo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ijonhufvud, A. (1976) 'Schools, revolutions and research programmes in economic theory', in S. J. Latsis (ed.), *Method and Appraisal in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5—108.

León-Ledesma, M. A. and A. P. Thirlwall (2002) 'The endogeneity of the natural rate of growth',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6(4), 441—59.

Lucas, R. (1981) *Studies in Business Cycle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utz, M. A. and K. Lux (1979) *The Challeng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Menlo Park, CA: Benjamin/Cummings).

Marris, R. (1964) *The Economic Theory of Managerial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McCombie, J. S. L. and A. P. Thirlwall (1994)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Balance-of-payments Constrai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eans, G. (1936) 'Notes on inflexible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6(1), 23—35.

Minsky, H. P. (1976)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Macmillan).

Minsky, H. P. (1981) *Can 'It' Happen Again? Essays on Instability and Finance* (Armonk, NY: M. E Sharpe).

Minsky, H. P. (1986)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new 2008 edn (New York: McGraw Hill).

Minsky, H. P. (1987) 'Securitization', reproduced in Policy Note 2008/2, 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Minsky, H. P. (1996)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in G. Deleplace and E. J. Nell (eds), *Money in Motion: The Circulation and Post-Keynesian Approaches* (London: Macmillan), pp. 70—88.

Mongiovi, G. (1991) 'Keynes, Sraffa and the labour market',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3(1), 25—42.

Moore, B. J. (1988) *Horizontalists and Verticalists: the Macroeconomics of Credit Mon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ll, E. J. (1988) *Prosperity and Public Spending: Transformational Growth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Boston: Hyman).

Nell, E. J. (1992) *Transformational Growth and Effective Demand* (London: Macmillan).

Nell, E. J. (1998) *The Theory of Transformational Growth: Keynes after Sraff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kun, A. M. (1981) *Prices and Quantities*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alley, T. (1996)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Debt, Distribution and the Macro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Panico, C. (1988) *Interest and Profit in the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London: Macmillan).

Parguez, A. (2001) 'Money without scarcity: from the horizontalist revolution to the theory of the monetary circuit', in L.-P. Rochon and M. Vernengo (eds), *Credit, Interest Rates and the Open Economy: Essays on Horizontalism*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pp. 69–103.

Pasinetti, L. L. (1977) *Lectures on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Pasinetti, L. L. (1981)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sinetti, L. L. (1993) *Structural Economic Dyna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sinetti, L. L. (2005) 'The Cambridge School of Keynesian economic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9(6), 837–48.

Penrose, E. (1959)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ivetti, M. (1985) 'On the monetary explanation of distribution', *Political Economy: Studies in the Surplus Approach*, 1(2), 73–103.

Plihon, D. (2002) *Rentabilité et risque dans le nouveau régime de croissance*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Pollin, R. (2003) 'Evaluating living wage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good intentions and economic reality in conflict?', Working Paper 61, PERI,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Reynolds, P. J. (1987) *Political Economy: a Synthesis of Kaleckian and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Brighton: Wheat-sheaf).

Robinson, J. (1956)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Macmillan).

Robinson, J. (1962)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Macmillan).

Robinson, J. (1971) *Economic Heresies* (London: Macmillan).

Robinson, J. (1973). 'The second crisis of economic theory', in J. Robinson,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vol. IV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 92—105.

Robinson, J. (1980) 'Time in economic theory', *Kyklos*, 33(2), 219—29.

Rochon, L. P. (1999) *Credit, Money and Production: an Alternative Post-Keynesian Approach*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Rochon, L. P. and S. Rossi (eds) (2003) *Modern Theories of Money: the Nature and Role of Money in Capitalist Economies*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Roncaglia, A. (1995) 'On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Keynes's and Sraffa's viewpoints on output levels', in G. Harcourt, A. Roncaglia and R. Rowley (eds), *Income and Employmen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Macmillan), pp. 111—25.

Roncaglia, A. (2003) 'Energy and market power: an al-

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s of oil',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5(4), 641—60.

Rogers, C. (1989) *Money, Interest and Capital: a Study in the Foundations of Monetary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ser, J. B. (1998) 'Complex dynamics in New Keynesian and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in R. J. Rotheim (ed.), *New Keynesian Economics/Post Keynesian Alternatives* (London: Routledge), pp. 288—302.

Rotheim, R. J. (ed.) (1996) *New Keynesian Economics/Post Keynesian Alternatives* (London: Routledge).

Rowthorn, B. (1982) 'Demand, real wages and economic growth', *Studi Economici*, 18, 3—54.

Roy, R. (2005) 'The hierarchy of needs and the concept of groups in consumer choice theory (1943)', *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 42 (Summer), 50—6.

Sawyer, M. (1989) *The Challenge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lternatives to 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Sawyer, M. (1995) 'Comment on Earl and Shapiro', in S. Dow and J. Hillard (eds), *Keynes, Knowledge and Uncertainty* (Cheltenham, UK and Brookfield, USA: Edward Elgar), pp. 303—11.

Schefold, B. (1997) *Normal Prices, Technical Change and Accumulation* (London: Macmillan).

Seccareccia, M. (1991) 'Salaire minimum, emploi et productivité dans une perspective post-keynésienne',

L'Actualité économique, 67(2), 166—91.

Setterfield, M. (2003) 'What is analytic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3(2), 4—16.

Shapiro, N. (1977) 'Th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1(3), 541—60.

Shiller, R. (2005) *Irrational Exuberance*, 2nd ed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on, H. A. (1976) 'From substantive to procedural rationality', in S. J. Latsis (ed.), *Method and Appraisal in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9—48.

Smithin, J. (2003) *Controversies in Monetary Economics*, 2nd edition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Spash, C. L. and N. Hanley (1995) 'Preferences, information and biodiversity preservation', *Ecological Economics*, 12(3), 191—208.

Sraffa, P. (1960)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anley, T. D. (2004) 'Does unemployment hysteresis falsify the natural rate hypothesis? A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8(4), 589—612.

Steedman, I. (1977) *Marx after Sraffa* (London: New Left Books).

Steindl, J. (1952) *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tiglitz, J. E. (2002)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Stiglitz, J. E. (2003) *The Roaring Nine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Stockhammer, E. (2004) 'Is there an equilibrium rate of unemployment in the long ru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6(1), 59—78.

Sylos Labini, P. (1971) 'The theory of prices in oligopoly and the theory of growth', in P. Sylos Labini, *The Forc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123—45.

Taleb, N. N. (2007) *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Taylor, J. B. (2004)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4th editi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Taylor, L. (1991) *Income Distribution, Inflation, and Growth: Lectures on Structuralist Macro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Taylor, L. (2004) *Reconstructing Macroeconomics: Structuralist Proposals and Critiques of the Mainstrea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obin, J. (1979) *Asset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Tobin, J. (1982) 'Money and finance in the macroeconomic proces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4(2),

171—204.

Van Ees, H. and H. Garretsen (1993) 'On the contribution of New Keynesian economics', *De Economist*, 141(3), 323—52.

Ventelou, B. (2001) *Au-delà de la rareté: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comme construction sociale* (Paris: Albin Michel).

Vickrey, W. (1997) 'A trans-Keynesian manifesto',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9(4), 495—510.

Walters, B. and D. Young (1999) 'On the coherence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4(3), 329—49.

Wolfson, M. H. (1996) 'A post Keynesian theory of credit rationing',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8(3), 443—70.

Wolfson, M. (2003) 'Credit rationing', in J. King (ed.), *The Elgar Companion to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pp. 77—82.

Wood, A. (1975) *A Theory of Profi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ray, L. R. (1990) *Money and Credit in Capitalist Economies: the Endogenous Money Approach* (Aldershot, UK and Brookfield, USA: Edward Elgar).

索 引

- Amadeo, E. J. 阿马德奥, 31, 129
Andrews, P. W. S. 安德鲁, 28, 55
Anouilh, J. 阿努伊, 43, 44
Arena, R. 艾雷纳, 30
Arestis, P. 阿雷斯特, 12, 13, 20, 39
Asimakopulos, A. 阿萨纳科普洛斯, 105
Barro, R. J. 巴罗, 102
Bellofiore, R. 洛菲奥雷, 67, 86
Benassy, J. P. 贝纳西, 102
Bharduri, A. 巴杜里, 102, 135, 136
Blecker, R. 布莱克, 135
Blinder, A. 布兰登, 8
Bloch, H. 布洛赤, 62
Boggio, I. 博吉奥, 61
Bourdieu, P. 布迪厄, 41
Boyer 博耶, 9, 136
Brunner, E. 布伦纳, 57
Cassetti, M. 卡塞蒂, 140

- Cecchetti, S. G. 卡切蒂, 68
Chandler, A. D. 钱德勒, 47
Cohen, A. 科恩, 11
Colander, D. 科兰德, 33
Copeland, M. A. 科普兰, 93
Coutts, K. 库茨, 62
Cripps, F. 克里普斯, 87
Davidson, P. 戴维森, 26, 27, 29, 79, 125, 138
Del Monte, A. 德尔蒙蒂, 126
Deleplace, G. 德莱普拉斯, 67
Dostaler, G. 道斯塔勒, 102
Dow, A. C. A. C. 道, 84
Dow, S. C. S. C. 道, 28, 84
Drakopoulos, S. A. 德拉科普洛斯, 36, 40
Dumenil, G. 杜梅尼尔, 138, 139, 140
Dutt, A. K. 达特, 31, 34, 126
Earl, P. E. 艾尔, 39
Eichner, A. S. 埃西纳, 13, 20, 30, 39, 53, 64, 87, 125
Eisner, R. 艾斯纳, 141
Epstein, G. A. 艾普斯滕, 136
Fazzari, S. M. 法扎利, 34, 135
Ferri, P. 费里, 86
Filardo, A. J. 费拉多, 141
Fontana, G. 冯塔纳, 36
Forstater, M. 弗斯泰特, 143
Friedman, M. 弗里德曼, 15, 32, 67
Fullarton, J. 富勒顿, 66

- Galbraith, J. K 加尔布雷斯, 2, 10, 28, 37, 41, 48, 49, 113
Garegnani, P. 加列格纳尼, 12, 29
Garretsen, H. 加莱森, 33
Georgescu-Roegen, N. 乔治斯库-洛根, 28, 36, 37, 39, 41
Gerrard, B. 杰拉德, 36
Godley, W. 高德雷, 77, 87, 88, 94, 141, 145, 153,
Gordon, M. J. 戈登, 85
Graziani, A. 格拉齐亚尼, 77
Grossman, S. J. 格罗斯曼, 102
Halevi, J. 哈利维, 23
Hall, R. L. 霍尔, 58
Hamouda, O. 哈默达, 29
Hanley, N. 哈雷, 43
Harcourt, G. C. 哈科特, 11, 29
Harrod, R. 哈罗德, 9, 10, 64, 137
Hayek, F. 哈耶克, 67
Hein, E. 海恩, 136, 140
Heiner, R. A. 赫纳, 27
Heinsohn, G. 海因索恩, 70
Hicks, J. 希克斯, 8, 28, 47, 71, 126
Hitch, C. J. 希治, 58
Holt, R. P. F. 霍特, 13
Ironmonger, D. S. 艾蒙格尔, 40
Irvin, G. 欧文, 117
IS-LM 模型, 8, 98
Juniper, J. 朱尼珀, 143
Kaldor, N. 卡多尔, 3, 9, 10, 11, 23, 27, 28, 30, 63-67, 73,

- 100,102,104,121,124,125,133,134,137,140
- Kalecki, M. 卡莱斯基, 9, 10—12, 23, 25, 28—34, 47, 49, 50, 57, 61—64, 80, 81, 88, 99—116, 121, 124—129, 131, 132, 134—139, 152
- 卡莱斯基主义, 29, 30, 32, 34, 61, 63, 64, 102, 124, 125, 139
- Keen, S. 肯云, 5
- Keynes, J. M. 凯恩斯, 8, 10, 16, 23, 25, 28, 29, 36, 68, 81, 99, 101, 102, 104, 109, 117, 123, 125
- Khan, R. 柯汉, 10, 67
- King, J. E. 金, 12, 13, 31
- Knight, F. 奈特, 25
- Kregel, J. A. 克赖格尔, 20, 53
- Kurz, H. 科兹, 135, 136
- Labini, S. 拉比尼, 51, 62
- Lancaster, K. 兰卡斯特, 37, 40
- Lanzillotti, R. F. 兰齐洛蒂, 40, 59, 64
- Lavoie, M. 拉沃, 13, 15, 39, 77, 82, 92, 105, 134, 153
- Le Bourva, J. 勒布瓦, 68, 70
- Lee, F. 李, 58
- Leibenstein, H. 雷布斯滕, 52
- Leijonhufvud, A. 莱容胡佛, 14
- Leon-Ledesma, M. A. 莱昂-莱德斯玛, 132, 160
- Leontief, W. 莱昂惕夫, 28, 52, 86
- Levy, D. 列维, 61, 138—140
- Lucas, R. 卢卡斯, 26
- Lutz, M. A. 鲁兹, 36

- Lux, K. 鲁斯, 36
- Malinvaud, E. 马林瓦德, 102
- Mankiw, G. 曼昆, 8
- Marglin, S. 马格林, 135—136
- Marris, R. 马瑞斯, 51
- Marshall, A. 马歇尔, 11, 12, 36, 101, 102
- Maslow, A. 马斯洛, 39
- McCombie, J. S. L. 麦考比, 134, 137
- Means, G. 米恩斯, 47, 57
- Menger, C. 门格尔, 36
- Minsky, H. P. 明斯基, 23, 26, 29, 85, 86, 146, 147, 149, 150, 151
- Mises, L. 米塞斯, 67
- Mitchell, B. 米契尔, 143
- Mongioli, G. 蒙吉奥维, 31
- Moore, B. J. 摩尔, 70, 73
- Nell, E. J. 内尔, 30, 39, 67, 105, 116
- Ochsen, K. 奥森, 136
- Okun, A. M. 奥肯, 47
- Olive, M. 奥利维, 62
- Palley, T. 帕利, 13, 20
- Panico, C. 帕尼科, 31, 64, 66
- Parguez, A. 帕盖兹, 61
- Pasinetti, L. L. 帕西内蒂, 3, 10, 12, 20, 29, 37, 39, 60, 64
- Patinkin, D. 帕廷金, 109
- Penrose, E. 彭罗斯, 50
- Pigou, A. C. 庇古, 109

- Pivetti, M. 皮维蒂, 64
Plihon, D. 普利翁, 136
Pollin, R. 波林, 113
Pressman, S. 普莱斯曼, 13
Reynolds, P. J. 雷诺德, 13
Ricardo, D. 李嘉图, 12, 13
Robbins, L. 罗宾斯, 18
Robinson, J. 罗宾逊, 3, 4, 9-11, 22, 27, 30, 39, 48, 50, 63,
102, 105, 121, 122, 124, 125, 129, 134
Rochon, L. P. 罗尚, 67, 73
Rogers, C. 罗杰斯, 69
Roncaglia, A. 隆卡利亚, 31, 32
Rosser, J. B. 罗瑟, 33
Rossi, S. 罗西, 67
Rotheim, R. J. 罗塞姆, 33
Rowthorn, R. 罗森, 126
Roy, R. 罗伊, 41, 42
Samuelson, P. 萨缪尔森, 4, 8, 126
Sawyer, M. 索耶, 12, 13, 30, 47
Schefold, B. 谢弗德, 31
Schumpeter, J. 熊彼德, 67
Seccareccia M. 塞卡莱功, 111
Setterfield, M. 塞特费尔德, 15
Shackle, G. L. S. 沙克尔, 26
Shapiro, N. 沙皮洛, 21
Simon, H. A. 西蒙, 17, 36, 37
Smith, A. 斯密, 18

- Smithin, J. 斯密森, 69
- Solow, R. 索洛, 4, 22, 123
- Spash, C. L. 斯巴什, 43
- Sraffa, P. 斯拉法, 4, 9—12, 28, 29, 57, 59—61, 86
- 斯拉法主义, 9, 31, 61, 64, 请参阅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分支
生产定价理论
- Stanley, T. D. 斯坦利, 141
- Steedman, I. 斯帝曼, 29
- Steiger, O. 斯泰格, 70
- Steindl, J. 斯坦德, 55, 63, 64
- Stiglitz, J. E. 斯蒂格利茨, 2, 8, 33
- Stockhammer, E. 斯多克曼, 132
- Taylor, J. B. J. 泰勒, 68
- Taylor, L. L. 泰勒, 87, 94, 126
- Thirlwall, A. P. 瑟尔沃, 132, 134, 137
- Tobin, J. 托宾, 8, 28, 87, 88, 98, 109
- Tooke, T. 图克, 66
- Van Ees, H. 范艾斯, 33
- Veblen, T. 范伯伦, 10, 28, 41, 49
- Ventelou, B. 文特鲁, 5
- Vickrey, W. 维克里, 27
- Walters, B. 沃特斯, 28
- Weintraub, S. 温特劳布, 27, 102
- Wicksell, K. 维克塞尔, 67, 68, 89
- Wolfson, M. H. 沃福森, 80, 82
- Wood, A. 伍德, 50, 64, 125

- Wray, L. R. 伍雷, 66
- Young, D. 扬, 28
- 奥地利学派, 67
- 边际主义, 35
- 标准成本定价法, 58—62, 请参阅定价
- 别无选择理论, 1, 5, 32, 97, 101, 105, 113, 123, 124, 131,
134, 156, 请参阅新古典主义
- 补偿性原理, 77
- 不可通约性原则, 39, 请参阅不可约性原则
- 不可约性原则, 39, 42, 43
- 不确定性, 18, 24—27, 29, 30, 32, 33, 36, 49, 54, 84, 147, 请
参阅根本的不确定性
- 不稳定假说, 85, 146
- 财富效应, 109
- 财政政策, 99, 101, 138, 155
- 产能
- 过剩, 54, 56, 129
- 全产能, 58, 60, 108, 127, 131, 140
- 产能利用函数, 105, 107
- 产能利用率, 54, 56—58, 60, 61, 63, 78, 105, 108, 125, 127—
131, 138—141
- 实际水平与正常水平, 139
- 与增长率, 63, 65, 71, 123, 129
- 正常水平, 125, 127, 129, 138, 139
- 成本, 请参阅定价
- 边际成本, 46, 53, 55, 106
- 标准单位成本, 58—62

- 单位成本, 53—55, 57—59, 61, 62, 65, 102, 108, 116, 117, 139
- 单位直接成本, 53, 55, 57, 58, 60
- 管理费用, 55, 58
- 间接成本, 55
- 成本悖论, 105, 106, 110, 130, 131, 135, 136, 138, 152
- 成本加成定价理论, 57, 请参阅定价理论
- 成本毛利率, 57, 60—65, 116, 117, 120, 124, 125, 128, 130, 131, 134, 136, 请参阅成本悖论、利润盈余
- 成本曲线, 24, 31, 35, 52, 54, 130, 140
- 冲销, 77
- 储蓄, 110, 125, 请参阅投资
- 储蓄方程, 122, 127—130
- 储蓄倾向, 104, 106, 110, 121, 122, 126, 152, 请参阅节约悖论
 - 与国民收入, 106
 - 与增长率, 22, 50, 122, 153
- 传导效应, 62
- 促发性支出, 99, 请参阅自发性支出
- 存款
 - 的产生, 70
 - 与贷款的因果关系, 69, 70—72
 - 政府存款, 75—77
- 存量—流量的整体架构, 94, 151, 请参阅系统性货币体系
- 贷款除数, 70
- 贷款的产生, 70, 92, 146
 - 与存款之间的因果关系, 70—72

调节学派,7,9,28,136

定价

标准成本定价法,58,62

成本加成定价法,57,58

国际市场,136

加成定价法,57,58,62

目标回报定价法,58,59

全成本定价法,58,请参阅标准成本定价法

与生产价格理论,59,61

与市场份额,56,63,108

独立经济,71,请参阅资产经济

短期和长期,22,69,95,97,98

多元化,6,8,10,24,28,50

多重均衡,11,23,33,110

劳动力市场,2,97,107,108,111,117

增长模型,13,18,22,31,64,121,123—129,131,132,

134,138,139,152

凡登定律(Verdoorn's Law),134,140

非遍历性,请参阅根本的不确定性,26

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21,140,141

非主流经济学,5,7,10,13,14,16,17,36,156

学派,7,20

菲利普斯曲线,21,140,141

风险递增原则,49,50,80,81

风险溢价,83—86

高能货币,70,73,74,76,77

产生

- 隔夜率,72,73,76,83,145,请参阅基准利率
- 个体主义方法论,14
- 根本的不确定性,24,25,26,29,30,32,33,49,54,147,请参阅后凯恩斯基原主义者、历史时间、过程理性
- 工资,请参阅劳动需求曲线、劳动供给曲线、成本悖论与产能利用率,128,139
- 与成本毛利率,116
- 与利润率,59,60,100,103
- 最低工资保障,113
- 工作分摊计划,118,119
- 公开市场业务,72,75
- 寡头垄断,20,46,62
- 寡头垄断市场,46,62
- 过程理性,14,17,36,37,请参阅理性
-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3—5,7,9,10,12,13,18,20,21,23—25,27,29,30,40,52,64,66,81,84,97,102,104,142,145,请参阅卡莱斯基主义,以及斯拉法主义 vs. 新古典主义货币利率
- 货币理论,8,66,70,76,81,87,92
- 基本特征,20,30
- 基原主义者,26,29,30,32
- 后我向思考经济学,6
- 华盛顿共识,2
- 环境经济学,44,75
- 回购操作,72,73
- 回购利率,72,73
- 混沌动态,17

- 货币,请参阅高能货币
 - 产生,92
 - 内生性,74,第三章
 - 真实余额效应,109
- 货币供给曲线,78
- 货币流通,66,79,92,146
- 货币数量论,67,68
- 货币型生产经济,24,25,30,77,88,94
- 货币学派,67
- 货币政策,22,58,请参阅央行
 - 紧缩政策,1,5
 - 与冲销,77
- 货币主义,32,67,68,71,151
- 基准利率,85,88,89,92,94,95,100,103,114,120,请参阅
 - 联邦基金率、隔夜率
- 挤出效应,120
- 挤入效应,121
- 技术参数,66,74,128,152
- 技术进步,29,67,请参阅劳动生产率
 - 与失业,114
- 加成定价法,57,58,62 请参阅定价
- 加速效应,131
- 加速原理,126
- 价格弹性,38
- 价格领导者和价格接受者,62
- 剑桥学派,3,9—12,64,67,104,110,121,122,123,129
- 剑桥学派方程,109,121,123 请参阅储蓄方程

- 与增长模型,123
- 交易流程矩阵,88—90,92,94,99,151,153
- 阶级斗争,63,64,请参阅谈判议价能力
- 节约悖论,16,106,110,123,124,129,131,135,138
- 结构主义者,7,32
- 借款人的风险,49,请参阅风险递增原则
- 金融市场的脆弱性,102,请参阅风险递增原则
- 金融市场的作用,136
- 紧缩政策,1,5
- 进口倾向,137
- 经济周期,与生产率,12,86,102,105,115,142
- 竞争
 - 不完全竞争,10,46,请参阅寡头垄断
- 就业,请参阅劳动力需求曲线、劳动力供给曲线、成本悖论、节约悖论
 - 理论,第四章
- 凯恩斯,8,10—13,16,23,25,26,28,29,36,67,68,81,88,99,101,102,104,106,109,110,117,123,125,142,155
- 凯恩斯乘数,110
- 看不见的手,19,20,47,请参阅自由市场理念
- 可贷资金理论,68
- 扩张边界,50—52,63—65
 - 与垄断能力,65
- 劳动力供给的内生性,110—112
- 劳动力供给曲线,110—112
- 劳动力需求曲线,105,108,117
- 劳动生产率,60,108,114,115,117,118,119,134,152,请参

阅技术进步

理性

过程理性,14,17,36,37

实质理性,14,17

历史时间,20,22,24,26,30,41,53,请参阅根本的不确定性、路径依赖性

利率,请参阅央行反应函数、货币政策

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95

自然利率,68,69

利润

卡莱斯基方程,104,106

基于利润的消费,99—101,109

企业目标,46

正常利润,55

利润方程,102—104,121

利润份额,127—130,135,152,请参阅收入分配

利润率,请参阅成本悖论、目标回报率

分解,129

统一利润率,60,61

与产能利用率,139

与企业增长率,64

预期利润率,122—124

正常利润率,59,61,63,135

利润盈余,57,106,114,116,126,132,请参阅成本毛利率、成本悖论

内生性,77,82,132,133

与成本毛利率,116

- 与利润份额,130
- 联邦基金率,72,73,78,请参阅基准利率
- 两个剑桥之争,11,请参阅资本争议
- 流动性偏好,25,29,84,146,151
 - 普通家庭,84,85,88—91,93—95,98,106,124,136,145,147,152—154
- 流通学派,68,请参阅货币流通
- 垄断能力,65
- 路径依赖性,23,133,请参阅历史时间、滞后效应
- 逻辑时间,22,23,请参阅历史时间
- 马克思,18,28,29,30,100,102
- 马克思主义者,7,8,16,32,134
 - 与斯拉法主义者,7,29—32
-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76
- 目标回报定价法,请参阅定价,58—59
- 目标回报率,59—61,63—65,请参阅定价、目标回报定价法
 - 决定因素,58—59,64
- 内生性货币,67,请参阅货币、内生性
- 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小组,10
- 女权主义经济学家,7
- 彭罗思效应,50
- 偏好 vs. 需求,16,25,29,36,37,42,44,45,84,136,146,151
- 企业
 - 利润率和增长率,50
 - 流动性偏好,25,29,84,146,151
 - 目标,46

- 清算余额,73,77
- 全成本定价,58,请参阅定价
- 人文主义经济学家,20,28
- 融资,49,72,79,80,92,93,初始阶段和最终阶段
- 萨伊定律,117
- 商业银行
 - 流动性偏好,25,29,84,146,151
 - 与企业,70
 - 与央行,70,71—77,87,95,144
- 生产定价理论,59,请参阅斯拉法主义
- 生产技术函数,52,Leontief 模型
- 生产可能性边界,19,请参阅正常产能利用率
- 剩余理论,29,请参阅斯拉法主义
- 失业,请参阅就业
 - 技术性失业,113—117
 - 与工作分摊,117,118
- 市场份额
 - 与产能过剩,54,56,129
 - 与企业目标,46
- 收入分配,请参阅工资、成本毛利率
 - 与劳动生产率,60,108,114,115,117,118,134,152
 - 与通货膨胀,21,51,138,140
 - 与有效需求,25,119,126
- 收入效应,24,25,41,111
- 收益递减,35,46,49,102,105
- 收支平衡约束,137
- 双重交叉动态,61

- 四路会计原则,93
- 锁入效应,133
- 泰勒规则(Taylor Rule),78
- 替代效应,25,39,40,42,111
- 条件价值评估模型,43
- 通货紧缩性偏差,96
- 通货膨胀,请参阅菲利普斯曲线
- 维克塞尔理论,67,68,89
- 需求驱动型,138
- 与产能利用率,139
- 通货膨胀壁垒,125
- 投资本能冲动,26,147
- 投资方程,122,123,127,129,130,134—136,139
- 变形,134,135
-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16
- 完全竞争,10,12,20,46
- 完全垄断,20,请参阅寡头垄断
- 未分配利润,49,51,80,91,152
- 稀缺与生产,5,13,14,18,19,23,32
- 系统性货币体系,136
- 现实主义,14,15
- 与多元论,24,28
- 消费倾向,106,请参阅节约悖论
- 消费者选择理论,36,41,42
- 新共识主义 vs. 后凯恩斯主义,68,69,139
-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7,10,12—15,17,19,20,25,33,35,36,
65,69,76,87,88,97,109,117,142,156

- 新古典主义综合, 98
-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21, 68, 请参阅新共识主义经济学家
-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vs.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68
- 新李嘉图主义, 4, 请参阅斯拉法主义
- 信贷额度, 80
- 信贷分配, 81—83
- 信贷经济, 71, 74, 75, 77, 84
 - vs. 资产经济, 71, 72, 75, 77, 84
- 信誉度, 82, 85, 156
- 行为学派, 36
- 需求, 请参阅偏好
 - 层次性, 42
 - 分离性, 40, 42
 - 金字塔形理论, 39
 - 依存性, 40
 - 遗传性, 40
 - 增长性, 40
- 央行
 - 反应函数, 77, 78
 - 与商业银行, 70, 71—77, 87, 95, 144
 - 作为结算中心的作用, 76
- 依存效应, 41, 请参阅需求、依存性
- 银行货币, 70
- 银行利率, 72
- 银行贴现率, 72
- 银行学派, 66, 67, 68

- 有机主义,14,16,17
- 有限理性,26,请参阅过程理性
- 有效需求,11,20,24,25,32,34,82,83,86,97,99,102,103,
105,107-109,111,114-120,130-132,134,156
与卡莱斯基模型,请参阅第四章
原则,21,22,31,66,126
- 预先假设,14,15,17,19,20,23,36
非主流经济学 vs.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15,17,19,20
- 增长壁垒,124,125
- 增长的需求导向,198
- 增长率,11,22,32,33,50-52,63-65,71,85,121-123,
125,126,129,132-134,137,138,140,141,153,请参
阅投资方程
- 外向型经济,137
与产能利用率,139
与成本毛利率,116
与储蓄倾向,104,106,110,121,122,126,152
与技术进步,60,107,133,134
- 增长模型,13,18,22,31,64,121,123-134,138,139,152
卡莱斯基模型,31,32,101,105,107,110-112,114,115,
123-127,129,132,134-139
剑桥学派模型,121,122
新古典主义模型,3,19,87,99
以工资为导向,135
以利润为导向,135
- 真实余额效应,109
- 整体论,14,17,请参阅有机主义论

- 正常产出水平, 58
- 政府干预, 3, 14, 19, 43, 113, 142
- 制度主义者, 7, 30, 36
- 滞后效应, 23, 41, 141, 请参阅路径依赖性
- 中观经济学, 86
- 主流经济学, 请参阅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1, 3, 5, 7, 10, 11
- 准备金, 70, 73—77, 81
 - 超额准备金, 77
 - 开放型经济, 76, 95
- 资本积累率, 124, 请参阅增长率
- 资本争议, 4, 11
- 资产加总约束, 94
- 资产经济, 71, 72, 75, 77, 84
- 资产组合决定, 84
- 资金边界, 50, 51, 52, 63—65, 125, 136
- 资金的来源和使用, 91
- 字典序列, 39, 40, 请参阅需求层次
 - 与环境经济学, 44
- 自发性支出, 99, 103—106, 108, 109, 115, 117
- 自然失业率, 21, 33, 140, 请参阅菲利普斯曲线
- 自由市场理念, 1, 2, 5
- 总供给曲线, 21, 请参阅利用率方程
- 总需求方程, 103
- 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AD-AS model), 21
- 最后的贷款人, 150

专题目录

专题 1.1:英国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家	(10)
专题 1.2:后凯恩斯学者中的诺贝尔奖得主	(27)
专题 1.3:后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	(32)
专题 2.1:后凯恩斯主义和字典序列	(39)
专题 2.2: Rene Roy:后凯恩斯消费者选择理论的最早 支持者	(41)
专题 2.3:Jean Anouilh:一位字典选择专家	(43)
专题 2.4:环境经济学中的字典选择	(44)
专题 2.5:直接成本,管理费用和单位成本	(55)
专题 2.6:关于产能利用率的问题	(56)
专题 2.7:成本加价定价模型的建立步骤	(59)
专题 3.1:后凯恩斯主义学者眼中的信贷分配	(82)
专题 4.1:对“挤出效应”的否定	(101)
专题 4.2:利润方程的进一步推导	(102)
专题 4.3:总需求方程	(103)
专题 4.4:另一种利润方程	(104)
专题 4.5:卡莱斯基模型的公式分析	(107)
专题 4.6:成本和节约悖论的剑桥学派方程	(110)
专题 4.7:技术性失业、价格制定以及自发性真实需求 ..	(116)
专题 4.8:工作分摊计划、每小时劳动生产率以及有效 需求	(119)
专题 5.1:利润率的分解	(126)
专题 5.2:卡莱斯基模型的公式化	(129)
专题 5.3:金融市场的作用	(136)
专题 5.4:水平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	(140)